****

**铜川革命史话**

中 共 铜 川 市 委

编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铜川革命史话》编纂委员会**

**主 任：**冯新柱辛拴明

**副主任：**张应龙姚文琦

**成 员：**何建平谢常山刘建设

刘玉平梁月兰

**主 编：**谢常山

**副主编：**刘建设

**编撰组成员：**皇甫江梁晓沛杨 妮王都喜

赵 瑛王亚东李 蓉张 强

金改香张 倩姚志贤

**审 稿：**姚文琦刘玉平

**序言**

冯新柱 辛拴明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之际，“红色照金”系列丛书正式结集出版了。怀着敬仰之情，认真阅读了这套沉甸甸的史料，那一段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峥嵘革命岁月一幕幕呈现，使人心潮澎湃，思绪难平。

照金这片红色的热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l933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燃起了西北革命的燎原之火，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做出了贡献。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最终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出发点，是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一个革命根据地。

“坚定信念、不断探索，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坚韧不拔、顾全大局，忠诚于党、敢于牺牲”的照金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成为后来延安精神的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铜川人民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艰苦奋斗、锐意进取，谱写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豪迈诗篇，老区面貌和百姓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照金，以其峻美的自然风光和特有的红色文化，已成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国防教育基地；如今的铜川，秉承照金革命精神，正在向经济强、文化兴、生态美的全国知名休闲养生城市阔步迈进。

为永远铭记照金这段光辉的革命斗争史，继承和弘扬照金革命精神，中共铜川市委与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策划编印“红色照金”系列丛书。编纂了大量有据的史料，收录了一些民间叙述，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形式，生动翔实地介绍了照金及铜川的革命斗争历程，展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事迹。这套系列丛书的出版，对于认识、了解和宣传照金革命史，研究西北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谨以“红色照金”系列丛书献给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

让我们深切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峥嵘岁月 光辉历程**

——《铜川革命史话》前言

铜川，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五千多年前，黄帝部落就在此活动，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它雄居关中与陕北相接的襟喉要地，被古人称之为“北山锁钥”。在这片土地上，古往今来，战事频繁，复杂的地形地貌，为战时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条件。汉唐以来，这里屡屡成为京畿屏藩，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少数民族反抗封建统治集团的军事斗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军事斗争、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王朝反动统治的起义战争和铜川人民谋求独立解放的革命斗争。

铜川，是革命老区之一。1927年5月，中共同官特别支部建立，是陕西省党的活动和建党较早的县份之一。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进驻耀县照金一带，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开创了铜川地区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并举的新局面。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旬邑县辖)改编为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在此后接连取得一系列重大战斗的胜利。1933年三四月，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相继成业，初步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陕甘边党政、军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地内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波澜壮阔。1933年6月，在“左”倾错误路线引导下，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终南山，战斗失利，几乎损失殆尽。7月，驻耀县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王泰吉骑兵团起义；趁此有利时机，耀县游击队组建；8月初，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在这三支武装力量进驻照金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也随之成立，革命斗争出现新的转机。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遣重兵，向照金发动疯狂进攻，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胜利地保卫了革命果实，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10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大本营薛家寨失守，根据地的中心转移。

1937年，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进驻同官县陈炉镇，同官、耀县恢复建立党组织并掀起以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心的又一个革命高潮。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铜川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爷台山反击战、军台岭之战、墓坳阻击战等重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力量。1948年3月10日，宜君县城获得解放。1949年2月，同官县、耀县获得解放。3月，国民党军队疯狂进犯，同官、耀县失守。4月，同官、耀县终获彻底解放。从此，铜川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综上所述，铜川不仅有丰厚的文化积淀，还有优良的革命传统；铜川，名胜古迹闻名遐迩，红色资源亦星罗棋布；铜川，不但有灿若星斗的“一圣四杰”，更有映照古今的革命先烈。

为了铭记铜川革命历史，弘扬革命先烈、革命先辈在铜川大地上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和革命精神，激励和教育下一代，我们编辑出版了《铜川革命史话》一书，为全市党史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再添辅助教材。

正如人们常说，没有孙思邈的卓越贡献，就不可能写出完整的中国医学史；少了柳公权的杰出成就，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就显得逊色；同样，没有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铜川大地上发生的感人肺腑的革命事件、涌现出的浩气长存的革命先烈的记述，铜川现代革命史就不完整。因而，本书在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着墨较多，如习仲勋初会刘志丹、创建芋园游击队、王泰吉耀县起义、耀县游击队、薛家寨保卫战、革命烈士李妙斋、王震赞誉的边区女劳模杨淑平等等，从各个侧面、不同角度展现了照金这段辉煌的历史。同时，对铜川地区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也给予足够篇幅，如中共同官特别支部的建立、耀县西街党小组的成立、中共红宜县委的成立，使铜川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有组织的崭新发展阶段。正如柳林联合客栈、史乾边区送情报、宜君人民支前故事所展现，铜川战略地位重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均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红白交错”的复杂环境使得本地区“红色交通”发达，许多普通群众在残酷的环境中迅速成长为革命战士，走上革命道路，为铜川历史的发展奏响自己独特的革命乐章。另外，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了重点记述，除了刘含初、刘林圃、刘志丹、习仲勋、李妙斋等人们知之较多的共产党员外，铜川地区还活跃着一批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例如一颗红心永向党的高少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双面镇长”王子文，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为铜川革命所做的杰出贡献功不可没。

本书收录内容，虽是铜川革命历史长河中一朵朵小小的浪花，但却是铜川人民追求民主、争得解放的革命斗争史的精彩浓缩，真实而深刻。它必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把爱党爱国的热情转化到推进我市经济转型、提速发展上来。

铜川人民在过去的峥嵘岁月中走过了革命的光辉历程，创造出引以为豪的辉煌历史。铜川英烈的浩然正气，将永存天地；铁骨铮铮的革命先辈，将永被铭记；赤胆忠心的英雄儿女，将永被怀念。愿我们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齐心协力，共创铜川美好灿烂的明天！

**目录**

同官一高点星火……………………………………………………（1）

刘含初英勇就义石堡村……………………………………………（6）

耀县西街党小组的成立……………………………………………（10）

元宵节照金民团被缴械……………………………………………（14）

耀县“交农”斗争…………………………………………………（18）

习仲勋初会刘志丹…………………………………………………（20）

夜歼三县民团………………………………………………………（24）

刘林圃慷慨就义长安街……………………………………………（29）

创建芋园游击队……………………………………………………（33）

红军在宜君播火种…………………………………………………（37）

习仲勋在照金养伤…………………………………………………（44）

亭子沟贸易集市……………………………………………………（48）

王泰吉耀县起义……………………………………………………（51）

耀县游击队…………………………………………………………（55）

薛家寨保卫战………………………………………………………（57）

革命烈士李妙斋……………………………………………………（60）

心系革命 重返照金…………………………………………………（63）

薛家寨突围…………………………………………………………（68）

周冬至烈士…………………………………………………………（72）

陕甘边妇女游击队…………………………………………………（76）

刘志丹在照金………………………………………………………（84）

秘密读书会…………………………………………………………（90）

中共红宜县委的成立………………………………………………（94）

贺龙在陈炉…………………………………………………………（97）

耀县抗日救亡运动…………………………………………………（103）

一颗红心永向党……………………………………………………（107）

地下交通员范世英…………………………………………………（112）

保守机密 宁死不屈的张守愚……………………………………（116）

满怀激情奔边区……………………………………………………（118）

王震赞誉的边区女劳模杨淑平……………………………………（121）

照金“难民乡”……………………………………………………（125）

史乾边区送情报……………………………………………………（128）

柳林联合客栈………………………………………………………（136）

雁门游击队的故事…………………………………………………（140）

淳耀县反“围剿”二三事…………………………………………（148）

杨秀娥舍身救护革命干部…………………………………………（156）

掩护战友英勇献身的田维平………………………………………（158）

奇袭耀县城…………………………………………………………（160）

卧底英雄王子文……………………………………………………（164）

寺坡战斗……………………………………………………………（179）

游击队长许天洁……………………………………………………（182）

献身革命 英年遇难的强自刚……………………………………（189）

出生入死 慷慨就义的杨植………………………………………（191）

药王山惨案…………………………………………………………（195）

军台岭之战…………………………………………………………（201）

宜君人民支前故事…………………………………………………（204）

墓坳阻击战…………………………………………………………（209）

解放铜川……………………………………………………………（212）

智取华山战斗英雄路德才…………………………………………（215）

后记…………………………………………………………………（221）

# 同官一高点星火

中共同官特别支部创建于大革命时期1927年5月，是党在陕西建立较早的支部之一。

1923年，三原建立了进步的青年团体共进社分社，随后建立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影响很快波及渭北各县。同官县一批有志青年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陆续前往三原求学。

韦志奇、冯又文、寇俊等人先后进入三原省立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求学，较早接受了马列主义，加入进步青年团体“渭北青年社”。1925年春到1926年夏，韦志奇、冯又文、寇俊又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同官县在外地最早加人党组织的革命青年。

1926年4月，军阀刘镇华率部攻入潼关，进攻有革命倾向的驻陕国民军二、三军各部，围困西安。不久，又围攻三原，学校被迫停课，解散学生。三原党、团组织给回家的外县学生中的党、团员布置了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的任务。同年秋，韦志奇、冯又文、寇俊受上级党组织指派，回到同官搞农运工作。回来后，韦志奇、冯又文、寇俊均在一高(同官第一高级小学简称)教书。他们以一高为立足点，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9月，韦志奇等人根据上级指示，帮助好友国民党党员党文杰、党柏山建立了国民党同官县党部。在党柏山的帮助下，韦志奇、冯又文、寇俊于此时又加入国民党。冯又文任国民党同官县党部主席，韦志奇任组织委员，寇俊任宣传委员，党文。杰任农工委员。同官县国民党党部建立后，除执行国民党省委、省党部的指示外，还在同官积极发展了雷炎坤、王少文、杨华亭等一批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党员。

同时，韦志奇、冯又文、寇俊利用国民党党员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农运工作。短短3个月时间，先后在黄堡区、红土区和中山区(今印台区城关)成立了农民协会，动员民众戒烟、戒赌，号召妇女放足，开展移风易俗等工作。在农民中广泛宣传“农民生活之贫苦，国家之贫弱，是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要使国富民强，就得组织起来，在农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做国家的主人”。他们的宣传教育，唤醒了民众，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中共同官特别支部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根据西北地区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的现实，提出“工作集中”的原则，即将党的力量和工作尽量集中于渭河两岸地区。会议同时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作出发展壮大党组织的决定，并选派一批党、团员从西安奔赴全省各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5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中共陕甘区委西路特派员耿觉(耿菊人)赴同官县巡视并开展建党工作。耿觉来到同官后，扮作商人，以推销书籍之名来到一高，联系上冯又文、韦志奇等人，向他们传达了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党代会会议精神，分析了目前同官的形势，讨论了今后的重点工作。由于韦志奇等人与耿觉联系过密，引起别的国民党党员的怀疑，他们的行踪受到监视。为了甩开眼线，隐蔽身份韦志奇、耿觉等人秘密地开会商量问题，利用休息时间走出去，到集会上，到群众中去了解民生，给进步青年宣讲马列著作、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目前的现状，号召青年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地主作斗争。韦志奇等人原计划5月中旬成立中共同官地下党组织，由于各种干扰，直到5月下旬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们才利用学生放假回家，大部分教员离校的有利时机，在一高建立起同官县第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同官特别支部。中共同官特支成立之初，仅有韦志奇、冯又文、寇俊三名党员，冯又文任支部书。记，韦志奇、寇俊任委员，归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中共同官特支的建立，点燃了同官革命的星星之火。

中共同官特支成立后，由于有国共合作的良好基础，尽管蒋介石叛变革命，搞四一二大屠杀，但在相对偏远的同官山城，冯又文、韦志奇、寇俊三人仍能以一高为立足点，利用国民党同官县党部人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们利用红土、黄堡等地集会和泰山庙会登台讲演，号召农民组织和团结起来，在农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做国家的主人，同反动恶霸地主作斗争一抗粮，抗租，抗款，抗捐，打恶差。同时，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发传单、张贴标语、游行，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

1927年7月，冯玉祥叛变革命，公开反共，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陕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韦志奇、冯又文和寇俊被迫退出同官县国民党党部，转入地下开展党的工作。之前，由于他们是同官县国民党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在县城绅士中发展的国民党党员皆为关系甚密的好友，又是地方乡党。所以，在国共合作突然破裂、政局动荡的腥风血雨中，同官的国民党党员和地下共产党员互相掩护，韦志奇、冯又文、寇俊3人有幸得以安全隐退。

随后，冯又文出任同官县教育局局长，韦志奇被选为一高校长，寇俊仍为一高教员。不久，寇俊前往中共三原县委工作。

# 刘含初英勇就义石堡村

刘含初，生于1895年，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太贤乡备村人。幼读私塾，后考入西安三秦公学，勤奋好学，博览群书。1916年夏，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史系。

l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含初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爱国行动，遭反动当局逮捕，后经校方进步力量积极营救获释。刘含初从此，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直接影响下，刘含初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1920年，发起成立“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参与创办《秦钟》月刊。同年秋，刘含初从北大毕业，先后在通州师范学校、苏州中学任教。任教期间，他积极提倡白话文，革新教学内容，并利用课堂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刘含初应聘到广东岭南大学任教，因讲解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勾结压榨中国人民的罪行被校方以“煽动学生闹事”为由解聘。10月，在北京参与创立革命团体“共进社”，成为该社核心领导人之一。1923年，到上海大学任教，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河南开封大学任教。同年底回到西安，先后任陕西省教育厅教育科科长、西北大学教务长，在西北大学和杨虎城部三民军官学校任教。

1925年5月，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陕西地区的共产党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发起成立了陕西省国民党组织。8月，刘含初与李子洲、魏野畴等发起成立陕西省国民党党员俱乐部，被推选为书记。9月，参与成立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0月，参与创建中共西安特别支部。1926年初，任中共西安地委委员。同年初，军阀刘镇华率部犯陕，围困西安达8个月之久。刘含初经常与守城军队联系，不但从舆论上给予声援，还帮其解决物资困难。由于围城旷日持久，城内居民粮源无着，饿死者甚多。刘含初积极协助城内当局，救济饥民，使许多处于死亡边缘的百姓得以存活。时值各学校放假，刘含初与黄平宛、雷晋笙等人把千余名学生组织起来，办暑期补习学校，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壮大党、团组织，并带领学生参加反围城斗争，直至冯玉祥五原誓师东下，击溃刘匪。

1927年2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刘含初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与赵葆华等共同主持省党部工作，积极开展全省工农运动和民众斗争。他们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广泛接触、联络陕西各界进步人士，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使陕西成为大革命运动最为高涨的省份之一。由于陕西地区的革命形势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党急需大批从事党务、军队政治工作和农民运动的干部。中共陕甘区委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研究决定，派刘含初和李子洲在改组西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西安中山学院。3月，刘含初任中山学院院长，主持院务工作。学院制定了学校章程、教学计划和各项制度，在短期内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和军队政治工作人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刘含初坚定地站在党和广大民众一边，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4月25日和5月5日，刘含初先后和魏野畴、李子洲、史可轩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召开万人大会，声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反革命罪行。7月，冯玉祥在陕西“清党”反共，中山学院停办，刘含初被通缉。考虑到刘含初的安全，党组织决定派他赴苏联学习。8月初，刘含初返回黄陵故里，准备安排好家眷后启程奔赴苏联。

8月13日，刘含初从黄陵备村来到宜君石堡村探望岳父母。在石堡的3天，刘含初向村里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马克思主义。白天，他深入田间地头，一边干活一边了解农村各方面情况；晚上，他和纳凉的农民促膝长谈，向他们深人浅出地讲解革命道理。刘含初为大家详细分析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备受压迫的原因，告诉他们：“现在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个国家叫苏联，工农已经起来推翻了反动政府，过上了自由幸福的日子。咱们中国也会有那么一天。”石堡村的乡亲们第一次听到“压迫”、“剥削”、“革命”、“自由”这些新名词，一时感到特别新鲜。当地青年学生打听到刘含初在石堡村，纷纷跑来听他讲革命道理。

8月15日(农历七月十七日)下午，刘含初在岳父家挥笔题字，为亲戚书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中堂，以及“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的条幅。正当他挥笔言志之时，陕北军阀井岳秀的走卒杨衮带领七八名匪兵突然闯了进来。面对凶神恶煞的匪徒，刘含初非但毫无惧色，反而迎上前去怒斥敌人。敌人恼羞成怒，扣动扳机。刘含初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32岁。

刘含初为了党的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他的血没有白流，石堡村以及宜君各地的热血青年，在他的影响下，纷纷走上革命道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了他们的力量。

# 耀县西街党小组的成立

1927年初，西安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大革命处于高潮时期。中共西安民立中学支部张汝慎(1928年在渭华起义中牺牲)先后介绍在西安民立中学就读的耀县籍青年学生张邦英、曹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张汝慎又介绍张邦英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并指定他任国民党民立中学区分部书记，借此掩护进行中共地下党、团工作。

1927年夏，在西安党、团组织的指示下，张邦英进入西安中山学院“暑期军事政治训练班”学习。不久，冯玉祥在陕西“清党”反共，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西安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张邦英没有被敌人吓倒，在异常危险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斗争。8月的一天晚上，张邦英与本县同学曹雯，以及10多个进步青年一起，在西安尊德女子中学一间僻静的教室里，秘密举行了入党仪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张邦英担任中共西安民立中学党支部书记，和曹雯(曾任该校团支部书记)一起向学生们传播进步思想，宣讲革命形势，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发动学生进行革命活动，通过演讲、游行、散发传单、贴标语、挂红旗等方式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渭华起义期间，民立中学党支部改为特别支部，张邦英担任特支书记，同时任东路秘密交通员，承担起给渭华党组织转送文件、传递消息的工作。他利用自己的学生身份，凭借过人的机智和胆略，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搜查，安全地将党的机密文件送到临潼交通员手中。

1928年冬，张邦英、曹雯从西安民立中学毕业，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回耀县从事建党工作。组织上写密信把他们介绍给渭华起义失败后隐蔽在耀县的共产党员冯鸿儒。当时，冯鸿儒正在耀县西街面坊里给亲戚帮忙干活。张邦英、曹雯、冯鸿儒三人秘密取得联系后，很快在耀县西街面坊成立了中共耀县第一个党小组，直属省委领导。冯鸿儒为党小组负责人，公开身份为面坊帮工，张邦英、曹雯分别在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和南街女子小学任教。学校任教期间，张邦英、曹雯在学生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通过讲“三民主义课”和师生交谈等方式，宣讲革命道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和社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在他们中间宣传马列主义。杨再泉、安仁、任浪花、张仲良、刘景山等一批对社会现状不满、思想进步、愿意接受共产主义理论的青年，常常和张邦英聚在一起，秘密谈论当前社会黑暗、青年出路等问题。为此，一个叫李鸿文(曾为张的小学老师)的教员善意地提醒张邦英，说：“邦英，你要注意在教学时不要出圈子，以免惹麻烦。”面对老师的好心提醒，张邦英报以微笑，之后将党的工作开展得更为隐秘。

中共耀县第一个党组织——西街党小组的建立，标志着一支新的革命力量登上了耀县的政治舞台，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它像星星之火，将越烧越旺，照亮黑暗的耀县大地。

# 元宵节照金名团备缴械

红军陕甘游击对成立后，在广阔的陕甘边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反复探索，中共陕西省委和红军陕甘游击队根据斗争形式的需要，调整战略部署，逐渐将创建陕甘边苏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照金地区。照金位于耀县西北部，居桥山山脉南端的突出地带，与淳化、旬邑、同官、宜君等县接壤。北倚子午岭南段，南俯渭化平原，东临咸榆大道，西通陕甘边腹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交错，河溪纵横，密林如海，中心地带高峰林立，雄奇险要。20世纪30年代前期，照金地区的土地十分集中，绝大多数十地被几家大地主和香山寺院占有，广大群众只有极少的一点十地。在苛捐杂税、高额租债和兵患匪祸的重重压迫下，民众困苦不堪。时逢连年灾荒，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以及关中饥民大量涌人，更加剧了照金地区的贫困。大批贫苦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灾民和当地农民一起，进行抢粮、分粮斗争，照金地区的群众斗争日益高涨。

1932年2月20日夜，谢子长等率领的陕甘红军游击队，犹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照金街上。时逢元宵节，照金街头敲锣打鼓耍社火，四里八乡的群众汇聚在这里，打着灯笼看热闹。照金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坐在一排摆着糖果的桌子边，怡然自得地吃糖、吸烟和品茶。照金民团的团丁们，在浓郁的节日气氛里，放松了戒备，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喝酒吃肉，或者走上街头看热闹。整个照金街道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突然，“砰”、“砰”，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红军陕甘游击队冲进照金街道，迅速将照金民团合围，随即缴了他们的枪。街上看社火的群众一时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个个惊慌失措。一片混乱当中，有人攀上高高的桌子，大声喊起话来。他告诉大家，不要惊慌，他们是刘志丹所领导的红军队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专为穷人办事。听到红军来了，骚动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红军战士趁机给大家宣讲革命形势，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陕甘游击队大闹元宵节，狠狠地打击了照金民团的嚣张气焰，给水深火热中的照金人民带来了希望，点燃了照金革命的烽火。红军来照金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开来。

此后，红军陕甘游击队又多次来到照金地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广泛发动群众，为照金苏区的创建创造了条件。

# 耀县“交农”斗争

l929年至1931年，陕西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民党耀县当局不顾人民死活，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境内土匪为患，当地驻军大量征调民工建造兵营。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耀县人民的反抗情绪空前高涨。

这一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多次来到照金地区进行革命活动，三原武字区人民以武装斗争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运动也波及耀县，渭北游击队先后到耀县华里坊、让牛村、柳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耀县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小丘、西塬一带农民和外地逃荒到此地的灾民纷纷行动起来，抗粮，抗捐，抗劳役。在这种形势下，中共耀县特支发动党员在群众中秘密宣传革命思想，成立农会，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夏收前，中共耀县特支利用“鸡毛传帖”的联络方式，发动和组织西塬、楼村、小丘一带数千民众，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交农”斗争。在中共耀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愤怒的农民群众首先砸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收税机关。随臣汶些贫苦农民肩扛木杈、锄头、镢头等农具，从四面八方赶到石人堡会合后，高呼“废除粮捐，减轻杂税，打倒劣绅”筹口号，潮水般地涌向耀县县城，要求政府减免粮税，停建兵营。国民党耀县当局闻讯紧关城门，群情激愤的农民群众围在西城门前，将带来的农具堆在一起，用草帽引燃。风助火势，大火升腾起来，直向西城门楼扑去。瞬间，西城门便淹没在一片火海当中。

西城门前冲天的火光，斗争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呐喊，使得耀县城内驻军人心惶惶。为防备群众冲击另外几个城门，城内守军加紧增派守城兵力。耀县驻军旅长唐嗣桐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赶紧派代表出来和斗争群众见面，许诺停建兵营。县长李建堂也站在城墙上连连鞠躬作揖，向城外斗争群众喊话：“我是李县长，兵营不修了，粮捐不要了，请大家都回去吧！”农民群众的强烈反抗，最终迫使李县长答应减免粮税，停建兵营，“交农”斗争取得胜利。

耀县“交农”斗争，是耀县党组织领导耀县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次有力实践，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锻炼了党员和群众，拉开了耀县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

# 习仲勋初会刘志丹

1932年4月，由两当起义部队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向北开进，准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由于起义部队缺乏群众基础，又没有红军游击队的配合，加之行军沿途地形复杂，部队连遭敌人围追堵截，在弹尽粮绝、极度疲困的不利条件下，被盘踞在麟游、永寿交界岳御寺一带的王结子匪军打散。

严峻的斗争现实，使年轻的队委书记习仲勋(不满19岁)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10多天来，连续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体力消耗过度，他一时心力交瘁。6月上旬，习仲勋躲过敌人的疯狂追捕，从长武亭口镇秘密回到家乡富平。

因为情况不明，习仲勋没有直接回自己家，而是先住到距家10多里的表姐家。在这里，习仲勋与过去自己发展的中共党员胡振清、柴国栋取得联系，通过他们了解外面的时局动向。得知自己正在被敌人通缉后，习仲勋想到，表姐家既不能久待，也不好乱动，只能就近去富平县城寻找党组织，设法去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工作。几经周折，习仲勋与富平县教育局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石仲伟接上了头。石仲伟是习仲勋高小时的老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受中共地方组织委派，以国民党富平县教育局局长的公开身份，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习仲勋按照石仲伟的安排，在富平县抗日救国会暂住下来，同时向中共富平区委负责人表达了自己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

数日后，习仲勋在县立一高与省委派来视察渭北地区工作的程建文相遇。他对程建文说：“这下可好了，我终于见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苏区，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程建文恰好要去三原武字区巡视工作，便决定与习仲勋同行。是日傍晚，习仲勋和程建文头戴大草帽，简单化装后悄悄奔出富平县城，夜宿洼里村程家，次日赶往三原县武字区长坳村。几经辗转，习仲勋终于踏上了渭北苏区的土地，想到或许很快就能见到刘志丹，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他久久抑郁的心情一下子明朗了很多。习仲勋向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再次表达了自己希望早日找到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

习仲勋寻找陕甘游击队，得到同乡农民周老四的热心帮助。周老四原名周明德，是周冬至的叔父。习仲勋与周冬至是十兄弟，习、周两家向来交往密切。民国十八年关中年馑，周冬至随母逃荒到耀县照金，靠租种山地勉强糊口度日，周老四仍留在富平老家，靠驮运食盐到照金一带兑换粮食维持生计，常往返于照金一带北部山区，不时听到些陕甘游击队的消息。

习仲勋从周老四处打听到陕甘游击队的行踪后，决定和他一起北上照金，寻找刘志丹的队伍。

这是一个阳光灼人的秋日，在通往耀县北山的土路上，一辆装满锅板盐的人力独轮车，缓缓地前行着。拉车的人是习仲勋，推车的是他的同乡周老网，两个人扮作盐贩子，拉着盐车，一路向照金走来。饿了，啃口干馍；渴了，喝口河水。经过百余里崎岖山路的跋涉，习仲勋和周老四终于赶到照金老爷岭，借往在周冬至家甲。

到达照金后，习仲勋很快打听到陕甘游击队的消息。巧得很，陕什游击队此时正在照金西边的杨柳坪休息整编。习仲勋得了消息，匆匆从老爷岭赶来，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川庙见到了刘志丹。“快看，老刘过来了。”身边的人给习仲勋指点着。习仲勋抬眼望去，只见一个精神饱满的高个儿正向这边止来。及至走近了，他才看清，这个被边区军民亲切地喊为“老刘”的刘志丹，脸庞清瘦，高鼻梁，目光深邃而温和。很快，刘志丹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习仲勋的手。

终于见到比自己年长10多岁的刘志丹，习仲勋觉得有很多话想跟他说，但一时激动，竟不知说什么好。刘志丹看出了习仲勋的紧张与窘迫，拉住他的手，笑着说：“干革命哪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得多呢！”刘志丹真诚坦率的态度，亲切质朴的话语，如春风拂面，让习仲勋感到亲切又温暖，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话匣子也随之打开。

习仲勋向刘志丹详细讲述了自己搞学生运动、搞两当起义，以及开展农民运动屡遭失败的情况，内心感到沉重与迷茫。刘志丹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两当起义时你还是队委书记呢。”停了停，刘志丹接着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原因何在呢？依我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能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习仲勋认真听着刘志丹的活，心中若有所思。

与刘志丹在照金金刚庙的初次会面和谈话，给习仲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照金，习仲勋和刘志丹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也是在这里，习仲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他革命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 夜歼三县民团

1932年9月初，红军陕甘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民团合围在照金，四面临敌，处境危险。

这天，照金杨柳坪红军战地临时指挥所里烟雾缭绕，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游击队将领们聚在一起，神情凝重地抽着旱烟，苦思冥想应敌之策。

一向足智多谋的刘志丹首先打破了沉默，语重心长地说：“‘左’倾机会主义害苦了我们，现在大兵压境，我们必须巧于周旋，不可硬碰。既要瞅准机会消灭敌人，还要善于保全革命力量。”说完这几句，他用刚毅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对，敌人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我认为应该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金刚庙方向撤退。”身材魁梧的阎红彦接过刘志丹的话，高声地说。

一直缄默不语的谢子长，这时吐出一口烟，沉稳地说：“眼下，部队是受了很大的损失，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以来，‘左’倾机会主义一直危害着我们部队。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坚定战胜敌人的信心。我认为，咱们应该出其不意，向敌人力量强大的陇军驻地安子洼一带转移！”谢子长才讲完，时任红军游击队副总指挥的刘志丹即刻应声道：“面对困境，重要的是要树立信心和勇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向敌人力量最强的陇军方向佯退，也是个好办法！”

很快，游击队领导们统一了思想，在认真分析当前敌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作战方案。接着，部队召开了动员会，游击队员们得知要战斗了，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战。

9月11日清晨，群峰之间的照金街格外安静。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游击队领导正隐蔽在照金街上老纪家里，研究对敌作战方案。突然，只见时任游击队副队长的李妙斋行色匆匆地走进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昨天夜里，街上郑其来铁匠铺里来了个神秘的人，老郑让人把消息通报给我，我立即带人去将其逮了个正着。经审讯，来人供出了以党谢芳为副总指挥的‘剿匪’司令部(即同官、富平、耀县三县民团)约300余人要在今天早上偷袭照金，与潜伏在后沟寨子的张彦宁反动民团里应外合，妄图一举消灭咱们。”大家听了李妙斋的报告，非但不急，一个个倒笑呵呵的。只见刘志丹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大家便分头行动起来。游击队按照部署，迅速向照金西北尖坪一带转移，沿途故意丢掉些锅、碗、衣服等物件，散播游击队闻风而逃的消息，做出一幅狼狈逃跑的假象。

盘踞在照金后沟寨子的张彦宁民团，见游击队狼狈“逃窜”，便从龟缩的老巢里出来，大摇大摆地走在寺坪村的小道上。不一会，三县民团300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拔过来，

张彦宁得意地前往迎接，告诉他们游击队被“吓跑”的消息。“哈哈，游击队被咱们吓跑啦……”民团的团丁们开心地嚷嚷起来。

是夜，张彦宁尽地主之谊，在寺坪、坟滩大摆筵席，为三县民团接风洗尘。酒席上，团丁们猜拳喝酒，一直闹到夜深人静，一个个才踉踉跄跄地回屋睡觉。

夜色深浓，四野沉寂，黑黝黝的大山深处不时传来几声狼嗥。寺坪、坟滩村里，三县民团的团丁们大都烂醉如泥，沉浸在梦里。子夜时分，早已摸清敌情的谢子长率部从隐蔽着的尖坪一带杀回，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三县民团驻地包围起来。

拂晓，尖锐的枪声突兀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全歼三县民团的战斗打响了。我游击队员按照指挥，分头冲向团丁们睡觉的屋子，堵门的堵门，下枪的下枪，警戒的战士机警地盯住敌人的一举一动。团丁们在黑灯瞎火的屋里乱作一团，找衣服的，找枪的，骂人的……明白过来被人偷袭时，有人企图向门外冲去，被堵在门口的游击队员用枪逼了回去。很快，一队接一队，衣冠不整、高举双手的民团团丁从不同的屋里鱼贯而出，缴械投降。

围歼三县民团的战斗速战速决，前后不到半个小时。此次战斗，游击队当场击毙三县民团副总指挥党谢芳，活捉耀县保安团团长马希哲、小丘区民团团总柴子发，缴获长短枪300余支。遗憾的是，狡猾的张彦宁又一次在游击队的眼皮底下逃脱了。

突袭过后，天色渐渐亮起来，游击队稍事休整后，又马不停蹄地向照金西面的安子洼方向奔去。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照金茂密的丛林里。

# 刘林圃慷慨就义长安街

“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这是1933年刘志丹为悼念刘林圃而敬献的挽联题词，是他对烈士革命精神的高度赞扬。

1909年，刘林圃出生在耀县刘家河村。l921年，12岁的刘林圃进人石人小学读书。家境贫寒的他，读书格外刻苦，极少贪玩，四年后顺利考人县立高小。1925年秋，渭北各校学潮蜂起，县立高小受到影响，刘林圃因不满学校落后封闭的封建教育，参与闹学潮而被开除。

失学以后，刘林圃在家刻苦自学，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关心国内时事政治，忧国忧民。旧社会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现实悲境，激发了他积极寻求光明的革命热情。为了探寻真理，实现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理想，刘林圃开始四处奔波。

1925年冬，刘林圃参加国民军胡景冀部，任团部司书。1927年初，考人黄埔军校湖南长沙分校，学习期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刘林圃被党组织派往河北滦县、唐山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秘密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夏，因参与领导平津地区游行示威被捕人狱。在狱中，敌人多次刑讯逼供，用尽各种酷刑折磨刘林圃，但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最终，敌人因为没有抓到刘林圃“反动”的真凭实据，只好将他释放。1931年夏初，刘林圃在颠沛流离中，从天津回到阔别5年多的家乡耀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民族危亡，刘林圃奋笔疾书，撰写《满洲问题与中国》一文，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阐明了发生侵略战争的根源，提出解救满洲、解救中国的途径。文中一些精辟的论点，今天读来，仍然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1932年春，刘林圃来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随后，组织派他去驻凤县杨虎城部警三旅二团一营(习仲勋所在营)领导和指挥起义。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达凤县的当晚，即在凤县县城丰禾山庙内召开了营党委会议，决定趁部队换防之机举行起义。4月1日拂晓，一营一连、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县双石铺出发，向两当移防。刘林圃在营党委的安排下，插入部队行列随军前行。是日黄昏，部队行至甘肃两当县城宿营。晚上八九点钟，刘林圃和营党委在两当县北门外一个马车店内召开了营党委扩大会议，对当晚的起义行动进行周密安排和部署。全营所有党员参加了会议。

午夜12时，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两当的夜空，两当起义打响了。各连起义战士按计划纷纷行动起来。机枪连代理连长被击毙后，一连战士和机枪连对峙起来，战斗进行得非常激列。由于机枪连顽固抵抗，始终未能解除武装。与此同时，左文辉、张子敬等人带领各排坚守东、西城门，高瑞岳带领全排去抓营长王德修。因王德修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趁机逃脱。起义战斗直打到鸡叫头遍，起义的一营3个步兵连200余人。在各连负责人的率领下迅速撤出两当县城，来到北门外姚沟渠集合。在这里，刘林圃简要地向起义战士讲了话，说：“我们起义哗变是为了回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去，大家愿不愿意？”战士们一致高呼愿意。随后，部队连夜北上，沿广厢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

次日拂晓，起义部队到达两当县境最北端的太阳寺吃饭休息。在此，营党委开会研究部队整编事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委。部队改编后，于当日下午继续北进，沿途遭敌围追堵截，与国民党民团匪军多次作战，均取得胜利。后行至甘肃省灵台县时，与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被其卡住山道，截住去路。为了保存实力，部队进入麟游以北的崔木，不料，遭当地匪军包围，双方激战数小时，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在敌人节节合围中兵败麟游。

两当起义失败后，刘林圃辗转回到西安。不久，因为叛徒告密，在西安北大街民众教育馆被捕，监押在西安西华门伪军法处看守所。在狱中，刘林圃铁骨铮铮，虽经酷刑折磨，仍坚强地向敌人表示：“就是油煎火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时，刘林圃还在狱中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诬蔑，勉励同狱战友坚持斗争。

1932年9月26日，刘林圃被国民党反动派冠以“山东匪首张庆云”的罪名，押赴西安习武园杀害，年仅23岁。刑车经过西安北大街、西大街途中，刘林圃向大街两旁群众高呼声明：“我不是山东土匪，也不叫张庆云，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陕西耀县人，名叫刘林圃。”把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血腥罪恶昭然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刘林圃在刑车上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西北青年联合起来！”等口号，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政策，并向沿路群众讲道：“凡是共产党员，凡是革命者，都应预备流血，预备牺牲！……今天这么多人为我送行，我觉得很高兴、很痛快！”闻听此言，大街两旁数千围观群众，很多人低头落泪，不胜悲痛。

刘林圃同志短暂的一生，就像一首悲壮的革命斗争进行曲，可歌可泣，永远回响在人民心中。

# 创建芋园游击队

1932年秋，刘志丹、谢子长多次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照金地区，宣传土地革命，传播革命火种。游击队领导人在分析照金人民缺粮断炊的严重情况后，决定从领导群众开展分粮斗争人手，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遂选派游击队干部李妙斋来到照金，在芋园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

李妙斋来到照金后，以寻找乡亲揽活为掩护，住在山西灾民韩天成家里。白天，和群众一起下地劳动，了解各种情况；晚上，走家串户，秘密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李妙斋开始建立芋园党组织，成立农民游击队。他先发展了邓克勤、王金海、韩天成、黄登文、黄登法等人入党，成立党支部。同时，组织韩天成、韩歪、韩黑子三兄弟和邓克勤、何乾富、黄登文，秘密打制马刀、长矛，购买枪支弹药，于1932年10月成立了照金地区第一支农民武装一芋园游击队。芋园游击队成立后，邓克勤任队长，王清兰任妇女代表。

在组建芋园游击队的过程中，庙湾民团对李妙斋等人的革命活动有所察觉。8月的一天，民团派来打探消息的两名密探，在黄登文家前院碰上李妙斋。相互盘问间，李妙斋发现其中一人在偷偷掏枪，便先发治人，拔枪击中了他。另一人见势不妙，撒腿就跑。第二天，庙湾民团倾巢出动，来芋园抓李妙斋。团丁们挨家挨户地搜来搜去，找不到李妙斋，就把黄登文拉走，关在庙湾的炮楼上严刑拷打，逼问李妙斋的下落。黄登文咬紧牙关说：“我不认识他，咋能知道下落？”团丁们从黄登文嘴里一无所获，就把他关了起来。一个多月后，李妙斋打通门路，用银元和烟土将黄登文赎回。黄登文回来后，历数民团罪状，大家见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个个义愤填膺，连连咒骂团丁们歹毒。李妙斋趁机教育大家：“国民党民团坏得很，他们绝不会就此罢手，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只有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才能对付他们。穷人要过上好日子，只有跟他们斗。”黄登文被抓一事，促使李妙斋加快了组建芋园游击队的进程。

芋园游击队成立之初，只有李妙斋所带的一支手枪，武器落后，主要是几支土枪、大刀和长矛。李妙斋一面让邓克勤、黄登文等人秘密打制马刀、长矛，一面派人侦察四周敌情。经过20多天的准备，李妙斋率领芋园游击队首战川口，打击了离芋园村最近的一支地主护家武装。游击队首战告捷，缴获部分武器弹药，大大地鼓舞了士气。紧接着，游击队先后攻打了孙家山、张家山、龙家寨、兔儿粱的守山土匪，占领了兔儿梁和龙家寨的险关要隘，使照金地区的众多守山土匪失去巢穴，到处流窜。针对这些小股土匪多为受苦较深、生活无路，或因躲债上山，或因杀人避难，或因躲避官府追捕铤而走险的实际情况，李妙斋发动游击队员对其展开政治攻势，做统战工作，与他们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争取团结过来。对极少数同官府勾结，杀人越货、奸淫掳掠、罪大恶极的土匪，则给予坚决打击。经过李妙斋的努力，雏形的照金苏区，终于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山区站住了脚。

芋园游击队成立后，还组织附近村庄数千名群众，选举成立了分粮委员会，进行大规模的分粮斗争，有力地调动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扩大了党的影响，使芋园成为照金最早“闹红”的地方之一，为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红军在宜君播火种

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界地区建立革命武装，开展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于1932年2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了扩大影响，陕甘游击队沿陕甘边境南下，进军宜君、耀县照金一带。从此直到1935年秋，红军在宜君的土地上辗转战斗，足迹踏遍了宜君的山山水水。

**转角改编——红二十六军诞生**

转角(今旬邑县辖)是宜君西部的一个偏僻小镇。

1932年12月24日，根据中央和省委决定，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在这里召开军人大会，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当时，军、师部均未成立，只组建了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部。杜衡任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200余人。红二十六军是大西北最早由党中央授予正式番号的工农红军，它的建立，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史上意义重大。

红二团成立后，陕西省委决定红二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二是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部地区发展。为执行省委关于创建照金苏区的任务，拔除照金地区的敌人据点，红二团认真分析敌情，决定首战焦坪较弱之敌。焦坪民团害怕我军袭击，向来防范森严。刘志丹纵观敌情，提出声东击西的战略主张，并和大家一起研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

12月25日下午，红二团向马栏川与焦坪相反的方向行军，做出要去攻打马栏的样子。焦坪之敌看到红军撤走，果然上当，将山梁上的哨兵撤了回去，而我军仅向马栏方向走了30余公里，便就地宿营了。26日夜，我军突然回师焦坪，在拂晓到达后即向焦坪之敌发起进攻。便衣队先行接火，骑兵连一马当先，打得敌人阵脚大乱。焦坪一战，歼敌60多名，缴枪60余支。红二团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战斗结束后，红二团迅速撤离焦坪，经衣食村到香山寺附近休整。在此，红二团协助地方党组织先后组建起香山、芋园、照金、旬邑、宜君五支游击队。1933年3月，红二团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斩断咸榆公路。之后，乘胜南下三原，与渭北游击队会合。4月，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南下泾阳一带活动，沿泾河左岸向旬邑、彬县交界地区发展。不到半年时间红二团辗转战斗，开辟了新的游击区，逐步建立起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的革命武装割据区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后，相继成立了照金、香山、芋园、桃渠原、马栏川、七界石、老爷岭等乡级革命委员会，以及20多个公开或秘密的农民联合会，加强了党组织在乡村中的工作基础，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打土豪，分粮食——红军足迹遍宜君**

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宜君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不仅霸占了全县的大部分土地，还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广大贫苦人民长期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五里镇街大地主韦秉绅，占有全县耕地两万多亩，人称“韦半县”，仅五里镇2655亩土地中，韦家就占了2088亩。“韦半县”采用小斗出、大斗人，强占、出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掠夺农民，经常逼得穷苦人民家破人亡。五里镇牛家庄地主田举儿，也是一个横行乡里、欺压乡民的恶霸。有户外省难民逃荒来到牛家庄，住在村头一孔破窑洞里，靠自己烧瓦盆的小手艺辛辛苦苦维持生计。黑心的田举儿硬说山上的土是他家的，烧瓦盆取土必须出土钱，不但强行抢去这户人家的血汗钱，还将其逼走。

1931年以后，刘志丹率领游击队经常活动于宜君店头、建庄、双龙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救民于水火之中。1932年底，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后，宜君成为红军活动的重点区域。红军每到一地，除了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作战外，还经常为民除害，铲除当地恶霸地主，开仓放粮。

1933年农历二月二，红军来到宜君县五里镇地区进行革命活动，路过县城东南川套滩村时，活捉恶霸地主张怀西，当日处决于五里镇。同年夏收后，红军攻克五里镇。随后，在石堡村打开杨姓三家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全部分给周围的穷人。

1935年6月间，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路过五里镇，张贴“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工农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派，建立中华苏维埃”等大幅标语，宣传革命思想，到石堡村逮捕了恶霸地主杨明建(人称杨七老)，将其拉到白水县处死。同年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再次来到宜君，到套滩村后兵分两路，一路去雷塬至马泉一带活动，打死豪绅地主张凌壁，经蔡道河收缴了雁门山民团的枪支，在八丈塬村镇压了敌区长张左汉；另一路由牛书申、强自珍带领，到牛家庄打死财主田举儿。

1932年到1935年间，红二十六军多次进入宜君进行革命活动，足迹遍布五里镇、焦坪、哭泉、偏桥以及马栏、瑶曲、店头等地，先后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10余人，狠狠打击了地主反动势力，贫苦农民无不为之振奋鼓舞，拍手称快。

**播火种，搞斗争——宜君革命波澜壮阔**

刘志丹等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数次转战宜君，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传播马列主义，唤醒了宜君人民的斗争意识，引导宜君先进分子纷纷加入革命行列，为中共宜君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在红军的影响和帮助下，宜君人民的革命活动从无组织到有组织，革命队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中宜游击队正式成立。1934年，以强自修为首的进步组织“秘密读书会”在宜君县立高小成立。1936年7月，中共红宜县委(中共红宜县委员会简称)在宜君西村乡石堡村成立。从此，宜君人民开始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而斗争。

中共红宜县委成立后，先后在石堡、西舍、尧生、胡家原等村建立党支部。上级党组织根据当时形势，指示红宜县委的首要任务是：秘密发展党员，继续建立和壮大党的地下基层组织。遵照上级指示，红宜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争取在地方上工作，以便用合法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同时，红宜县委还做了大量“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结成统一战线，保卫地方治安”的工作，如改编和成立“抗日义勇军独立第三团”。1936年农历十月，经我党地下组织秘密串联，宜君民团头子郭有让(县保安队队长)与赵世杰(中宜游击大队第十分队队长)联合起来，在宜君东区和南区一带活动，收民间的枪，拉富户的马，先后东渡洛河，北去洛川、中部(今黄陵县)，打了几次胜仗，收缴一批枪支弹药，俘虏部分敌人，队伍迅速增加到三五百人，影响也逐渐扩大。11月间，驻洛川的红二十七军协同中共陕甘工委白区工作部派来的同志来到五里镇，经过多次联络协商，将这部分武装进行收编，命名为“抗日义勇军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队伍收编之际，杨植、王清廉和杨西林同上苏区，向陕甘工委(驻地甘泉县高家哨)汇报收编事宜，张守顺与张继娃到洛川红二十七军驻地领取图章和军旗。1937年春，“抗日义勇军独立第三团”授旗仪式和任职典礼大会在五里镇东门戏楼上隆重举行。红三团的成立，充分调动了宜君地方武装力量的积极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了抗日队伍。

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宜君党组织带领宜君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

# 习仲勋在照金养伤

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再次调集重兵，对照金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在敌重兵压境之时，出没于照金地区的几股土匪武装，乘机与革命政权和游击队作对，其中，陈克敏民团的反动气焰最为嚣张。陈匪驻扎在照金龙家寨上，与薛家寨隔沟对峙，是游击队面临的最直接的敌人。

5月末的一天，习仲勋和黄子文由薛家寨来到党家山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驻地，决定带政治保卫队到薛家寨东南十多里外的北梁开会，顺便在附近征收粮草。次日清晨，习仲勋、黄子文带领政治保卫队一行同志从党家山出发来到房村。正吃早饭时，发现房村以东陈家坡南边的高梁上有四五个人，一直探头探脑地朝这边张望，形迹十分可疑。

陈家坡是一面东南走向的陡坡，正东是深沟，两侧梢林密布，是通往北梁、金盆、高山槐等地的必经之路。习仲勋看刮情况有异，便紧急集合队伍，叮嘱大家要高度警惕，以防中敌埋伏，随时准备投人战斗。很快，政治保卫队按战斗队形编成两路：习仲勋、黄子文带一队直上陈家坡；保卫队队长王金窄带一队绕到陈家坡北面进入村内。同时，保卫队派出三名队员组成尖兵组，指定了联络兵负责两队之间的联系。

习仲勋带领队伍行至半坡时，埋伏在坡顶的匪徒突然开火。尖兵组面对居高临下之敌，未能还击便退了下来。习仲勋见中敌埋伏，敌情不明，附近地形对游击队又极为不利，便果断决定，由黄子文带队迅速撤离现场，一班随他留下阻击敌人。

黄子文刚刚带队离开，匪徒就逼近到距离政治保卫队只有七八米远的土崖上，并再次开枪射击。突然，习仲勋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他的腰部被敌人子弹打伤，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衫。担任尖兵的黄金荣看到习仲勋负伤，疾步跑过来想要搀扶他撤退。习仲勋厉声向黄金荣喊到：“不要管我，你们赶快钻梢林。”此时，虽然习仲勋感到阵阵眩晕，四肢乏力，但他仍保持着清醒的意识，明白自己和队员们处境危险，必须迅速指挥队员们冲出重围，脱离险境。眼看民团的匪徒们就要聚拢过来，习仲勋着急地用眼色示意大家赶快冲到坡旁的梢林里去。遗憾的是，慌乱之中，队员们未能领会习仲勋的暗示，最终全部被俘。

匪徒们吆吆喝喝、连推带搡地押着习仲勋和几个政治保卫队队员往回走。由于受伤后血流不止，习仲勋周身酸困无力，每走一步都步履维艰，渐渐落在押解队伍的后面。说来也巧，押着习仲勋的匪徒周致祥是位同情革命的人，边走边问习仲勋姓什么？哪里人？说看他像个大官。习仲勋告诉周致祥，自己是个百姓，被政府派的粮款逼得没办法才当红军的，姓焦，富平人，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塞给他。周致祥收下其中三块银元，将另外三块退给习仲勋，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大官，我放你跑。”听了这话，习仲勋也不知是真是假，便鼓起全身力气朝沟外跑去。刚经过陈家坡村子，后面就追来几十个匪徒，连珠炮似的边放枪边高喊：“抓活的！抓活的！”习仲勋跑到前面的大沟坡，顺着坡势滚了下去，后来被一棵树挡住。坡上的匪徒们乱打了一阵枪，吹起集合号，走了。习仲勋看着敌人走远了，才慢慢顺着梢林爬了下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由于伤口流血过多，习仲勋渐渐体力不支，最后只好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爬行。西斜的太阳把山路晒得异常燥热，习仲勋感到饥渴难忍，嗓子眼像火烧一样焦灼。他爬到一条小河边，用手掬着喝了几口水，洗净手上的血迹，摇晃着站起来，趔趄着身子慢慢顺着河道向前挪去。

习仲勋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向前挪动，有那么几次，他真想就此停下来，倒在热乎乎的黄土上睡去。但是，潜意识提醒他，不行，不能倒下去。就这样，习仲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意志，挪到河道沟口柳林庄村民郑老四家，受到这位农民和他妻子的细心照料。当晚，习仲勋的伤口血流不止，开始溃烂，整个人发起高烧。郑老四怕习仲勋有个三长两短，连夜将他送到庵子村进行救治。

几天后，为安全起见，黄子文、周冬至组织群众用担架赂习仲勋秘密送回薛家寨养伤。习仲勋的伤情牵动着边区领导和群众的心，边区特委专门指定红军医院的陈守印医生为他疗伤：刘志丹返回照金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习仲勋，一再叮嘱他好好养伤；许多游击队员和当地群众也纷纷前来探望习仲勋，热心地为他四处寻医问药，直至他伤愈。

# 亭子沟贸易集市

1933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到东达高山槐，西抵黄花山，北迄王家沟，南至桃渠原的广大地区。为了活跃根据地经济，调节群众余缺，解决红军物资短缺问题，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于此年春夏之交，在薛家寨下亭子沟口建起了贸易集市。

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请当地人冯彦升任会长，邀请边区群众来亭子沟摆摊设点，公买公卖粮食、蔬菜等农副产品。原本规定五天一集，后来几乎天天集会。集市上的物品主要为粮食、蔬菜等农副产品。粮食有玉米、小麦、小米和豆类；蔬菜有洋芋、萝卜、白菜、大葱、豆角、辣椒等；偶尔还有肉和其他东西。由于集市“招百商不纳税，不设关卡不盘查”，积极保护白区来的中小商人，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集市贸易日渐活跃，上市物资日益丰富，不论苏区还是白区群众，都愿意前来交易。边区后勤干部在集市上坚持公买公卖、群众优先的购买原则，每天开市后，先让群众购买，快到收摊时，所余粮食、蔬菜等，皆由冯彦升代红军悉数收购，派人送。上薛家寨。由于红军给群众付现金，采买价格优厚，且收量不限，亭子沟贸易集市非常受群众欢迎。

亭子沟贸易集市的建立，极大地方便了周围群众的牛活，为红军提供了充足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部分急需物资，解决，了根据地红军物资短缺的问题，成为红军筹集粮秣和资金的有利场所，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提高了群众努力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繁荣了边区经济，为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和巩固做出了积极贡献。

# 王泰吉耀县起义

1933年7月21日拂晓，耀县古城枪声大作。驻扎在耀县县城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千余人起义，通电全国，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王泰吉，字仲祥，黄埔军校毕业，原中共党员，参加并领导了麟游起义和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出狱后，王泰吉栖身国民党杨虎城部，历任杨部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新兵训练处”处长。1931年秋，“新兵训练处”改编为第十七路军骑兵第一团，王泰吉任团长兼西安城防司令。1933年夏，王泰吉骑兵团移防耀县。国民党企图“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任命王泰吉为“剿匪”总指挥。王泰吉不愿打红军，但又不得不执行命令，于是率骑兵团跟在红军后面虚张声势，围而不打，应付了这次“围剿”。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我国东北，继而又向华北进犯，民族矛盾激化，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l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区域、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民众等条件下，愿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同年5月，冯玉祥与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合作，在日寇攻打热河、长城各关口相继告急的情况下，响应号召，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建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积极对日作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早年与王泰吉相熟的谢子长、许权中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奔赴察绥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同盟军守土保国，对王泰吉启发很大。但蒋介石集团不顾民族危亡，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不抗战，反而“围剿”苏区和红军，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加紧镇压。

在内外形势的交相促使下，王泰吉毅然决定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率部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取得党对起义的领导，王泰吉约请何寓础(早年曾是共产党员)作为他的代表，寻找中共陕西省委。同时，亲自找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周芝轩，汇报起义计划。省委于6月中旬派余海丰(宣传部长)和何寓础一同从西安来到耀县。耀县城北的天宝滩风景秀丽，王泰吉一行三人，在农家菜地水井旁绿荫如盖的葡萄架下席地而坐，进行秘密而友好的交谈。王泰吉坦诚地介绍了骑兵团内情及耀县军政详情，余海丰代表省委对骑兵团在国难之际倒戈起义表示欢迎。余海丰、何寓础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后，省委先后派杜衡、刘映胜(杨声)到耀县，具体领导骑兵团起义，三原中心县委也派周芝轩、孙烈到耀县协助起义工作。6月下旬，王泰吉赴西安面见杨虎城，领到一批军饷和装备，并买回大量雨具。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王泰吉和刘映胜再次召开骑兵团连排长及进步士兵秘密会议，具体安排起义事宜。

1933年7月21日拂晓，耀县古城枪声大作，王泰吉骑兵团宣布起义。王泰吉骑着枣红战马，起义军袒露系着红布条的左臂，扛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大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头冲向国民党耀县政府、保安团、民团、公安局。经过激战，起义部队迅速收缴了耀县城内所有反动武装(胡景铨民团、雷天一保安团和公安局、县政府)的枪支，收编了他们的部队，占领耀县县城，张贴布告，通电全国，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义勇军总司令，省委派刘映胜任政治部主任。义勇军成立后，布告安民，宣传抗日，开仓放粮，释放全部在押“犯人”，逮捕了当地一批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中午12时，义勇军在耀县西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公开处决了耀县南区反动区长张恒义，没收分配了城内两家大地主的财物和县政府的存粮，极大地振奋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扩大了抗日影响。此外，义勇军还协同中共耀县县委成立了由市民代表组成的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起义第二天，耀县游击队成立。义勇军拨给游击队一批枪支，有力地支持了地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

义勇军在耀县城里活动7天后，为了争取国民党其他部队的起义，改变原定北上白水、澄城的计划，南下向三原进发，开到武字区陵前镇时，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不料，部队南下到三原心字区辘轳把村时，突然与国民党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遭遇，被敌重兵包围，战斗失利。部队退至耀县小丘镇，再遭追敌袭击。再次失利后，王泰吉率余部100余人，携带部分辎重北上陕甘边照金苏区。义勇军到达照金后，受到陕甘边党政领导人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的热烈欢迎。

王泰吉耀县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震撼西北，意义重大。起义部队进入照金苏区后，壮大了苏区的武装力量，缓解了苏区的危机局面，为保卫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 耀县游击队

王泰吉耀县起义之前，中共耀县县委领导农民群众先后开展了抗粮、抗税等一系列革命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群众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血的事实和教训证明，没有人民的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必须拿起枪杆子，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1933年6月，中共耀县县委在县城北街曹雯(共产党员)家里召开秘密会议。会上，省委代表杜衡通报了王泰吉骑兵团要在耀县举行起义，要求耀县县委全面配合，并提出县委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一耀县游击队。

7月21日，中共耀县县委在曹雯家里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就配合骑兵团起义具体工作进行研究，决定立即组建耀县游击队。7月22日，根据县变决定，陈学鼎(共产党员)借赵连璧(北区民团团长)生炳的有利时机，以老同学和曾任过东区区长的身份来到北区民团，代理了民团团长，并将这支队伍全部拉到阿姑社村，协同陈国栋带领的同官西区农民起义军，击败阿姑社地主武装，智取阿姑社城堡，使这次农民起义取得成功。此时，早先发展的40多名共产党员和50多名赤色群众，亦纷纷回来参加起义军。中共耀县县委直接领导的耀县游击队就此成立，陈学鼎任队长。耀县游击队成立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通过县委给游击队拨来10多支枪。县委又利用社会关系，收缴了北区民团的全部枪支，将民团中倾向革命的团丁吸收为游击队员；还利用雷天一民团内部人员的关系，弄到一部分枪支、弹药，加强了游击队的武器装备。

耀县游击队组建后，积极配合王泰吉起义部队在乡村开展革命斗争，捉拿并处死了民愤极大的北区恶霸地主左善楚兄弟三人，将没收的左家粮食、财物分配给周围群众，并在阿姑社村召开群众大会，当场烧毁左家的土地和债权契约。接着，游击队由孙家塬党支部书记蔡奉凯带路，到东区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张廉明。游击队的革命行动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不少青壮年自愿参加游击队，使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八九十人、六七十支枪。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向三原进发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耀县县委带领游击队转移到白家庄一带，继续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分了周家地主的粮食。同时，对游击队进行整编，张邦英任党代表，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随后，游击队向西北方向挺进，经过墓坳、高山槐，转移到照金，进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壮大了苏区的武装力量。

# 薛家寨保卫战

1933年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机关迁驻薛家寨，薛家寨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薛家寨高峻突兀，地势险要，根据地军民据险筑堡，扼要置关，改造山寨，整修崖洞。红军游击队上寨后，首先加固了前后哨门，增筑碉堡，设岗放哨。同时，在党家山、鸡儿架等处设立哨卡，周围布下地雷、滚石垒及战壕、暗道等防御工事。红二十六军相继在寨上建起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和后勤仓库等单位。

红军主力部队的迅速恢复和壮大，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照金苏区的失败，使国民党最高当局非常震惊。蒋介石数次严令西安绥靖公署调派重兵“围剿”照金苏区。根据地军民，特别是薛家寨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不畏强暴，展开了激烈的薛家寨保卫战。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刘文伯部纠集耀县夏老幺(夏玉山)、雷天一民团和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五县民团计千余人，乘红军主力离开照金外线作战之机，勾结叛徒陈克敏，兵分数路，从黑田峪、鸡儿架、后沟、南趟、桢树岭等地，率部向照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企图迅速侵占根据地中心——薛家寨。

9月21日拂晓，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和特委委员张秀山率领游击队主力撤出老爷岭战斗，回到秀房沟还未来得及休息，黑田峪就冒出一股敌人，游击队立即投入战斗。经过几小时的激烈战斗，游击队以少胜多，击败黑田峪方面的进攻之敌。与此同时，夏老幺民团和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民团千余人，在叛徒陈克敏带领下，从薛家寨后梁发动进攻。由于红军游击队主力在外线作战，薛家寨此时仅有边区革委会政治保卫队留守。在这兵寡势孤、情势危急之际，寨上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工人干部和妇女游击队的全体同志，纷纷拿起武器，进人各个哨所路卡，投身战斗。进犯之敌凭借人多势众和优良装备，轮番发动猛烈进攻。游击队据险固守，巧布地雷战，以修械所研制的“麻辫手榴弹”和滚石等武器顽强抗击，阻敌于坚壁之下。酣战中，山风骤起，大雨滂沱。游击队坚守在各个哨位上，冒雨杀敌，愈战愈勇。李妙斋和张秀山击退黑田峪之敌后，立即率游击队主力从秀房沟赶回，冒雨增援薛家寨。他们脚踩泥泞，翻山越岭，爬上前哨门，迅速到达后沟后，立即散开部队，加强各哨位的阻击火力，对敌人进行猛烈反击。薛家寨一时枪弹齐鸣，石雷滚滚。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游击队的猛烈反击下，敌人军心涣散，最终狼狈溃退。

薛家寨保卫战取得胜利。

# 革命烈士李妙斋

李妙斋，原名王玉玺，曾任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队长、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陕甘边特委委员等职，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1903年5月16日(农历四月二十日)，李妙斋出生在山西省汾西县一个贫苦家庭，先后在当地堡子庙初小和甘河高小读书，毕业后在本县佃坪小学任教。教书一年多，因家贫遭到欺压和排斥，李妙斋只得回家务农。1927年5月，因为在镇上看戏受到侮辱，李妙斋辞别父母、妻儿，踏上外出寻求真理的道路。

1932年秋，李妙斋跟随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辗转旬邑清水原、三原武字区和耀县照金、芋园一带，宣传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被留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芋园村开展地方武装斗争。10月，李妙斋在芋园建立起照金地区第一个农民武装一芋园游击队，并不断向周围村庄发展，政治影响越来越大，使芋园成为照金最早“闹红”的地方。

l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后，根据中其陕西省委部署，决定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肃清照金腹地和周围地区反动民团及政权机构、创建苏区的工作中，刘志丹高瞻远瞩，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对地方民团应区别对待：凡与我军为敌者，待我军力量壮大后消灭之；凡与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保持中立者，则尽量继续争取他们，维持现存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根据刘志丹的意见，李妙斋只身前往庙湾与夏老幺民团谈判。李妙斋走后，红二团攻打了焦坪之敌，这对只身前往庙湾民团谈判的李妙斋的人身安全极为不利。然而，到达庙湾后，李妙斋从容镇定，极力说服夏老幺，双方约定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最终机智地完成了任务，安全回到部队。刘志丹看到他回来，风趣地说：“你可回来了，我们正准备给你开个小小的追悼会呢！”

1933年2月，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3个正规团“围剿”照金苏区。敌人在芋园包围红二团时，李妙斋指挥游击队员把红军伤员悄悄转移到龙家寨。敌人刚走，李妙斋又组织群众乘天黑把驻在阴坡小庙的红军伤员转移到兔儿梁后面的树林里。得知敌人要到兔儿梁搜查，李妙斋又连夜将红军伤员转移到黑田峪何。敌人撤走后，李妙斋又指挥群众协助游击队员把红军伤员转移到兔儿梁隐藏起来。在频繁的转移中，一些重伤员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李妙斋积极想办法为他们治疗，使伤员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最终康复。

1933年9月，国民党军刘文伯部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五县民团“围剿”照金苏区。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李妙斋和张秀山带领游击队主力到高山槐、老爷岭一带与敌作战周旋。21日拂晓，李妙斋和张秀山撤出老爷岭战斗，刚回到秀房沟还未来得及休息，黑田峪就冒出一股敌人，游击队立即投入战斗。经过几小时的鏖战，游击队以少胜多，击败了这股进犯之敌。与此同时，夏老幺庙湾民团和耀县、淳化等地民团千余人，在叛徒陈克敏的带领下，从薛家寨后梁发动进攻，企图攻占根据地的中心——薛家寨。薛家寨上告急，大雨滂沱中，李妙斋和张秀山立即率游击队冒雨增援薛家寨。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取得胜利。

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见敌败退，走出北哨门堞墙，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时，被埋伏在梢林里的敌人击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0岁。根据地百姓用自己父母的棺材收敛了英雄遗体，安葬在薛家寨上。

# 心系革命重返照金

1933年6月21日，在杜衡的错误决策下，红二十六军二团挥师南下。7月10日，部队在蓝田县张家坪遭敌突袭，红二团战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兵败终南山。

红二团在张家坪被敌军冲散后，分三路突围出来。汪锋带六七十名战士从界碑沟突围，翻越北坪、新店子、鸭峪到达窄峪川的卡房。后因敌人追来，转由半沟向野竹坪、葛牌镇行动。途中，部队多次与地方民团遭遇，战士伤亡很大。突围到甘家坪时，只留下随营学校校长赵启民等十数人。汪锋负伤后，留在当地养伤，其他同志化妆成农民，分散出山。刘志丹带领一部分战士沿公路突围几公里后，调头上了终南山，到蓝桥一带，又由蓝桥向北辗转于深山密林之中。他牵挂着失散的同志，几乎每天都派人外出联络。红二团战士多是陕甘边区的人，对蓝桥一带的地理极为不熟，加之部队整日流动，没有固定的地方可找，结果只有派出的人没有回来的人。就这样，刘志丹带领部队在密林中坚持了20多天。王世泰带部队突围到两岔河北山后，将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保留二连番号，补充了战士，仍由吴岱峰当连长，高锦纯当指导员，余下的人直属团部领导，由杨文谟负责。他们在两岔河一带活动大约一个多月，部队经常没有吃的，没有宿营地，生活异常艰难。

突围出来的三股部队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由于环境恶劣，四面受敌，战士疲惫，生活无法维持，只好做出分散出山、返回照金的决定。数日后，王世泰和刘志丹在石头峪后山重逢，一行人朝着华县方向运动，两天后到达华阴庙的南山梁豁口，夜宿半山坡，遭暴雨、山洪袭击。天亮后，部队继续西行，三天后又转回坝龙庙一带，住在薛增平(原渭华起义大队长)家。薛增平向当地民团暴露了刘志丹等人的身份，使大家面临随时被包围和袭击的危险。紧急关头，刘志丹沉着冷静，带领一行人机智地逃出险境。几天后，刘志丹等人在箭峪后沟碰到省委派来营救红军的黄子文以及渭南县委地下党的同志，在向导的引领下，他们连夜下山，天亮前到达黄麓口，找到党组织。

在黄麓口，刘志丹、王世泰等在当地党组织的引领下，为民除害，枪杀了宋家斜恶霸宋宗武。枪杀宋宗武次日晚，在地下党员王杰的引导下，刘志丹、王世泰一行来到华县赤水镇。赤水一带，敌人封锁极严，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刘志丹、王世泰等人。赤水渡口，敌人有一个排把守，盘查森严。为了确保刘志丹的安全，渭南县委同志反复研究后决定，派几名水性好的地下党员，夜间护送刘志丹、黄子文、曹士荣泅渡，闯过敌封锁线。王世泰和李胜云(黄子文的爱人)假扮夫妻，以走亲戚为由哄骗敌人，从敌严兵把守的渭河渡口携枪过河。顺利过河后，刘志丹一行先后来到白家庄，刘志丹住在张文华家，王世泰住在白思堂家。

在白家庄期间，刘志丹一行白天隐蔽，夜间出外活动，打土豪劣绅，筹集路费。一天，当地地下党组织报告，敌人两只满载面粉的船，搁浅在白家庄南边的河滩上，他们研究决定夺面救灾。后由王世泰、白思堂、张我公带领数百名群众，夺走敌人两船面粉，全部分给群众。

此后，敌人发疯似的到处搜捕参与这一行动的指挥者和群众。为确保刘志丹的安全，地下党组织将一些路费和一副货郎担子交给他。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曹士荣一行4人，买来衣服及其他物资，将枪支藏在箱底夹层之中，打扮成货郎模样，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沿着蒲白山路北上。

回照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近路，从蒲城、富平、耀县走；一条是远路，经蒲城、白水、洛川、富县、甘泉、保安、会水、宁县、正宁、耀县10县，绕道回去。敌人刚刚打过王泰洁起义部队，近路沿途哨卡林立，封锁严密，通过困难。远路，虽然路线长，费时间，但沿途有我们的关系，比较安全。最后，刘志丹一行4人决定舍近求远，绕道回照金，并根据各人情况分工，白水以南由黄子文负责，洛川以上由王世泰负责，保安以西由刘志丹负责。就这样，刘志丹一行4人，西进保安，经大凤川，两天后至合水县包家寨。由包家寨动身进子午岭，途经五亭子、芦包梁、艾蒿店、马栏川、老爷岭，顺桥山山脉南下，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安全返回照金。

1933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五日)，照金苏区广大群众欣喜地奔走相告着“志丹回来了！志丹回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很快，刘志丹一行出现在大家面前。看着历经磨难平安归来的他们，在场的人们一时百感交集。根据地领导、红军临时指挥部负责人、游击队领导以及先回到照金的红二团战友们，纷纷迎上前去，拉起他们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着。

# 薛家寨突围

l933年1 0月中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4个正规团及周围各县民团以数千之众，携带迫击炮、重机枪等武器，向照金苏区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同时，沿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边境构筑了一条堵截线，以十七路军特务团为主力，占领龙家寨，与薛家寨形成对峙局面。

10月13日，国民党军孙友仁特务团和夏老幺、雷天一等反动民团约两千余人向薛家寨扑来。敌人用迫击炮轮番轰炸我方阵地，火力凶猛，炮声隆隆，但由于技术差、距离远，游击队在山上构筑的工事坚如磐石。见我方防御工事毫发未损，敌人又将炮火集中于我岩洞内工厂猛烈轰击，因为距离较远，炮弹都落在堞墙外面。敌步兵和民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几次试图登山，都被游击队打退。此时，主力红军外线作战未归，坚守薛家寨的只有少数游击队和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及后勤人员400余人。在敌强我弱的危急时刻，游击队员和红军后勤人员在各处险要关隘全力扼守，严守寨门及寨北崾峻勇猛抗敌，在我前沿阵地大量地雷的杀伤下，敌人的进攻屡遭失败。激战一直持续了5天，我游击队员愈战愈勇，薛家寨巍然不动。敌人见强攻不行，便改用偷袭战术。在我石门工事和后山崾岘阵地之间的悬崖边沿，峭壁上有一道200多米高的石缝，石缝里长满了小柏树，由于石缝边沿陡峭直立，我军未曾设防。

10月1 8日夜，敌特务团100多人由叛徒陈克敏带路，从石缝间攀树上寨，上山后散开埋伏。清早，埋伏在薛家寨上的敌特务团突然向我阵地冲来，冲在前面的敌人，距我方阵地仅有几十米距离。驻龙家寨敌军，见我方防御工事被突破，即令炮兵向我阵地发射炮弹百余发。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我军堞墙被炸倒，寨门洞开，寨门守军一个班伤亡殆尽，敌人从寨门蜂拥而人。

在敌众我寡、腹背受敌的危急关头，边区党、政、军领导人果断做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定。游击队总指挥吴岱峰、政委张秀山率保卫队与敌激战，且战且退，在薛家寨崾峻东边悬崖边，将白布挂在悬崖树上，全体指战员依次坠到山下。后遇见习仲勋同行，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与十七支队会合。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带领一部分同志从黑田峪方向撤走。由于山路狭窄，敌人兵力施展不开，我突围部队在后卫部队掩护下冲破堵截，很快甩掉了敌人，转移到照金以北的后山崾岘哨门旧址安全地带，薛家寨失守。不久，习仲勋带领边区领导机关留下的部分游击队在照金地区继续坚持战斗，其余部队北上甘肃与主力红军会合，并以南梁地区为中心，继续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国民党军队占领薛家寨后，纵兵劫掠，大肆烧杀，反动民团和逃亡地主也纷纷反攻倒算，到处搜捕和屠杀革命群众，照金苏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 周冬至烈士

1929年，陕西关中大旱，八百里秦川饿殍遍野，官道上逃荒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沿路乞讨，甚至卖儿鬻女，生活苦不堪言。

在浩浩荡荡的逃荒人群里，周冬至的母亲带着面黄肌瘦的5个孩子，踉踉跄跄地行走着。大旱之年，父亲外出寻粮半年未归，传说饿死异乡。母亲拉扯着周冬至姊妹5个，实在难以维持生计，一家人只得离开富平中合村老家，出门逃荒。

逃荒路上，周冬至母子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走到三原前时，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无奈之下，母亲忍痛将冬至的大和一个小妹送人。身经分离的不幸，目睹沿途饥民的哀鸣，冬至痛心疾首。后来，冬至母子乞讨来到耀县照金，投奔到父结拜兄弟王明发家中。这样，一家人才在照金安顿下来，兄弟俩给人打短工维持生活。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奇袭了驻扎在照金的反动民团，当街宣讲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周冬至看在眼里，记在心上。6月，周冬至闻知习仲勋同到富平，立即以回家探亲的名义赶回，见到习仲勋，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回到照金后，周冬至和一帮穷兄弟秘密组织起“农工会”，积极协助游击队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秋，习仲勋来到照金。在习仲勋、周冬至的领导下。以老爷岭为核心的照金贫苦农民开始组织起来闹革命，斗争的形式从地下转向公开。10月的一天，习仲勋、周冬至在岳家山陈德功家开会，研究武装斗争问题。大家在习仲勋的主下宣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甘洒热血为人民，视死如归心不变”。是日夜，习仲勋和周冬至带领大家到照金地区打击了一户地主，得子弹三袋，大洋500块，为游击队筹集了经费，取得第一次斗争的胜利。不久，周冬至加入芋园游击队，后任政治保卫队指导员。

1933年3月，红二十六军先后歼灭照金周围反动民团，逐步形成以照金薛家寨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把薛家寨建设成红二十六军的大本营和后方基地，李妙斋任命周冬至担任筑路总指挥，拓修上山的道路。周冬至接受任命后，立即动员和带领农会干部群众，修筑秀房沟通往薛家寨的盘山道路，并在山上筑堞墙、建哨所、修掩体、设炮台、挖交通沟，构筑防御工事。4月5日，陕甘边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照金兔儿梁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被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此后，在副主席习仲勋的鼎力协助下，周冬至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为巩固和发展照金苏区做出了卓越贡献。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孙友仁部围攻薛家寨，敌人在叛徒陈克敏的带领下，从后山石缝处攀树上寨，攻破我军阵地，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游击队被迫突围，薛家寨失守。周至到与部分战士且战且退，从后沟巴退出。国民党军队占领薛家寨后，纵兵劫掠，大肆烧杀，到处搜捕和屠杀革命群众。周冬至率政治保卫队坚持活动在照金、柳林、庙湾一带。11月3日，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周冬至被任命为三路游击区第九支队队长，林万荣任政治指导员

1934年初夏，国民党马鸿逵和何高侯部率兵进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交战中马部败北，一个侦察排慑于红军威力，投降过来。其中，该排一个班共13人被分配到周冬至支队。当投诚班长马某以人熟好领导为由，提出不能将他们分散整编的无理要求时，周冬至默认了他的请求，同意只换番号，保持原班人马，随支队一起行动。

11月中旬，正是收荞麦季节，桥山林区下起了小雪。周冬至和林万荣率领九支队在郭家川护秋，夜宿甘草坪。部队驻扎在一孔窑洞中，周冬至、林万荣等6人住在另一孔窑洞中。子夜过后，轮到马班长上哨。他乘大家熟睡之机，下掉枪栓，收走手榴弹，唤醒他的一班人，堵住了两孔窑门。周冬至和林万荣被叛变的枪声惊醒。当他们打算往外冲时，窑门早被马班长反锁，随着砰砰的枪响，子弹从窗口嗖嗖飞进窑里，周冬至、林万荣等人奋起还击。突然，丧心病狂的敌人将几枚手榴弹扔讲窑里。随着手榴弹的剧烈爆炸，周冬至、林万荣等人倒在血泊之中。最后，敌人打开窑门，将身受重伤的周冬至等人拖到院子里残忍杀害。周冬至壮烈牺牲，年仅23岁。

为了纪念烈士，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将周冬至生前战斗过的陕甘边苏区老爷岭乡命名为“冬至乡”。

# 陕甘边妇女游击队

1933年初，在桥山子午岭南端的陕甘边照金地区，活跃着一支妇女游击队。她们身背钢枪，手执大刀，肩扛长矛，怀揣手榴弹，跟随刘志丹、习仲勋、李妙斋开创陕甘边照金苏区，成为陕甘边照金苏区放哨、送信、护理伤员、缝制军装、与敌战斗的一支红装劲旅。

时过79个春秋，至今仍传颂着这支未留下几人姓名的巾帼英雄的故事。

**香山寺探敌情**

1932年底，红二十六军二团由焦坪、金锁、石柱原转战到瑶曲衣食村“打富济贫”，拔掉不少国民党地方政权及民团钉子，使红军声威大振。时值灾荒，国民党的横征暴敛使边远山区的贫民生活更为困难。为救民众于水火，红军通过根据地党组织派出四名妇女前往香山寺，以进香名义侦察香山寺周围敌情及贮藏粮食等情况。四名妇女历经数天，完成了侦察任务，探明香山寺内存粮3000石左右，还有香客们进贡所积存起来的熟食库、布匹库、油库等。

1933年1月4日(农历十二月初九)，红二十六军二团带万名饥民进入柳林香山寺，开仓放粮。饥民们拿着装粮的口袋，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背粮而去。这次开仓放粮，不仅使红军的物资给养得到了极大补充，而且更加密切了党群关系。广大饥民无不感激红军和共产党的恩德，其中大多数人在以后相继参加了革命，不同程度地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派遣妇女侦察香山，是30年代初照金妇女参加革命的先例，为妇女冲破封建礼教和迷信的束缚、走出家门闹革命带了头，是党的男女平等的主张在照金地区深入人心的结果，也为以后组建妇女游击队奠定了基础。

**妇女游击队在北梁成立**

1933年2月上旬(正月十五前后)，李妙斋率陕甘游击队到达照金北梁村，对地方干部白明礼布置了一项任务，要他通知照金妇女委员会“在最近动员一些妇女到薛家寨去当红军”。还说：“要注意动员那些受压迫最深的妇女。”白明礼还未听说过妇女能当红军，便打趣地问：“你当指挥，是个带兵的，叫妇女上山去干什么？打仗成天风风雨雨，黑黑明明，妇女能当红军吗？”李妙斋笑着说：“这都是革命需要嘛！”他语重心长地告诉白明礼：“男同志要经常外出打仗，一些伤员留在山寨上，需要人放哨、护理、做饭。再说现在反封建了，妇女也要革命嘛！”白明礼按照李妙斋的指示通知北梁妇委会，很快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组建妇女游击队的问题，并着手进行宣传动员工作。

2月中上旬，北梁妇委会在阮金莲、柳金花、吴玉珍等妇女党员的领导下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老爷岭、杨家山、高山槐、金盆、韩家山、安子坡、陈家山、菜子坪、谢家庄、窑儿沟等村的妇女，多数是遭公婆虐待的媳妇，还有少数红军战士之妻及青年妇女积极分子。会议通过动员，采取自愿报名、大家评议、组织审察批准的办法，选拔了狼窝村的王有莲、北梁村的白老二之妻李××、韩家山的杜大莲、谢家庄的黄海娃之妻及菜子坪的朱来发之妻五名妇女，组成陕甘边照金妇女游击队，由王有莲担任队长，首批登上薛家寨。以后逐渐发展队员30多人。

妇女游击队起初驻在薛家寨一号寨中，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加，迁到党家山娘娘庙山寨中。那儿有三个大石庵，她们以石庵为家，筑堞墙，修哨所，利用门前小溪为红军浆洗衣裳，同时还担负着护理伤员、缝制红军被服和送信等任务。

**一只笤帚把的故事**

春季的一天，女游击队员杨秀珍去稠桑涝池村送信。晚上，歇息在涝池村的一位亲戚家中。

夜半时分，突然来了一股行劫的土匪。狗在狂咬，院门被敲打。这是一个独家庄，怎么办呢？杨秀珍急中生智，抓起扫炕的一只笤帚把，用手绢一包当手枪；将毛巾往头上一结，装扮成男子模样，同这家男主人一块儿与土匪斗智斗勇。

是夜，月明如昼。当土匪砸开院门刚刚闯进院子，杨秀珍便冲出窑门，手执“盒子枪”大喊一声：“红军在此，谁敢抢人，谁动打死谁！”数十名张牙舞爪的土匪被这突如其来的手动和喊声吓呆了，一个个钉在院中，谁也不敢妄动。杨秀珍手提“盒子枪”，厉声厉色地将土匪逼送出院门。可恶的土匪在退到门外坡上时，朝着这位满口女音的红军战士胡乱地打了几枪，仓皇逃跑。一发罪恶的子弹，击中了杨秀珍的右腿。在那医药奇缺的30年代，导致她终身残废，后来抱疾而亡。

杨秀珍用笤帚把当手枪智斗土匪的故事，一时被传为佳话。她是耀县稠桑人，曾任北梁妇委会委员。

**英勇保卫薛家寨**

1933年9月21日清早，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庙湾、柳林、瑶曲、稠桑以及照金的反动武装，在夏老幺的指挥下，乘红军主力北上作战、后方空虚的机会，发动了对红军大本营薛家寨的偷袭。敌人从党家山、南趟、后沟巴、黑田峪、杠树岭等地同时行动，其目的是想分散红军守寨的有限兵力，妄图从后沟巴方向偷袭占领薛家寨，使红军失去后方中心营区。

敌情，就是命令。妇女游击队员们同男同志们一块儿参加了保卫薛家寨的战斗。后沟巴的女战士用麻辫手榴弹阻击敌人；被派出的10多名女游击队员，手执大刀，背着麻辫手榴弹，前往黑田峪、杠树岭阻击敌人。当叛徒陈克敏带17名匪徒，每人身挎双枪，从黑田峪路上由东往西通过时，担负阻击任务的英雄女战士，手执大刀，隐蔽在路边山坡的灌木丛中，密切注视着敌人的行踪，时刻准备去夺敌人的枪支。就在走在最前边的4名敌人被男同志击毙，余敌调头朝黑田峪方向逃跑之时，勇敢的红军女战士从灌木丛中掷下一连串麻辫手榴弹，切断了敌人退路。敌人慌忙扔下枪支，丢下三具尸体，妄图绕道南趟回龙家寨，又被埋伏在那里的红军战士迎面痛击。女游击队员们在枪声四起的混战中，勇敢地冲出梢林，拾回敌人六七支枪，武装了自己。傍晚，她们从箭穿崖方向开始撤退。整整一天，妇女游击队员们没有吃一口饭，没有喝一口水，此时，她们才感觉到饥饿和困乏。妇女游击队员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手扒石棱，爬过箭穿崖，在山下村子讨得一点吃的，垫垫肚子，艰难地爬上了薛家寨。

**视死如归的巾帼英儿**

10月13日，陈克敏勾结国民党十七路军孙友仁、王根营部进人照金，包围了薛家寨及党家山地区。敌人将大炮搬上龙家寨，向红军大本营薛家寨进行轰击。从13日下午开始，敌人向薛家寨炮击六天。女游击队员隔沟望着敌人在龙家寨的举动，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炮声隆隆，她们毫不畏惧，机警地监视着敌人可能爬上薛家寨的每条小路，数记着敌人发射的炮弹数。敌人发射的第一炮，炮弹刚一出炮筒，就将填弹手打上了天，她们高兴地哈哈大笑。敌人大炮的射程并不远，由龙家寨向薛家寨轰击，连续三天，炮弹还未飞过秀房沟。第四天才射到薛家寨半山的石崖上，把搭在二号寨口的木棚支架震得吱吱响。山下敌兵千万，山上红军稳如泰山。

18日拂晓，敌人组织了百人敢死队，乘黎明前黑暗之机，从石缝间偷偷爬上薛家寨。红军坚守哨门的12名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搏斗。急剧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山上的红军战士多牧已经撤离，仅留少数守卫营寨和看押犯人的人员及30余名女红军战士。枪声激烈，炮弹飞鸣，敌人又从三号寨子下的石渠中爬了上来。妇女游击队队长王有莲指挥女战士增援前哨门，由于人少力单，未能阻住。一号寨西边的山梁上，倒下了几名战友。她连忙指挥大家往薛家寨山顶撤退。如狼似虎的敌任一看红军是女的，直朝山顶追去。红军女战士边还击边撤退，一直退到山寨东北的石崖断壁上，无路可退。威武不屈的巾帼英儿，视死如归。有的高举引火的麻辫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扣动枪机，发出最后一颗子弹，为国尽忠；20余名女战士跃身跳下悬崖，壮烈捐躯。唯有王有莲为了掩护战友，牵制敌人兵力，沿着山梁朝东边方向边跑边射击。她以灌木丛为掩体，在三号寨顶的山梁上与追击她的数十名敌人周旋着。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没有了，她就时隐时现地与敌人捉迷藏。中途碰见看管金库的小红军战士陈天岗，正由三号寨向山顶撤退。她让陈天岗“快往三号寨跑，敌人从山梁上追上来了！”小陈说：“敌人已经抢占了三号寨！”山梁上下的敌人将王有莲和陈天岗团团围住。由于有灌木丛作掩护，敌人不敢靠近。

战友，战场之友，生死与共，情同手足。在这危难时刻，大姐姐王有莲静静地望着小弟弟陈天冈，轻轻将他按下，奋身冲出梢林，倒在敌人的乱枪之下，长眠在薛家寨三号寨东边的山梁上。王有莲牺牲的那一天，上穿绿布衫，下穿大红裤，保留着中国妇女独有的美丽形象。

**幸有三人还**

薛家寨失守后的第六天，韩家山的女游击队员杜大莲和谢家庄的黄海娃之妻回来了。这真是一件出乎人人们意料的大喜事。

在敌人进攻薛家寨的日日夜夜里，她们同男同志一起，站岗放哨，参加战斗。薛家寨同党家山接壤，她们在队长的指挥下，经后沟巴到薛家寨参加过疏散物资的工作。18日拂晓，枪声把她们从战壕中惊醒。前哨门12位红军战士被敌人包围，待她们前来增援的时候，这些男同志已全部遇难。敌人将她们追上山，大喊“抓呀！花媳妇！”革命、杀敌，是红军女战士的志愿；纯洁、清白，是红军女战士的情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面对冲来的强敌和眼前的绝崖深渊，她们两人也选择了后者。原想一梦走，碎尸落清白，谁知被山腰的藤蔓和树枝架住，不省人事，又渐渐地被冷风吹醒。她俩抓住树枝和藤蔓，在石崖上挣扎，忍着全身的疼痛，小心翼翼地挪步下滑，幸荐了下来。山上，川道，尽是敌人的巡逻哨。她俩白天隐蔽在灌木丛中，夜晚往回爬行，身上被荆刺划破，双腿被摔伤，仅仅十来里山路，爬行了四天。后来终于被乡亲们发现，这才将她们接回了家。

另一名跳崖女游击队员同风云，三原人，被人们发现还幸存健在时，已是几十年后的事。

巍巍薛家寨，苍苍党家山，长眠着红军女战士的具具躯骨；青青松柏树，潺潺田峪河，系荡着红军女战士的幽幽忠魂。照金的山山水水和照金的人民群众，将永远铭记这群为家乡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红军女战士们。

# 刘志丹在照金

**“狡兔三窟”**

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二团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失败后，了恢复发展红军主力，粉碎敌“围剿”，坚持并发展以照金为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了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部，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游击队、红四团统一起来集中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红军和游击队先后取得张镇、合水城、毛家沟等重大胜利。然而，就在我红军主力攻甘肃合水县时，国民党乘机重兵“围剿”照金苏区，薛家寨失守

薛家寨失守后，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军后方机关在游击的掩护下，分路突围出来，北上甘肃与主力红军会合。1933年11目3日至5日，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在甘肃省会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同时，与会同志在刘志丹的提议下，认真总结了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和陕甘边照金苏区失守的教训，一致认为：进行武装斗争，只有一个根据地不行，必须建立几个根据地，才能使红军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所渭“狡兔三窟”也。为此，会议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今子长县)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甘肃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

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特委即派干部分赴陕甘交界的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辟游击区。1933年冬，第三路游击队在原照金几支游击队和平子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l934年2月，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宜君七里镇小石崖(今延安市黄陵县辖)成立，总指挥张明吾，政委黄子文，主要活动在正宁、旬邑、淳化、耀县、黄陵、宜君一带。第三路游击队成立后，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大力帮助下，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在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和第三路游击队的共同努力下，照金苏区逐渐恢复。此后，除第一路游击队遭到较大挫折外，第二路游击队也在红军主力的帮助下，得到迅速发展。

**四进石堡村**

石堡村是宜君东北部的一个小村子，在宜君革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共红宜县委的诞生地和中共宜君县委驻地，是宜君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策源地和宜君地区革活动的中心。早在1932年到1935年期间，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领导的陕甘工农红军，就曾先后四次来到石堡村，散发传单，书写标语，打富济贫，除暴安良，进行革命活动。在这个平凡的村庄，他们传播了马列主义真理，点燃起熊熊革命烈火，特别是启迪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为扩大红军队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培养了人才。

1932年农历四月六日，刘志丹、杨森、高岗、阎红彦等，率领红军约1000人来到石堡村。刘志丹和杨森住在官庄杨青山家，高岗和阎红彦住在隔壁院里。在石堡的三四天里，他们将北府杨开太、南府杨举善及杨万钧三家的小麦、糜谷、豆类等近万斤粮食，以及杨汇川家的两皮箱衣服，云辉村一个地主家的衣物、布匹等，全部分给石堡和周围村庄的穷苦人。同时，在村里传播革命思想，书写张贴了“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等大幅标语，随后南下开往雁门山。红军在石堡村的革命活动启迪了村里的年轻人，杨郭启受到红军宣传教育后，参加了红军部队。

1933年农历五月某日傍晚，刘志丹部一支红军队伍经五里镇来到石堡村，住了一晚。这次，受红军革命思想的影响，石堡村青年郭忠孝、韦随坤、杨百万、王兔娃等人，积极加入红军队伍，从石堡出发开往洛川，北上边区参加革命。

1934年农历二月二日，红军在刘志丹、杨森、牛书申的率领下，从焦坪经背甲申到五里镇。五里镇区长王某某、胡某某纠集区丁二十余人，在石堡塬畔伏击顽抗，红军除从正面攻击外，骑兵又从左(柳林沟)右(董家洼)两侧包围，除王、胡逃跑外，全歼敌人。战斗结束后，红军一行来到石堡村，村中青年杨志和、杨录林、杨景西先后随红军而去，参加了革命。

1935年6月夏收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杨森和牛书申带领下进人宜君东部地区，骑兵团在团长康建民、政委高锦纯率领下，从五里镇前川道官村取道马家山直人石堡村，逮捕了无恶不作的土豪杨明建(人称杨七老)，将其拉至白水县新尧镇芝芬村处死。

**重视统战工作**

刘志丹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特别重视搞好统战工作。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期间，面对各种武装力量犬牙交错而革命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客观形势，刘志丹认为游击队不能到处树敌，使自己陷于孤立。在他的领导下，我军采用各种灵活方法，争取和团结了一批地办武装力量，为我所用。

在领导游出队期问，刘忐丹经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敌人结成统战关系。他曾通过当地“哥老会”的旧同事、社会上的老熟人等，先后与庙湾夏老幺、建庄贺世兴、小石崖罗连成、嵩咀铺贾世才、太白镇李绪增等地方民团建立统战关系，相互约定：结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例如，我军将缴获的炯土、大洋、牲口等，送给民团一定数量，请他们帮我军代购急需的子弹、医药和粮食，掩护伤病员，探听敌情，等等。与地方民团友好关系的建立，既化解了我军可能面临的敌对力量，大大方便了我军的行动，又帮我们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1933年冬，红军游击队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缺衣少食不说，部队经常连续作战，指战员和战士的体力消耗极大，很多人不幸染上伤寒，病情严重。张邦英在合水战斗中染上恶疾，连日高烧不退，以至无法行走。刘志丹了解到战：上们的病情后，给嵩咀铺民团团总贾世才写了一封信，通过当地老百姓把张邦英和另外五六名战士介绍到他那里。贾世才接到刘忐丹的后，暗中派人将红军游占队伤病员安排到深山密林中的一个山洲里疗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治疗，张邦英等人的病才得痊愈，重返部队。

在与部分地方武装力量结成统战关系的同时，对于反动的地办武装，红军游击队则给予坚决打击和消灭。l 932年9月1 2日，陕甘游击队将进犯照金的同富耀三县民团剐总指挥党谢芳击毙，生擒小匠民团冈总柴子发。l933年10月27日，王泰吉、刘志丹率领红军在甘肃庆阳消灭“陇东一霸”谭世麟民团40余人。刘志丹等根据地领导人灵活务实的统战策略，对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和巩固根据地革命政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我党开展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 秘密读书会

1934年，宜君县教育界出现了一个叫做秘密读书会的进步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马列主义在宜君的传播，由无组织、无领导的自发阶段，开始进入到有组织、有领导的自觉阶段。

强自修是秘密读书会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早在1926年，他就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是宜君县最早学习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强自修1934年春，强自修被聘为县立高小教员，经常和薛志仁、杨培元等挚友聚在一起，交流思想，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强自修根据自己以往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斗争经验，深深体会到：在黑暗腐朽的社会里，只有把最底层的群众发动起来，才能进行真正的革命。他的意见得到薛志仁、杨培元等人的赞同，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在宜君建立一个进步组织，让更多的人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因为强自修在县城任教，接触的人多，女家商定主要由他负责组织事宜。不久，经过积极筹备，宜君耳第一个进步组织——秘密读书会在强自修的领导下成立了。读书会成立之初，只有杨新山、杨西林、杨建舟、刘世明、杨植等思想进步分子20多人，后来很快发展到30多人，杨作栋、刘志修等教职员工也加入了进来。读书会不仅在学校发展，而且还扩大到农村和厂矿。

读书会的宗旨有二，一是阅读进步书籍，探求科学真理；二是发展组织，壮大力量，扩大影响。读书会成立后没钱买书，强自修、杨作栋拿出自己的工资，从河北保定为大家购回进步书籍。读书会的读书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秘密传阅，主要有《莫斯科印象记》、《少年漂泊者》、《创伤》、《辩证唯物论入门》、《什么是新兴经济学》、《蒋光慈小说全集》等。这类书宣传马列思想，介绍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主张推翻旧制度，是当局禁看的书，只能偷偷传阅。二是公开阅读，主要有鲁迅的《彷徨》、《呐喊》、《狂人日记》及其它书籍。三是对本子厚，既看不到头又不好懂的书，约定时间由老师辅导，主要有《铁流》、《唯物论》等。强自修为大家辅导时，不仅运用朴素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把书里的知识讲得明明白白，而且还给大家讲时局政治和社会科学，宣传进步思想，揭露社会黑暗。

读书会的会员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思想认识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主要明确了以下五个重大问题：(一)苏联经过十月革命已经变成一个新型国家，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不再是以前欺侮中国的沙皇俄国了。(二)世界上只要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必然会有革命，从而否定了国民党当局宣传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而没有阶级的骗人说教。(三)人类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改变了英雄创造历史的传统观念。(四)掌握了一些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把二者能够区别开了。(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一定会胜利。弄清了这五个大问题，会员们的眼界扩大了，头脑里出现了一个新世界，从此产生了强烈的革命要求。

县立高小历史上留下来的校风坏得怕人，读书会成立后，强自修不光宣传革命思想，还给学生们宣传新观念，教育大家要走出家门放眼世界，新老同学平等相待，共求进步，校风很快大变。后来，强自修又建议校长，组织学生每星期天上山打。柴，节约学费，改善伙食。老师带领学生上山打柴这一行为，受到宜君当地人民的一致称赞，就连县城驻军也向师生学习，开始上山自己打柴。

秘密读书会成立仅一年多，就使反动政府感到惊恐万状。县长把校长杨星海叫去，说：“人家都说，你们学校的老强是个红头(指共产党)，你可要注意哩！”杨星海是一位进步民主人士，他为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发愤读书感到高兴，对强自修秘密宣传进步思想的做法暗中支持。听了县长的话，杨校长说：“我几十岁的人，做事还能没个深浅。老强是个本分人，自己不害人，倒惹下一些人，人家故意说他坏话哩！”正是因为7有杨星海这样的进步人士暗中给予支持和保护，秘密读书会的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

然而，就在秘密读书会顺利开展活动之际，敌人加紧了对凄书会领导人强自修的迫害。宜君县长、敌驻军团长和县公安局局长秘密开会，决定逮捕强自修。因县公安局局长樊建堂与强自修个人关系较好，思想进步，在行动前偷偷给强自修报了信，才使得他从险境中逃脱。从县城逃出后，强自修前往陕北苏区，秘密读书会的活动就此终止。

秘密读书会的活动时间虽然短暂，仅一年多，但在宜君广泛传播了马列主义、新文化和新思潮，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为宜君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

# 中共红宜县委的成立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宜君撒播革命火种，秘密读书会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唤醒了宜君人民的革命意识，激起了宜君人民的革命热情。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成立中国共产党宜君地方党组织，成为宜君人民的迫切愿望。

1936年初，党组织派杨子珍回宜君，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宜君地下党组织，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搁置。时隔不久，中共陕甘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刘培植按照上级指示，以国民党东北军特派员的身份为掩护，先后到西安省立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和蒲城尧山中学，与过去发展的党员王生廉、王润辰等取得联系，详细了解了宜君地方情况，认为成立宜君地方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即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宜君地方党组织。

1936年7月，刘培植第二次从陕北苏区经洛川到西安，在做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及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的统战工作后，回到宜君，住在西村乡石堡村杨建舟家中。13日，五里镇逢集，刘培植以东北军军官身份在街上露面，见了许多老同学和熟人。经过互相了解，刘培植特约部分秘密读书会会员、相熟邻里约30余人，晚上在石堡村僻静处——后场窑院(系该村村民杨从发的旧庄院，当时作饲养室)开会。这天夜单。在如豆的灯光下，刘培植向大家作了形势报告，宣讲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停止土地革命、不打土豪劣绅、团结抗战”的统战政策，消除了特意邀请来的三个小乡绅杨星海、郭克猷、田维藩对红军的恐惧和对立情绪。

刘培植宣传完党的政策后，窗外漆黑一片，夜已经很深了。送走三个乡绅，刘培植郑重提到建党问题。是夜，他介绍接收了王清廉、冯茂青、杨建舟、杨文俊、杨新山、杨俊杰、杨作栋、胡正财、田维平、张文秀、郭怀璧、李振德、王俊民、王选西、胡振耀，以及当时不在场的薛志仁、张思明为中共正式党员——这些同志原来都是秘密读书会的会员。这一夜，窑洞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7月14日晚，后场窑院的灯光又点燃了，刘培植主持继续开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宜县委员会。中共红宜县委的组织分工为：王清廉任书记，冯茂青任组织部长，杨建舟任宣传部长，杨俊杰任军事部长。县委联络点设在杨建舟教书的石堡小学，杨建舟负责和省委交通员的联系工作。

中共红宜县委成立后，刘培植回苏区向中共陕甘工委(1936年5月中共陕甘省委撤销后，中共中央东北军工委在中宜、富县、甘泉一带设立中共陕甘工委)汇报了组建红宜县委的情况，并将组成人员及党员名单上报工委组织部。至此，中共红宜县委得到中共陕甘工委的承认并直接受其领导。

中共红宜县委的成立，是宜君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从此，宜君革命斗争的烈火由这窑洞里的灯光点燃，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宜君人民开始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展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 贺龙在陈炉

1937年2月6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等直属机关，从泾阳县云阳镇移驻同官县陈炉镇(今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在陈炉的两个多月里，贺老总情系群众、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心系革命、团结抗日的崇高精神，给陈炉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情系群众 平易近人**

红二方面军到陈炉后，司令部住在二高(同官第二高级小学简称)的院子里。院里住房紧张，贺老总就和关向应政委合住在两套间的小房子里。白天，两人在外间办公；晚上，挤在一个小土炕上睡觉。渭北高原上的冬天，滴水成冰，寒气逼人，为节约木炭，贺老总和关政委只生一个火盆取暖。那时，贺老总穿着褪了色的粗布军装，上衣打着好几块补丁，棉裤不仅有补丁，而且膝盖上的棉絮已露在外面，脚上的棉鞋，已经很烂了，但他仍舍不得扔掉。一天晚上，火盆中的火星蹦到贺老总的棉鞋上，将棉鞋烧了个大洞。供给部的同志知道后，要给他换一双新棉鞋，贺老总执意不肯，语重心长地对供给部的同志说：“这双鞋补一补还能穿，目前我们仍处在困难时期，一定要注意节约，努力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

红二方面军到达陈炉时，正值学校放寒假，大部分房子空着，陈炉联保主任高少峰于是安排贺老总和司令部住进二高院内。春节过后，贺老总见二高迟迟不开学，便问高少峰学校怎么还不开学？少峰告诉他，司令部住在学校，开学后师生吵吵闹闹，会影响首长办公。贺老总听后说：“娃娃念书要紧，可不能耽误了。司令部马上另搬地方，赶快通知学生上学。”随后，老总迅速安排司令部搬到湾里任志树家。二高学生很快开了学。

红二方面军驻陈炉期间，正值瓷业萧条、民不聊生的困难时期，春荒严重，许多人家断了炊烟。贺老总了解到这一情况听，叮嘱供给部的同志：“一定要让群众有吃的！”他一方面让部队请当地群众做饭(部队南方同志多，不会做北方的面食)，安排炊事员全家和红军一起吃饭，先解决少数群众眼前揭不开锅的问题；另一方面，安排人设法从蒲城、富平、耀县、同官等地筹措粮食运到陈炉，让供给部把原粮通过陈炉工人救国会分发给陶瓷工人，委托他们进行加工。每加工100斤小麦，红军只收面粉52斤，多余面粉都留给了群众，帮助他们度过了当年的春荒。

贺老总平易近人，空闲下来，他常到战士们中间去，和他们一起参加文体活动，打篮球，下象棋，做游戏。有一次，周士第参谋长和一群士兵打篮球，贺老总站在场外高喊：“士第加油——士第加油——”引得旁边观看比赛的人们，一起兴致勃勃地帮比赛双方呐喊助威。还有一次，太阳暖洋洋地照在二高院子里，贺老总蹲在一旁观看两名警卫战士下象棋。当他看到一方小红军战士棋势不利时，忍不住出手相助，使对手的棋势很快由优变劣，连连失子。另一方小红军战士对贺老总的“义举”大为不满，噘着嘴连连叫他走开。贺老总大笑起来，将那个生气了的小红军战士抱起来转了一圈，笑着说：“真是个小鬼哟！”

**动员民众 团结抗日**

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红二方面军来到陈炉后，在二高操场上召开了军民大会。贺龙、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参加了此次大会。会上，贺老总向陈炉群众分析了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宣讲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创作，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号召陈炉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贺老总热情洋溢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陈炉人民的革命热情。

1937年3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党员代表大会在陈炉召开。贺龙主持会议，关向应、任弼时、王震、李井泉等领导出席了大会。会上，任弼时作了政治报告。大会总结了红二方面军长征以来的历史经验，讨论研究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通过了红二方面军党代会决议案，选举了出席陕甘宁边区党代会的代表。红二方面军的这次党员代表大会，贯彻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分析了形势，统一了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全军上下一致转入抗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合作，共赴国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新局面。为了早日开赴抗日前线，贺老总抓紧有利时机，在陈炉对红二方面军进行了短暂的整训。与此同时，贺老总安排部队抽调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义务为陈炉地方教员和知识分子开办新文化学习班，在他们中间宣传抗日政策和革命道理；还在陈炉周围、同官与富平交界地域，广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政策和减租减息政策，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唤醒了边区民众共同抗日的革命意识。这一时期，陈炉街头贴满了“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等大幅标语，当地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红军队伍得到迅速补充和壮大。就连国民党同官县县长田在养，也在抗日浪潮的感召下，前往陈炉拜见贺老总，主动帮助红军解决粮草给养问题。

**教育群众 建立组织**

红二方面军进驻陈炉后，贺龙、关向应十分重视陈炉地方党组织的建设。

部队驻扎陈炉期间，薛少卿、贾武祥等人深入群众当中，宣传党的性质、纲领和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工人、农民、教员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为组织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同时，在同官县城、黄堡、红土和陈炉等地，建立起11个党支部，发展了53名党员，改写了陈炉没有党员和党组织的历史。

1937年3月9日，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在陈炉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工人群众大会。地方工作同志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大会讨论、解决了陈炉地区粮食、瓷业生产、增加工人工资等问题，成立了陈炉“工人抗日救国会”。陈炉“工人抗日救国会”的成立，使陈炉工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

4月，在陈炉镇建立了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个工委——中共同官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共同官临时工委的建立，为党领导下的同官地区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 耀县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耀县境内有3个县级地方组织，即淳耀县县委、同宜耀县县委、中共耀县县(工)委，分布在两个不同区域——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耀县人民响应号召，积极投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边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1月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把边区变成抗战运动的模范，要求党的一切支部成为抗战动员的核心，各群众组织要把抗战动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为了配合全国民众的抗日救亡高潮，淳耀县、东行政区办事处分别成立了淳耀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各界妇女联合会”、东行政区“抗敌后援会”等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并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妇女为前线抗日将士做军鞋、洗衣服、护理伤员，支援前线。同时，边区党和政府在加强组织发展和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治和民主政权建设，发展生产活跃边区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发动和组织民众拥军优属。1943年八一前夕，淳耀县开展“拥军周”活动，桃渠河两岸呈现出妇女为战士洗补衣服，战士帮群众开荒生产的“民拥军，军爱民”的欣欣向荣景象。

抗战期间，边区各级党组织及政府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奔赴抗日前线，为国效力；组织以基干民兵为主的自卫军，配合主力部队保卫边区；组织驮骡队为前线运送物资；动员妇女为前线将士缝鞋袜、手套等，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将士抗战。

**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3月14日，中共耀县工委在药王山“二月二”庙会期间，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发动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组建了1 5个宣传队，在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和友军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许权中，共产党员)的配合下，在药王山和耀县城内采用演话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演讲等形式，向游山逛会的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时间长达10天，听众达4万人之多。

1937年冬，在西安求学的耀县籍青年学生任步文、文玉寅、魏智宏、邱谢轸等，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和西安学联的组织下，结伴回到耀县，打起“抗日救国会”的旗帜，住进国民党县党部，并上街刷写“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标语，召开群众动员大会，通过讲演会、座谈会、演唱会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八大主张”，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中共耀县地下党组织的策应下，学生们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要求面见国民党县长李书亭，召开市民大会，宣传张、杨二将军的“八大主张”，扩大抗日影响。1 2月24日，“耀县抗日宣传大会”在西大操场隆重举行。市民扶老携幼，进城置办年货的农民川流不息地涌人会场，达五千余众。会上，县长、民运指导员(省委委派)及学生代表分别讲话、演讲。学生们生动形象的表演，

慷慨激昂的演讲，赢得了台下民众的热烈掌声。为了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会后，“抗日救国会”的青年学生分头深人农村，继续开展抗日宣传，一直坚持到农历年关，对促进耀县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早日到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返耀爱国学生的宣传影响下，耀县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参战，广大民众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支援抗战。中共耀县县委主持成立“耀县抗敌救国会”，在扩大抗日宣传的同时，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及贯彻省党代会提出的“百万扩红、百万扩党”的指示，在全县范围掀起了全民抗战、共赴国难的斗争高潮。

# 一颗红心永向党

高少峰，字步嵩，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人，1906年10月出生在咀头村一户小业主家庭，先人私塾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取三原省立第三职业学校瓷业专科。在三原学习期间，高少峰结交了田正义、负符谦、任子诚等共产党员，受《中国青年》、《向导》、《共进》等进步刊物的影响，眼界大开，思想进步，后经负符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在陕西“清党”反共，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迫使我党工作转入地下。少峰毕业后回乡，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高少峰回家后，经人举荐，先后在县教育局、县立一高任职。1929年关中遭逢特大年馑，由于家里生活难以为继，少峰不得已辞职回家，以瓷谋生。但他仍一心向党，默默地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工作着。

**仗义执言**

1934年，国民党陈炉区长郑宝铭和副区长崔振林搜刮民财，贪污公款，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民愤极大。少峰看到群情激愤，就和陈炉知名人士联名状告郑、崔二人。郑、崔二人以重金收买少峰，求其撤诉，被少峰严词拒绝。同官县长见郑、崔两人问题严重，想保无法保，只得下令将两人免职，立案查办。在郑、崔两区长被免后，少峰又发现陈炉区保安队队长穆少文以权谋私，贪污公款，欺压百姓，横行乡里，遂再次联络知名人士上告。县政府不得已，也将穆少文免职。少峰不畏权贵为民伸张正义的行为，受到陈炉群众的交口称赞。

少峰憎恶权贵，深切同情贫苦人民。河南人李棒棒逃难到同官，给李铁匠当学徒，常被打得遍体鳞伤。李棒棒从县城乞讨来到陈炉，少峰问明其身世，与其结拜为兄弟，领回家同吃一锅饭，视同亲人。几年后，李棒棒身染重病，少峰在自己生活艰难的情况下，借钱为他求医问药。李棒棒去世后，少峰又派人将其母和两个弟弟接到陈炉，按当地习俗，出资安葬了李棒棒。少峰知道河南灾情多，生活苦，便将李棒棒的母亲和其弟二棒、三棒劝留下来，并帮助他们在陈炉安家落户。解放以后，还给二棒、三棒安排了工作。

县城有个杨财东，家中雇了一名郭姓长工。此人憨厚老实，干活勤快，给杨财东干了10多年活，因家中老母与妻子生活艰难，遂动了回家的念头。但是，他给杨家当长工写有约书，约书时间未到，杨财东不许他解约回家。少峰知道了郭长工的事，便找杨财东面谈，替郭长工求情。少峰说：“杨绅士，你总不能叫小郭给你家当一辈子长工吧？！他家有老小，生活艰难，放他回家过日子去吧。”杨绅士碍于面子，便说：“是呀，是该让小郭回去了。”少峰趁热打铁接着说：“小郭给你干了10多年活，你总不能叫人家空着手回去吧？我看把你那不值钱的骡子给上一头，他回家后就能赶脚挣钱糊口了。另外，他家确实困难，你再给上几口袋粮食，他会给你杨绅士扬名的。”少峰连激带捧，说得杨财东左右不是，“给了舍不得，不给又使不得”，最终同意放郭长工回家。

**心向革命**

1937年2月，贺龙、关向应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从泾阳县云阳镇移驻同官县陈炉镇。李达率尖兵首先抵达陈炉联保处，时任陈炉联保主任的高少峰，热情接待了李达的先遣部队。得知红军司令部要进驻陈炉的消息后，少峰便以地方行政长官的身份，积极安排司令部和部队驻地，派人收拾卫生，安排伙食。同时，通知陈炉各保做好迎接红军的准备工作。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面宣传，群众对红军存有恐惧心理。少峰给大家解释说：“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专门为穷人打天下。国难当头，为了抗日救国，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红军到陈炉联蒋抗日，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谣言。”少峰的这一番宣讲，很快打消了群众心里对红军的疑虑。红二方面军进驻陈炉那天，少峰率领陈炉各保保长，冒着飞雪，赶到陈炉与富平紧临的尖山脚下，前去迎接红军首长。

红二方面军进驻陈炉后，与群众关系密切。少峰常到贺龙处谈天论地，从贺龙及关向应处懂得许多革命道理。少峰向贺龙讲明，自己曾在三原省立第三职业学校入党，是一名共产党员，因冯玉祥“清党”反共而与组织失去联系，要求再次加人中国共产党。贺龙、关向应将少峰介绍到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经副部长颜金生介绍，少峰重新找到党组织。

红二方面军驻扎陈炉期间，少峰为革命队伍做了大量工作。红军粮食紧缺，他不但贡献出自己家仅有的一点存粮，还积极说服当地财主，借出粮食，解决了红军的缺粮问题。同官县长田在养了解到红军帮助饥民度灾、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事情后，想同共产党人交朋友，少峰积极引荐，使他在陈炉见到了贺龙和关向应。红军司令部驻在二高学校，春节过后，少峰找湾里任志树相商，请其将住宅让出来做司令部驻地，使二高顺利地开了学。红二方面军供给部部长谢耀文在陈炉时身染重病，少峰将其接到自己家中，请来地方名医为其诊治，还让家人为其做饭煎药，精心看护。谢耀文因病情严重去世后，少峰又将老父亲的棺木拿出来，帮助红军将谢部长安葬在陈炉那坡店庙旁，供群众瞻仰、悼念。

少峰与贺龙交情极好。4月，红二方面军离开陈炉时，贺龙将自己最心爱的一支德国造手枪送给少峰留作纪念。这支手枪是贺龙在国民军当团长时用过的，从平江起义直到长征胜利，这支枪从没离开过他的身。少峰接过贺老总赠的枪，感慨万分，下决心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

**赤胆忠心**

1938年初，中共同官工委遵照上级有关指示，决定把活动方式转向打人敌人内部，以合法身份深入发动群众方面。5月，同官工委决定派县工委组织委员王子文担任陈炉联保主任。接到这一任务后，少峰一面向同官县长亲自举荐王子文，一面动各方绅士向县长进言推荐。为保证王子文能顺利当上陈炉联保主任，少峰借口自己任职期间陈炉驻过红军，不少人怀疑陈炉是共党匪窝为由，主动避嫌，请求辞去陈炉联保主任职务。县长知道王子文家是财东，料他绝不会与共产党有关系，遂启用王子文为陈炉联保主任。念及少峰在陈炉任职期间，能够使一方百姓平安，为政清廉，县上遂将其调回县政府，主管社仓、救济灾民和鳏寡孤独救助工作。

1946年秋冬，少峰任国民党同官县参议员。1949年4月，铜川县全境解放。少峰了解到县委、县政府进城后，经济萧条，生活困难，既要支援全国解放，又要频繁接待过境部队，地方政府压力很重的情况后，主动将家中余粮全部送到县人民政府，以实际行动支持政府工作和解放战争。10月，铜川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铜川中学召开，少峰出席了人代会，当选为常务副主席，后又连任二、三届人代会常务副主席。50年代，少峰曾任铜川县副县长、铜川县政协副主席、铜川市政协副主席、铜川市卫生局局长。60年代，任铜川市副市长。1976年元月，少峰因病去世，享年70岁。

# 地下交通员范世英

1937年春，中共陕西省委选派范世英(人称老范，真名李对章)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建立同官至省委党的地下交通线，指导同官、耀县党组织做好恢复整顿工作。

6月，范世英持陕西省委介绍信来到同官县陈炉镇，与中共同官工委组织委员王子文接上组织关系，传达了省委指示，并和王子文一起研究确定了中共同官工委与陕西省委地下交通的路线、接头方式、工作任务及注意事项。在范世英的努力下，从此开通了同官、耀县工委与省委的地下交通线：即从省委所在地云阳镇(泾阳)——洪水头(富平)——野狐坡(耀县)——陈炉镇(同官)——何家原(宜君)路线，范世英为第一任交通员，直属省委交通科负责人罗文治领导。同月，由范世英主持，在耀县阿姑社北边古庙里召开了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了省党员代表会议精神，依照省委指示筹划成立中共耀县县委。8月，经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批准，撤销中共耀县工委，正式成立中共耀县县委，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关驻地阿姑社，陈景蕃任书记。中共耀县县委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号召青年踊跃参军，对民众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范世英在跑交通过程中，机警果断，不怕困难。由于要绕讨一些大路和村镇，常常翻山越岭，不但要与敌人斗争，有时还要与猛兽、与自然环境作斗争。有次送情报，为了摆脱敌人盘查，范世英利用夜间行走，当走到同官黄堡附近时，遇到一只恶狼，卧在路中间不走，两眼直愣愣地瞪着他。这种情况他见的多啦，平时遇到这种情形，只要一划火柴，狼就吓跑了，可是这次遇到的这只狼只动了一下，又继续卧在原地。范世英知道一时难以取胜，只好与狼打持久战——只要烟火不断，狼就不敢妄动。只见他不慌不忙，掏出烟袋抽起烟，直到抽到第三锅烟，狡猾的狼觉得征服不了此人，这才悻悻地拐道上山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对范世英来说，已不足为奇。从1937年6月到年底，范世英每月跑交通一次，主要任务是给同官工委和耀县党组织传递上级书信、文件、指示，以及向省委汇报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情况。

同年，通过中共耀县工委交通员郭兴、郭克义与耀县工委取得联系后，范世英把耀县稠桑王堵村作为自己为党工作的“根据地”，在王堵村城门楼上办起了一个小杂货铺。小杂货铺既方便群众，又可借以迷惑敌人，掩护地下工作，为党筹集资金，还可借采购货物之机，外出执行党的联络任务，真是“一举三得”。范世英是个多才多艺之人，能拉二胡，说评书，看小病，裁剪衣服，最擅长放风筝，待人和气诚恳，办事热情周到，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声望。他利用自身特长，通过售货、说书、放风筝、组织农村艺人成立自乐班等多种方式，广泛接触和联系群众，为他们排忧解难，群众都愿意和他接触。农忙时节，范世英帮助群众锄、种、收，担水拉粪；农闲之余，在他的住处，总是一屋子人，男女老少都爱去他那里，听他说评书、讲故事、拉二胡、唱秦腔。在与群众密切相处、广交目月友中，范世英间接或直接地宣传革命道理，传播共产党的主张，鼓励和启发群众起来革命，发展党的组织，秘密接转《解放日报》、《党的生活》等党内报刊。因为他的货郎身份，群众都亲切地称他“货郎担老范”。

1938年10月，国民党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为了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存革命力量，使党的地下组织免遭破坏，党中央指示在国统区的活动方针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中共中央要求：“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隐蔽精干的政策，加强党与社会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和积蓄力量的目的。”耀县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组织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采取多种形式，保存党的组织，县委主要同志相继调往外地，书记陈景蕃赴省委青训班学习。下半年，范世英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安排刘永福接替陈景蕃任耀县县委书记，郭兴任县委组织部长，宙醒民任宣传部长。

范世英以卖货为掩护，及时地把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传达给耀县、同官的地方组织，在他的指导下，党在耀县、同官的地下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整顿。

# 保守机密宁死不屈的张守愚

张守愚，生于1915年，宜君县西村乡云辉村人。

张守愚少年时代智勇超群。民国初期，宜君东部一带，常有流窜黄龙山区的军阀残余分子前来抢掠侵扰百姓。1926年春的一天，匪首杨谋子带三四十人窜到云辉村行劫。为防止村民外逃寻找援兵，土匪一来先封锁了村口。当时，正在学堂念书的张守愚听说来了土匪，便自告奋勇，在同学的帮助下，攀椽登上房顶，又从枝叶垂在房顶的大树上滑下，偷偷潜出村外，一口气跑到5公里之外的五里镇，叫来当地驻军，及时赶回云辉村打跑土匪，夺回村民被抢的牲口和财物。这一年，张守愚年仅12岁。他的英勇壮举，受到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

1933年后，张守愚先后就读于宜君县立高小和西安师范，受到宜君革命先驱强自修和共产党员刘邦显(60年代曾任陕西省副省长)的亲身教导，激发了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张守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号召下，积极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大力声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义举。1938年春，张守愚经刘邦显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了西安地区民先队(“抗日民族先锋队”简称)的组建和领导工作。同年，张守愚从西安师范毕业，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批准，考入国民党成都航空学校，在成都边学习边做党的地下工作。该年秋，张守愚在进行驾机实习时，企图密谋借机飞奔延安革命根据地，被敌发觉，身份暴露。危险时刻，张守愚当机立断逃出成都，辗转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后在淳化安扶青训班、延属地委工作，后调定边县任区委宣传科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党中央向东北调干时，张守愚踊跃报名，奔赴东北前线。由于他曾学习过航空知识，党便派他打人国民党某空军基地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张守愚宁死不屈，最终被敌人残忍杀害。

1983年，党组织追认张守愚为革命烈士，国家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书。

# 满怀激情奔边区

在宜君革命史上，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1940年，在共产党人王生廉的领导下，宜君三所学校的师生心向革命，集体投奔延安边区。

王生廉，宜君县偏桥乡安子塬村人。30年代初就学于西安民立中学，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 936年毕业后回乡，县政府意欲留他在县城高小任教，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王生廉谢绝邀请回到乡下，先后在偏桥乡拔头原和东云阳村小学任教。

1938年7月，中共宜君工委将全县党组织改为两个区委，王生廉任中心区委书记，强建华任中心区委宣传委员，他们和地下党员李怀珍、许增珍的公开身份都是小学教员。王生廉和李怀珍在东云阳村小学任教，强建华在东胡村任教，许增珍在许家原小学任教。在王生廉的直接领导下，中心区委的地下组织工作发展得很快。他们以学校为依托，以教书作掩护，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在学生中发展了30多名党员。

1939年冬，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敌人不断蚕食边区，围困边区的军队和碉堡，步步向前紧逼，边区及边缘区的形势变得异常紧张。1940年5月，国民党将第二十八师董钊部调驻中部，对店头形成重重包围之势。根据中共洛川特委掌握的情报，中心区委地下党组织已经暴露。形势危急，中共洛川特委紧急指示中心区委，命令王生廉、强建华、许增珍、李怀珍带领三所学校的党员和进步学生，迅速撤人延安边区，保存革命力量。接到上级指示后，王生廉立即与有关同志秘商，制定具体行动方案，分头准备。

1940年5月15日，宜君县城隍庙过庙会，宜君各地群众纷纷赶往县城，反动派做梦都不会想到，偏桥今天将要发生惊天大事。清晨，东云阳、许家原、东胡三所学校60余名学生，分别从东云阳村、许家原村和东胡村排队出发。学生们肩扛扁担，腰别砍刀，拿着捆柴的绳索列队向村外走去。东云阳小学的学生还赶着毛驴，驴身上备着驮柴的架子和绳索。由于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外出打柴，因此，看到学生们向村外走去，人们习以为常，并无人过问。

王生廉、强建华等人带领三校师生，顺利通过咸(阳)榆(林)公路，从偏桥往西经杜村梁，翻山越岭十几公里，中午时分来到百子梁。在此，王生廉郑重地向学生们宣布：此次出村，并不是为学校打柴，而是要去延安当八路军。同学们愿去的跟着队伍走，不愿去的可以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学生们既惊又喜，这才明白此行的目的。王老师曾经告诉他们，延安是中国最进步、最光明的地方，那里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学们早就盼着能到延安去，现在，听到向往已久的边区梦就要实现了，有的同学竟激动地跳了起来。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群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最大的十七八岁，小的才十二三岁)，很多人从未出过远门，想到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一些人显得恋恋不舍。有人说，要是能让父母知道我们上哪去该多好；有人说，我连件换洗衣服都没带；还有人说，要知道不是打柴，我一定带上书和笔。大家七嘴八舌一番后，很快又沉浸在奔向边区的喜悦中。最终，除了两名学生回家外，其余学生都跟着队伍向边区赶去。

王生廉等人带着学生队伍继续前进，朝西翻过一座大山，来到车村川道，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在这里，他们与边区派来接应的机枪连战士，以及前来迎接学生队伍的八路军驻店头办事处牟生忠、杨西林等同志相见。三校师生在八路军护送下来到店头镇的第二天，洛川特委为这支特殊的革命队伍举行了千人欢迎大会。特委组织部长强自修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是未来的主人，今天集体参加革命，将在宜君革命史上写下光荣的一页。不要想家，要有求知进取心，跟着共产党，打败日本狗强盗，把革命进行到底。”从此，宜君人民的这些优秀儿女，为了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苦的革命征途。

学生队伍在店头休整两三天后，由八路军机枪连护送，安全通过封锁线，到达陕甘宁边区，被编人驻富县的八路军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以他们为骨干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强建华担任干校党支部书记。经过数年的学习实践，抗战胜利前夕，这批学生随部队开赴前线，投身解放战争。其中，樊文智、王新乾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 王震赞誉的边区女劳模杨淑平

革命先驱强自修的事迹在家乡宜君广为传颂，但他那贤慧、善良、能干的妻子杨淑平却鲜为人知。其实，她也非常出色，曾是陕甘宁边区鼎鼎有名的巾帼英雄。

杨淑平，1902年出生在宜君石堡村，15岁同强自修结婚。从此，她把自己的命运和丈夫，以及丈夫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结在一起，满腔热情地支持强自修的革命活动。强自修是宜君革命活动的主要领导人，家里常有革命同志往来。杨淑平为同志们的安危担忧，除精心照顾“来客”的食宿外，还常常为他们收藏革命书籍，放哨掩护。1935年，强自修的革命活动引起敌人注意，他决定奔赴边区。临走前，强自修回到家里告别，家里人不愿让他离去，惟有妻子杨淑平坚定地说：“为革命你应该走，家里不用操心。”强自修离开县城时是偷跑出来的，因此身无分文盘缠。杨淑平看到他的窘况，拿出大女儿拾麦卖得的四块银元塞到他手里，亲自把丈夫送上革命征程。强自修离家时，儿子慧生才满周岁，由于缺奶，主要靠父亲教书所得薪金，买点白糖调着面糊、米汤食用。强自修走后，杨淑平咬牙挑起家庭重担，然而家中断了固定收入，没钱给慧生买白糖，孩子生活成了问题，身体日渐消瘦。1936年，由于缺乏营养，两岁多的小慧生饥病交加，离开人世。杨淑平强忍悲痛，丝毫没有埋怨丈夫。

1941年，杨淑平辗转来到陕甘宁边区，时值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重重封锁，叫嚣要困死边区军民的困难阶段，毛主席号召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杨淑平来到边区后，进入延属地委统战部等单位办的家属工厂工作，厂里工人多为机关干部和游击队员家属，共百余人，杨淑平是家属中年龄最大者，组织让她配合专职管理干部领导工厂的生产与生活。

工作中，杨淑平从严要求每一个人。她了解每一个人的生产水平，按各人能力大小、身体强弱分给不同生产指标，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杨淑平记下名字给予表扬；完不成任务的，杨淑平及时调查摸底，帮其解决困难，完成任务。在工厂，杨淑平身为领导，带头劳动，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劳动能手。那时，工厂纺织全是手工操作，每人一台纺车，就在自己住的屋里劳动。为了克服困难，保卫边区，支援前线，大家没日没夜地劳作。杨淑平不甘人后，起早贪黑地又搓又纺。她心灵手巧，纺线又快又匀，每天都能纺八两到十两线，天天超额完成任务。一年下来，杨淑平能纺200多斤线。由于她的模范带头，家属工厂的同志们你追我赶，拼命纺线织布。

生活中，杨淑平又像长辈对待晚辈那样，关心爱护工厂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年轻媳妇怀孕了，杨淑平告诉她们注意事项，请炊事员照顾她们的特殊口味；有人要生孩子，杨淑平急得跑前忙后。厂里一个从河南敌占区逃荒来的姑娘，杨淑平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她，处处照顾她的生活。在家属工厂，与其说杨淑平是领导，不如说她更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家长。在她的领导下，家属工厂的同志们互敬互爱，服从领导，积极工作，一心努力为革命做贡献。

1944年，杨淑平被选为延属分区的劳动英雄，受到边区政府嘉奖，成为宜君县近代史上第一位受到人民政府表彰的巾帼英雄。当时，驻守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王震将军，亲笔撰写《向强大嫂学习》一文，在延安《群众日报》发表，热情赞扬杨淑平的先进事迹，号召边区军民向她学习。同年，杨淑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宜君妇女界第一个女党员。

杨淑平纺线织布是模范，做军鞋也是模范。1945年，她在关中分区马栏工作，不到三天做一双鞋，一年里做军鞋100多双。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杨淑平和家属工厂的家属们随机关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 照金“难民乡”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难民涌入陕甘宁边区淳耀县，在这里得到边区政府的妥善安置，并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发动对华全面进攻，华北、中原、长江下游地区大片土地相继沦陷，蒋介石决定“以水代兵”，宣布“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1938年6月7日，随着几声巨响，黄河决堤，中原地区顿时一片汪洋，上百万人死于国民党人为的“水患”。洪水肆虐，生灵涂炭，为了生计，中原地区数万灾民背井离乡，一路啼寒号饥，辗转投奔各地，仅陕甘宁边区淳耀县接收的难民就达数千人。

面对蜂拥而来的灾民，为了妥善安置他们，1940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规定种种优惠政策，保障难民的生产与生活。淳耀县政府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遵循“在政治上给以影响，生活上给以帮助”的原则，1942年在照金师家道约140平方公里的地域，集中安置了逃难来的120余户灾民，约300余人。同年年底，在这里建立乡政府，灾民们亲切地称其为“难民乡”。“难民乡”的建立，使流落到此的灾民渐渐安定下来。

灾民们初来乍到，人地生疏，生活极为困难。淳耀县政府了解到灾民的困难后，发动照金、田玉、芋园、柳林、庙湾等地群众，及时给灾民们送来粮食和衣物。“难民乡”领导帮灾民们盖起干打垒的石板房，并组织他们开荒种田，实行生产自救。很快，灾民们过上了有粮吃、有衣穿、有房住的日子，牛活渐渐安定下来。淳耀县灾民安置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难民乡”政权得到灾民的一致拥护和好评。

原籍河南新郑县的郭松钦，当年9岁，由于国民党掘黄河淹了河南，成了难民，跟随父母和两个妹妹一路讨饭来到陕西。他回忆说：“1941年冬的一天，我一家正在小士丘西河讨饭，碰到一个过路人，他悄悄地对我父亲说，老乡，要饭干啥哩，到北山去，那里的共产党政府管穷人哩，给发粮、发镢头。你向北走，到寺坡庙上一登记，就行了。听了他的话，我们一家人走到封锁线，碰上国民党保长和兵丁，不让北上，还把我们打了一顿。到了晚上，我们一家绕过封锁线来到寺坡，找到登记处，登记处的人给我们端吃端喝，问寒问暖，住了一晚，第二天开了一个纸条，让拿到照金区。区上分配到李家山，由于住房不足，先在区上寄宿了一段。1942年春，我们全家到李家山，李家山满山满沟都是边区政府和群众给难民居住搭建的草庵子。‘难民乡’(后来才知道乡长叫王清洁)在师家道有纺线、织布的机构，妇女大都参加了纺织组，我母亲也加人进去。父亲开荒种地，我在‘难民乡’举办的学校里上学我的教书先生是位姓成的)。过去的人心齐，我记得区上只要在山头上打三枪(不是敌人“清剿”，就是转移)，全区18岁上的青壮年马上都集中起来。人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外使，谁要有点困难，东邻帮西邻，全乡助一人，那股亲热劲谁见了谁感动。干部和群众关系很密切，政府和干部一切为群众，没黑没明的给难民盖房子，送吃的，这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

难民们从心底感激共产党，感谢边区各级地方政府。抗战期间，“难民乡”的妇女自觉地做军鞋、送军粮，民兵上前线抬担架、运弹药，积极地为抗日救亡做贡献。

# 史乾边区送情报

史乾，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史家塬人。祖辈耕种为生。父亲史采风，曾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拔贡”，任过同官一高校长，辛亥革命后任靖国军参谋，靖国军失败后在家务农，早年去世。史乾兄弟4人，大哥早死，小弟史剑北在外读书，他和二哥在家种地。

史家塬村地处陕北高原南端，毗邻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1941年秋，国民党在抢修碉堡、壕沟的同时，大举调动军队，催逼老百姓赶牲口向洛川一带运送军粮，准备进攻边区。

这一年，正轮到史乾二哥当甲长，县里向他们村派牲口支差，深知村民们饱受这种没完没了的劳役之苦，史乾和二哥商量后决定“抗差”。时值种麦的大忙季节，兄弟俩让村民们抓紧时间抢种麦子，到了支差的那天，村里一头牲口都没出。次日，县警察局的两个差役气势汹汹地来村上查问。村民们都下地种麦去了，恰逢史乾小弟史剑北从西安回来，便出面同差役交涉。不料，差役们不由分说举起枪托就打人。史乾和二哥闻讯赶回村中救护小弟时，差役又用枪托打起史乾二哥。见此情景，史乾气急了，喊道：“要打咱就打！”二哥对围拢来的村民喊：“打这伙吃民害民虫！”乡亲们一拥而上，打得两个差役哭爹喊娘，狼狈逃窜。

第二天清早，十几个带枪的军警来村里抓人，史乾和弟弟史剑北被抓到县里。史剑北经教育科长冯翔初(中共地下党员)营救脱险，史乾则被关进牢房，打了四十大板才放了出来。事后，保长又告史乾二哥私通八路，聚众闹事，应作主犯惩办。二哥闻讯，逃往宜君下煤窑去了。军警抓不着史乾二哥，就再次将史乾抓进牢房，几经审问，什么也没得到，只好又把他放了。从此，国民党就是“刮民党”、“害民党”的印象深深地刻在史乾兄弟的脑海里。

史家塬村距离陕甘宁边区只有几十里，老百姓在国民党的盘剥下生活不下去，常常赶牲口驮上瓷器、棉花、布匹等日用品，经过封锁线去边区换回食盐和粮食。共产党为老百姓办实事，八路军前方英勇抗战，边区人民安居乐业、军民团结的消息传遍史家塬的村头巷尾。史乾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经常跟随乡亲们去边区驮盐，亲眼见到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前的间接所闻，现在的亲眼所见，使史乾对共产党人更加了解和敬重，他急切地盼望家乡人民也能和边区人民一样过上好日子。

1944年秋，史乾的外甥杨济安来找他，向他打听去马栏(中共关中地委)的路径。史乾告诉济安：“史家塬距马栏有100多里，一路尽是陡坡和深沟，崎岖难行。沿途国民党军队封锁严密，碉堡、岗哨林立，搜查得很严，像你这样的学生打扮最容易引起怀疑！”史乾讲完，杨济安半晌沉默不语。此番回来，济安肩负着党组织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一旦行动不慎，被敌人抓住，后果将不堪设想。思前想后，济安知道舅舅一向憎恨国民党，敬重共产党，不得已向史乾道出实情，自己重任在身，有重要信件送到马栏去，无论情况多难，都要完成任务。史乾听说外甥办得是共产党的要紧事，不能耽搁，心里也替他着急起来。据他平时听到的消息，知道像济安这样的青年学生过炮楼(老百姓对碉堡的称呼)，十有八九是要出事的。思来想去，史乾决定帮助外甥完成任务，他斩钉截铁地对济安说：“你信得过舅，我就替你去办这件事。我一个农民赶上牲口容易掩护，路又熟，保证把信送到！”情况紧急，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济安只好答应让舅舅史乾帮他送信。只见济安郑重地取出一个火柴盒，告诉史乾：“信就在盒子的夹层中。”随后，又给了史乾一包香烟，让他用来应付岗哨上的守军。在交待完到马栏要找的人后，济安神色凝重地对史乾说：“这封信十分重要，千万不能落在敌人手里，要人在信在！”同时，他还叮嘱史乾：“我进去用的是化名‘安继良’，你去就用这个名字接头，还要说明我没有亲自去的原因。”紧接着，甥舅俩周密地商量了沿路应对敌人盘查的办法，并约好济安来取史乾带回“东西”的日子。

当夜，史乾准备好干粮和路上用的东西，把“火柴盒”装在棉褂子口袋里。第二天鸡叫头遍，他便赶着牲口起身了。一路上，史乾反

复琢磨着对付敌人的办法，牢牢记着济安的嘱托，决心拼死也要保住“火柴盒”。快到炮楼了，为了给自己斗朋旦，史乾高声唱起了山歌。

“干什么的？”哨兵厉声喝问。

“驮盐的！”史乾大声回答。

哨兵端着刺刀审视着史乾，恶狠狠地问：“是驮盐的吗？”

史乾指着牲口鞍子上的盐口袋说：“你看！”

哨兵没有搜骡子，却在史乾身上乱摸起来，拉扯搜查他的棉褂子。史乾急忙从口袋里掏出纸烟，抽出一根递给哨兵，拿出火柴盒给他点火，点完火后顺手将火柴盒握在手里。哨兵在史乾身上什么都没有搜出来，便盯着问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史乾一一作了回答，趁空又递上一根烟。哨兵瞥了一眼烟盒里不多的几根烟(故意少装的)，不耐烦地摆手说：“走吧！走吧！”史乾扬鞭一声吆喝，赶起牲口，朝边区奔去。

到马栏后，史乾找到关中地委，对门口的人说：“我是来找汪锋的，你给我报一下，就说西安的‘安继良’来了。”门口的人进去后很快出来，随即领着史乾向一排窑洞走去。这时，从中间一孔窑里走出一个30多岁、中等身材、大方脸盘的男同志。这位同志身穿八路军灰制服，态度和蔼，没等史乾开口便问：“你是安继良吗？”史乾怕找错人就说：“你是……”没等他问完，那人便说：“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咱们到窑里说话。”进到窑里，史乾说：“我不是安继良，我是安继良的舅舅。”汪锋非常诧异，史乾赶紧向他说明情况。汪锋询问了史乾的个人情况，问他认识西安什么人(指西安情报外)以及与这些人的关系等，史乾一一作了回答。汪锋听后说：“你这个舅真替外甥操心啊！”随后便吩咐通讯员今天加一个客饭，把牲口牵到街上店里去喂。

通讯员出去后，史乾取出“火柴盒”交给汪锋。汪锋极其小心地从火柴盒的夹层里取出折成指甲盖大小的信，一点一点，慢慢展开。

信纸有纸烟盒那么大，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汪锋同志手捧着信，说：“这分明就是一件珍品，好家伙，像蚂蚁爬过似的，还真不好认哩！”汪锋拿着信反复地看了又看，脸上露出惊奇的笑容，自言自语地感叹着，说：“了不起啊！”又转向史乾说：“你给咱们办了一件大事呀！”随后，汪锋详细询问了史乾通过封锁线的情况，叮嘱他不要到街上去。他说：“哪里有共产党，哪里就有国民党，防止潜藏在这里的特务盯上你。”当晚，史乾和汪锋睡在一个炕上。

史乾要回去了。临走前，汪锋同志交给他一个油纸密封的小包，告诉他：“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路上一定要保护好。”史乾把油纸包小心地塞进腰带里，装上几口袋盐向回返。

走到离炮楼不远的地方，史乾坐下来歇息。他解下腰带，把油纸包取出来塞进布袜子底里，随后便赶着牲口向炮楼走去。“站住！”炮楼那边传来厉声的吆喝。史乾闻声站住。这一次，哨兵先动手在牲口的驮子上搜了一遍，然后才去搜查史乾的身上。他命令史乾解开他的大腰带，脱下棉褂子。在对棉褂子一通胡摸乱抖毫无所获后，哨兵又命令史乾脱掉鞋子。眼看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史乾没有慌乱，他慢吞吞地脱着布鞋，飞快地在心里谋划着应对险情的办法。哨兵瞥了一眼史乾脱下的空鞋子，继而恶狠狠地再次命令他：“把袜子脱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史乾急中生智，一把捏住袜子底，紧紧攥住油纸包将袜子从脚上拉下来。攥着手里的袜子，史乾故意将袜口朝下抖着，向哨兵表明袜子里并没有藏着什么东西。袜子里浓重的脚气熏得哨兵直皱眉头，他厌恶地转过头，喊着让史乾赶快滚。史乾沉着地穿上鞋袜，吆喝起牲口，不慌不忙地朝回家的路上走去。有了这次送信的经历，回到家的史乾，想着自己终于为革命做了点事，心里暗自高兴，干起活来分外带劲，家里人还以为他这次驮盐赚了“大”钱！史乾冒险闯关送信，加深了他对革命的认识，也是由此开始，他揣上了一桩心事：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参加这个革命？自己是个农民，文化浅，家里负担重，干这事又有危险，能行吗？史乾翻来覆去地思索着干革命的事情，最终，过去所遭受的欺压，眼前这艰难的日子，使他下定决心干革命，“豁出去了！只要革命要我，我就干！”

杨济安再一次来到史家塬。史乾把从马栏带回的油纸包交到他手中，并给他讲了沿路和边区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心事。史乾问济安：“你说舅行吗？”济安高兴地说：“舅，你有决心，我看行！你做通过封锁线的交通比我条件好，我跑西安到铜川这一段，我们俩架一座看不见的桥，把西安和延安连起来。不过这毕竞是件大事，我定不了，要向领导汇报了再说。”送济安走时，史乾再三叮嘱他，千万别忘了他的事。

过了些时候，阴历年前，济安来信要史乾赶快去西安。史乾想这准是和上次送信，以及他托济安办的事有关，心里说不出地高兴。史家塬距西安200多里，当时天正下着大雪，史散不顾天寒地冻，迫不及待地买了火车票，直奔西安。

到西安见着济安后，济安连夜带着史乾来到鼓楼西边的一个商号。俩人从后门进去，后院平房里有人出来迎接他们。济安介绍史乾和李先生(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同志)相识。在屋里，李先生详细地询问了史乾的家世和个人情况，说：“你第一次带情报过封锁线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今后你愿意为革命继续工作吗？”史乾激动地说：“愿意！我早都想好了！”他把在村里受差役欺压的日子，连同想参加革命的心愿向李先生叙说了一番。李先生问史乾：“干革命很危险，一旦出事，会坐牢、杀头，连累家里人，你不怕？”史乾说：“我没干革命他们都抓我、打我，日子没法过。我发誓，头可断，血可流，党的秘密决不暴露！”听到史乾这样说，李先生满意地笑了。他郑重地告诉史乾，说：“上级已正式批准你为北线交通员，你家就是咱北路交通线上的一个据点，你的化名叫‘石生财’，今后你就用这个名字到马栏去联系。”

就这样，史乾走上了革命道路，将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以一个平凡“脚户”的身份默默为党的革命事业努力奋斗着。

# 柳林联合客栈

贯通耀县境内的沮水，浩浩荡荡从县境西北流淌而下，一路轻歌曼舞到柳林。柳林镇距县城五十余里，山清水秀，镇街上低矮的小土屋一字排开，静谧而温馨。

1940年初，柳林镇上新开了一家民生客栈，和镇子上所有的客栈一样，民生客栈主要以经商和接待过往客人为营生。实际上，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设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耀县的地下交通站，归关中地委保安处领导。柳林镇不大，但战略位置重要。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边区通往国统区的柳林镇远景重要通道，也是边区日用品、土产山货交易的集散地，从这儿继续向北，通往延安。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时期，柳林都是国共两党的必争之地。

1942年，民生客栈更名为柳林联合客栈，主要任务是以经商的合法身份作掩护。接送党的干部南下北上、搜集传递情报和做国统区统战工作，利用统战关系和保安团武装经商，为柳林联合客栈旧址今貌边区运送棉花、弹药、药品等生活和军用物资。共产党员张仲平任客栈经理。1945年夏，张仲平调往耀工委主持工作，将部分交通和情报联络工作转移到耀工委，客栈相继由邢子舟、刘永端负责。客栈负责人对外以经商和接待过往客商为名，实际上任务各有不同：副经理李更生主管中央社会部驻柳林情报联络站工作，副经理徐晓东负责西府地区地下党交通联络工作，副经理陈效真负责商洛地区地下党交通联络工作，江平负责陕工委情报工作。他们虽然同住一个客栈，但共同遵守党的工作纪律，直到全国解放后才知道彼此当时承担的任务。

从1940年设立之初到1949年西安解放，柳林联合客栈先后多次完成上级交给的护送任务，成功护送李先念、郑位三等我党重要领导人秘密前往延安。

1946年10月，陕工委接到武装护送李先念回延安的任务。工委书记赵伯平亲自负责这次护送，邢子舟(接替张仲平负责柳林联合客栈)等人在第一线指挥。为了圆满完成护送任务陕工委成立了由军峰等6位同志、耀工委武工队及淳耀县保安科组成的武工队，配备了手枪、冲锋枪、机枪等武器，武装护送李先念安全通过敌耀县以北的封锁线。

10月17日傍晚，李先念扮作国民党将领，身穿将军服，胸佩证章和勋章，人住洪水官路的王青海车马店(我党地下关系)休息。天黑后，秘密转移到我党地下交通联络点米养成家。半夜，陕工委武工队前来迎接李先念。武工队护送李先念到达洪水西原的老牛坡后向北行进，通过耀县下高埝、任家庄，神不知鬼不觉地经过敌人碉堡，进入陕甘宁边区，平安到达固贤村。饭后，武工队护送李先念辗转来到柳林镇，人住柳林联合客栈。在柳林停留一晚后，李先念被护送到陕工委所在地马栏。

在那战火纷纷的斗争年代，柳林联合客栈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雁门游击队的故事

解放战争时期，同(官)、宜(君)、中(部)、洛(川)一带，属陕甘宁边区南部敌占区，咸榆公路经此而过，交通运输方便，是国民党重兵进犯延安的必经之地。因此，内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中共黄龙特委，迅速派出精悍武装力量，到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把敌人搅得越乱越好。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这一指示，同时也是为了掩护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经关中西部撤回边区，增强保卫边区的军事力量。

中共黄龙特委接到指示后，于1946年9月下旬以中共雁门工委举办的教导队为基础，同双龙中心区百余民兵以及从陕甘宁边区调来的党、政、军干部共200余人，组建了雁门游击支队(简称雁门支队)，薛志仁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雷治启任副支队长，张文秀任副政治委员。初成立时，雁门支队下设一个大队，易生明任大队长，分一、四、七、九中队和教导队。年底，雁门支队相继成立了二大队(同富大队)、三大队(路东大队)、蒲白大队。至此，雁门支队发展到四个大队300余人。

雁门支队成立后，随着人员的增多，组织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东至洛河畔，西至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南至同官、富平、白水、蒲城边界，北至富县的张村驿、羊泉塬一带。雁门支队在这些活动区域，配合黄龙地区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还积极配合西北野战军进行了解放洛川、中部、宜君的战斗。1948年3月，黄龙地区全境解放，雁门支队与中部支队在店头集中，整编为黄龙分区独立二十二团。部队整编后不久，即派四中队(原雁门支队一大队四中队)保护宜君县机关由柏子桥返回县城。不久，九中队(原雁门支队一大队九中队)改编为宜君县警卫队。其余人员由黄龙分区司令员牛书申率领，开赴澄城、合阳地区配合西野主力进行东府诸战役。同年夏季，在澄合地区，与洛川、黄龙支队整编为警四旅十团，归西野一纵指挥，先后参加了荔北、蒲城十里铺、富平美原、铜川陈炉镇等战斗。1949年冬，警四旅在白水县休整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师，十团改编为解放军陆军三十四团，先后参加了解放铜川、耀县及淳化口头镇战役，消灭了胡宗南部三十六师；参加扶眉战役，解放宝鸡和兰州，并承担兰州警备任务；参加康乐县剿匪工作。1950年冬，十二师调郑州，改编为公安部队二十师，三十四团编为内卫五十八团。三年多来，在雁门工委的直接领导下，雁门游击支队深入国统区开展武装斗争，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同时，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为解放铜川等城市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雁门支队富于传奇色彩的战斗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民众中广为流传。

**孤胆英雄王俊昌**

咸榆公路在宜君境内长约50公里。这部分路段地形复杂，四周山大沟深，特别是宜君梁段，既便于出击敌人，又便于隐蔽撤退。雁门支队经常活跃在这条路上，出其不意地突袭敌人。其中，游击队员王俊昌的故事流传甚广。

1946年夏，王俊昌和三名游击队员深夜来到家乡偏桥镇。夜晚的小镇，一片静谧。王俊昌对同行的战友说：“你们埋伏在对面山峁上掩护接应，我趁黑摸进去搞它一下。”王俊昌摸进街道，径直闯进保公所，一把推开门，用枪指着正在睡觉的敌人说：“不许动，谁动先打死谁！”屋里的敌人全吓呆了。就这样，王俊昌一枪未发，缴获了三支步枪和三条子弹袋。出屋时，王俊昌佯装着喊战友：“你们都压在窗子外面，敌人谁动就开枪打死他。”接着，他又冲进另一孔窑洞，缴获两支枪和两条子弹袋。随即，快步冲到街上，回头朝保公所放了两枪，飞快撤出镇子。

王俊昌夜闯保公所，勇名传四方，人们称他“孤胆英雄杰娃子”(杰娃子：王俊昌外号)。这次突袭成功，游击队员们受到鼓舞，胆子更大了。几天后，王俊昌带着一个班来到偏桥塬。这一次，他们竟然埋伏在离偏桥街只有一公里的一座破碉堡中，白天放哨休息，夜间出击敌人。一天，游击队员们发现，公路上远远过来一辆大车。车由两匹马拉着，车后跟着几个挎枪的人。队员们迅速在公路两旁埋伏好，待敌人走近时，王俊昌先发枪，不料子弹卡壳，被敌人发现。情急之下，王俊昌随机应变大声喊道：“不要打枪，抓活的！”埋伏着的队员们听到命令，纷纷跳出来，向敌人扑去。这一次，王俊昌和战女们同样一枪未发就取得胜利，缴获敌人一批物资，有枪支、马匹、衣物和文件。王俊昌带领战友和敌人搏斗时，国民党专员余正东趁乱跳沟逃跑，等他回到偏桥镇公所搬来救兵时，偏桥塬上连个游击队员的影子都看不到。

雁门支队三天两头在咸榆公路沿线伏击敌人，宜君梁成了敌人的“寒心路”，直到1948年解放，这里再也没有安宁过。

**瓦渣岭歼灭战**

1946年9月，中共雁门工委按照黄龙特委“迎王(王震)”战斗的部署，为把宜君的国民党武装力量牵制在东部一带，工委书记薛志仁带领教导队49名战士、双龙中心区25名民兵以及30多名中部游击队员，共计l00余人，进行了历时12天的东征。期间，国民党宜君县长李笑然带领县自卫队200余人、保三团一个正规连前去宜君东部一带进行“围剿”，同时给同官县去电要求增援。国民党同官县长为了考验时任同官县第一保警中队长的许天洁(中共党员，被派到同官县搞党的地下工作)，派许增援。许天洁将计就计，秘密和地下党组织联系，准备将耀县行署配备给保警队的一批新式武器送给游击队，便带领20余名保警队员欣然前往宜君，驻扎在云梦乡南堡村瓦渣岭。

瓦渣岭坐落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梁上，是一座地势不太高的小山包，岭上杂草丛生，梢林密布。岭北面半山腰有一小地势低凹的村庄，住有十几户人家，附近有一座大房。许天洁带领保警队来到瓦渣岭，住在大房中等待时机。

两天后，中共雁门工委得到情报，根据地形，派易生明带领30余名游击队员从岭北山坡上向村子作正面进攻，派秦万智带20余名游击队员从村子对面北梁上翻沟截击，其余人员由薛志仁带领从东面接应。从南堡到瓦渣岭，是三里地的山路，队伍一路小跑着进入预定地点。易生明把部队拉成一条线，利用梢林、杂草作掩护，从岭上北坡压下来，摸掉了敌人的机枪岗哨，包围了大房。

许天洁在瓦渣岭住的这两天，正愁与游击队接不上头，乍听到“缴枪不杀”的喊声，知道是游击队来了，急忙和警卫员跃马而去，其余20多人全被游击队连人带武器俘虏。国民党宜君县长李笑然所带人马闻风丧胆，溜之大吉。

瓦渣岭战斗是雁门支队进行的重要战斗之一，重挫敌军土气，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壮大了雁门支队的声威。

**白家沟伏击战**

1947年2月，进犯延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攻占了中共关中地委驻地马栏。为配合关中地委反扫荡，陈开选、王俊昌、李勇、刘树林率雁门支队一大队四中队活动于宜君县西北40里处的白家沟一带，严密监视敌情。雁门支队支队长兼政委薛志仁率支队其余人员活动于柏子桥一带，与四中队遥相呼应。

白家沟一带南北是山，林木茂密，只有东西一条路，是国民党部队由黄陵向马栏前线运送弹药的必经之地。3月初的一天，一队敌运输兵沿宜君西部山岔川前行，向北运送弹药。一路上，敌军缓缓而行，走到山岔北面的常喜安村时停下休息，并派侦察兵前去探路。敌人的行踪被我雁门支队四中队侦察班发现，我侦察员不声不响，飞速绕到村北的高山头上，一边监视敌人动向，一边派战士谭清会回中队报告敌情。敌侦察兵沿路没有发现可疑迹象，于中午时分继续北行。雁门支队四中队当时正在彭镇白家沟村，全队虽有四五十人，但装备落后，枪弹甚少，只有30多件土造武器。接到侦察班报告后，中队长陈开选、副队长王俊昌、指导员李勇和西区区委书记刘树林等人立即开会，商量作战方案。大家一致认为，虽然我军装备很差，但士气旺盛，完全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会议研究决定，利用白家沟的有利地形布下埋伏，孙万海分队埋伏存南面山坡，陈开选分队埋伏在北面山坡，徐生有分队埋伏存西面(正面)诱敌，摆出口袋阵，只等敌人来钻。

敌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人我军伏击圈。埋伏在山上的游击队员盯着敌人一步步走近，人人紧握手榴弹，直等到敌人走到离自己只有二三十米远时，才一齐猛烈开火。随着手榴弹的爆炸，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战斗不久，只听副队长王俊昌一声高喊，“冲啊——”，游击队员们挺身而出，纷纷冲向敌人，英勇战斗，渐渐缩小了包围圈。狼狈不堪的敌排长企图以一部分人抵抗，掩护骡马队掉头逃窜，却不知后路早已被尾随跟踪的四中队侦察班堵死。回头逃跑无望，敌排长带领残兵掉头向北面山坡爬去，妄图凭借密集的柏树林继续顽抗。钻进树林的敌人仗着武器精良，躲在树后不停向外射击。一颗子弹擦着王俊昌颈部飞过，鲜血顿时流出来，他不顾自身安危，强忍疼痛继续指挥战斗，困敌于半山腰。18岁的年轻战士王进财奋勇冲进敌群，夺下敌兵一支步枪。此时，薛志仁带领的游击队及时赶来增援。他们冲上山头，从山上向敌人压过来。战士马永和趁敌人只顾向山下射击的时候，从侧翼溜过去，夺下一挺机关枪。敌人的火力渐渐减弱。最后，在我军“缴枪不杀”、“解放军宽待俘虏”的喊声中，躲进树林的残敌纷纷举手投降。

自家沟一战，我军全歼胡宗南一六五旅一个运输排，俘敌31人，缴获驮满弹药的骡马18匹，美式轻机枪两挺，步枪20余支，是雁门支队进行的主要战斗之一，达到了配合关中地委反扫荡，深入敌后牵制敌的预期目的。

# 淳耀县反“围剿”二三事

1947年2月，蒋介石纠集胡宗南部20个旅，马步芳、马鸿逵部14个旅，和榆林邓宝珊两个旅共23万兵马，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淳耀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开展了艰难的反“围剿”斗争。

**巧获敌情**

国民党大军压境，淳耀县游击队和民兵日夜防守，严密侦察和监视铜川、宜君、耀县及小丘方向敌军的动向。1947年2月中旬，胡宗南部突然在三原、富平、耀县、宜君等地大肆集结，兵不卸甲，马不离鞍，分别由同官、耀县、小丘三路进犯淳耀县。

就在胡宗南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同时，长期与人民为敌的宜君县玉华乡乡长程日春，耀县西爱乡乡长张彦宁，以及被任命为淳耀、柳林、庙湾镇还乡团头子的韩荣俭、焦云程等，趁机对当地群众进行武装袭扰。

中共淳耀县委书记郭进亭、县长封正宝获悉敌情后，为做好应敌准备，日夜轮流坚守在电话机旁，以便把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关中地委和军分区汇报。他们要求游击队靠近敌碉堡线，严密监视小丘方向的敌人，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向县委汇报。然而，一天一夜过去了，坚守在电话机前的郭书记没有接到游击队的一丝消息，急得在房间团团转。2月17日，郭书记从另外几个监视敌人动向的渠道获得情报，入侵之敌为数很多，仅淳耀县边界，除程日春、张彦宁的保安团、还乡团外，还集结着国民党正规军约六个旅，而此时淳耀县游击队和基层民兵不足千人。敌强我弱，分析敌情后，县委领导决定避敌锋芒，不盲目与敌正面作战，严密监视敌情，就地坚持对敌斗争。同时，要求各区、乡政府在敌军人侵之前，有组织地安排干部、民兵、游击队向师家道转移。

18日早饭前后，淳耀县委多次电话联系紧靠国民党碉堡线的同官、柳林、瑶曲，电话均无人接听。电话打不通，郭书记急得满头大汗。他猜测着，难道是敌人来势猛、进军快，区委同志来不及电话报告就撤走了？站在他身旁的《关中报》记者白玉洁说：“你分析得有道理，肯定是这样。”听白玉洁这样说，县委其他同志便建议县委马上转移。郭书记凝眉沉思了一会，表情严肃地对大家说：“敌情不明，同官、柳林、瑶曲几个区的同志是不是都安全转移了？没收到他们最后的汇报，县委坚决不能离开庙湾。”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同官、柳林、瑶曲的电话依然打不通！就在郭书记再次拿起话筒，准备拨打柳林的电话时，意外发生了，话筒里突然传出了声音：

“你是哪一部分？”对方喊话的声音很大，围在电话机旁的同志们都清楚地听到了。

“你是哪一部分？”郭书记听出对方是外地口音，便机警地模仿着他的外地话反问。

“妈的！你是哪一部分？”对方又问。

郭书记到这时已明确判断出电话那头说话的是我们的敌人，于是毫不客气地回敬到：“妈的，你是哪一部分？敢骂老子？混帐东西！”郭书记威严的斥责，一下子把对方震住了。

“对不起，自己人，误会误会。你是哪一部分？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对方边道歉边问。

郭书记随机应变，语调缓和地回答：“啊，自己人呀。没关系了。我是××师××团，现在已到达瑶曲以西的山上，你们是哪一部分？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我们是××师××团，现在在柳林和你通话，我们明天在庙湾会师……”不等敌人把话说完，郭书记立即把话筒压在电话机上，如释重负地对大家说：“敌人到了柳林，我们该撤走了！”

放下电话，郭书记立即指挥县委同志撤退。在他的率领下，大家以极快的速度带上干粮、水壶等简单行装，离开县委大院，向西奔进照金以北的大山里。当晚，郭书记一行借住在香山寺西北樊家沟杨十一老汉家，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封正宝县长、白兴武部长、范秉德科长会合。郭书记一见面就给封县长讲他与入侵柳林之敌通电话的奇遇。封县长听完他绘声绘色的讲述，风趣地说：“区委同志来不及打电话，可敌人倒把情报亲自送上门来，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师家道突围**

1947年2月20日，吃过早饭，郭进亭书记让白兴武部长存岱王庙继续监视南线敌人的动向，他和封正宝县长带领大家从樊家沟向师家道转移。

郭书记一行来到师家道半山腰，四里八乡的人们早从各个村庄汇聚而来。郭书记、封县长要求大家就地隐蔽，听候通知。师家道是淳耀县战备大后方，正午时分，聚集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全县5个区(瑶曲区未赶来)30多个乡的干部，县、区各公司营业员，合作社干部家属，教师，村干部，民兵，担架队，运输队，部分群众，以及关中分区所属的地方部队和部分单位的同志，几乎达500余人，都涌到这弹丸之地。

由于人员过于集中，引起了敌人注意。很快，敌人开始围攻师家道，甚至派出飞机进行低空侦察和袭击。突然身处险境，人们变得极为紧张。县联主任王志明、县报《群众生活》记者贾志良和县委宣传干部贾志芳安慰大家说，领导们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敌之策。听了他们的话，人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师家道小树林里，县委领导们正紧张地分析、讨论着应敌之策。就在这时，侦察兵又带来香山、照金、黑田峪和石门关已被敌军占领的消息。师家道三面被围。石门关方向激烈的枪炮声频频传来，头顶上，敌人的飞机一架接一架，从南向西飞到石门关山巅，向下猛烈俯冲扫射。顿时，石门关淹没在一片火海当中。群众的情绪又不安起来，急得在山上团团转。

忽然传来消息，县委领导叫大家到山梁西边的凹坡去开会。人群闻讯，潮水般涌向开会地点。等人们到齐了，封县长站在高处神情凝重地告诉大家，师家道东边的香山，南边的照金、黑田峪，西边的石门关，都被敌人占领了，情况严峻，县委、具政府研究决定，立即分散突围。封县长讲完后，白玉洁、王志明、贾志良等青年干部相继站起来发言，要求有组织、有领导的突围。封县长解释说：“有组织、有领导的突围，人多目标大，容易引起敌人注意，造成更大的损失，化整为零，各自想办法突围是最安全的。大家都是本地人，外地干部在耀县也已工作多年，熟悉地形，人少不容易暴露，容易突围。如果突同不成，就地分散也好隐蔽。”听了封县长的解释，众人觉得在理，于是大家分散行动。

为了路上有个照应，大家自由结合，三五人一组，决定晚上趁天黑向南突围，利用敌人合围的间隙迅速跳出包围圈。白玉洁和宣传干部张世第分析，天黑以后敌人肯定要把队伍收拢一下，照金、黑田峪之间的栏杆川估计不会有敌军，可以利用空隙从这里突围。几个人粗算了一下路程，太阳落山时从师家道山麓下山，半夜时分越过栏杆川，再向南走20里，天亮前能到凤凰山，这样一来就摆脱了敌人。计划好后，一群人等着太阳落山。太阳落山后，白玉洁、张世第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整好随身物品，向南坡下走去。没有分散行动的70多人，郭书记、封县长让白玉洁、张世第将他们编成一队带着走。有过战斗经历的三个人被安排在队伍最前边，负责为大伙儿搜索敌情和探路；有枪的同志散开走在人群前边、中间和后边，保卫大家的安全。分工停当后，这支70余人的队伍，有秩序地向山下悄然前行，并在夜半时分成功冲出敌人包围圈。是夜，被围困在师家道的人们，在淳耀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指挥下，凭借自己的智慧，全部安全突围出来。

**军民鱼水情深**

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疯狂“围剿”，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抢光、烧光、杀光)政策。根据地人民没有被敌人的淫威吓倒，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舍身救助革命同志，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充分体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

白玉洁、张世第在师家道突围后，夜经栏杆川，越过照金、黑田峪敌人的合围线，正谋划接下来该往哪儿去时，恰巧碰到几个出来躲避敌人、正牵着牲口回家的老乡。老乡们得知白玉洁、张世第是庙湾县政府干部，才从师家道突围出来，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赶忙把他们领回家。到家里以后，老乡吩咐媳妇赶紧生火做饭，自己则连忙为他们烘烤汗水浸湿的鞋袜和衣服。老乡家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催促俩人赶紧上炕取暖，还拿出核桃给他们吃。坐在热乎乎的炕上，大娘拉着白玉洁的手，含着眼泪问：“你们突围出来了，咱封县长他们呢？”白玉洁、张世第此时并不知道郭书记、封县长的突围情况，但为了安慰老人，就告诉她封县长他们都突围出来了。老大娘这才收住泪，说：“敌人烧了房子，抢走了衣服粮食，还砸烂了锅碗，这都不要紧，只要咱们人在，就能想办法赶走他们。”白玉洁、张世第在老乡家吃饭时，老大娘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大娘的期望，是对革命战士最大的信任与鼓励。

胡宗南部队占领淳耀县后，相继占据庙湾、柳林、瑶曲、照金等地，控制当地交通要道，进行“清剿”。从师家道突围出来的淳耀县干部，在敌人疯狂的“清剿”面前，只好分散隐藏在群众中间，保存实力，相机而动。

老乡们把革命干部、民兵、游击队员当作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不顾家人安危，想方设法掩护他们。遇到敌人进村“清剿”，老乡们就会及时地将伤病的革命干部转移到深山老林里躲起来，不辞辛苦和危险为他们偷偷送来饭食和情报。碰上危急情况，干部们一时脱不了身，村里的老乡们便以父子、夫妻或兄弟姐妹与他们相称，蒙蔽敌人。柳林小学教员王任、税务局干部姚俊凯，曾隐蔽在香山寺下的后槽村。一天，敌人突然来“清剿”，干部、群众都没有来得及转移，王任和姚俊凯被敌人纠缠盘问，情急下他们手握牛鞭站在老乡中“装聋卖傻”。敌人还要过来追问，老乡们纷纷说：“两个傻子，你们问也是白问。耳聋，听不见，只知道放牛。”敌人看老乡们说得随意，不像是骗人的样子，便信以为真，不耐烦地摆手说：“走，走，走！”老乡向王任和姚俊凯偷偷使个眼色，俩人赶紧甩起牛鞭，赶着牛向山上走去。

# 杨秀娥舍身救护革命干部

1947年2月，胡宗南调集精锐部队3万余人，杀气腾腾地将淳耀县党、政、军机关单位，约四五百人，围困在照金附近的师家道。在敌众我寡、力量对比悬殊的形势下，淳耀县政府采取“节节抵抗、主动转移”的战术，发起了师家道突围战。柳林联合客栈土产公司20余人也随机关突围。突围后，土产公司的冯彬、寇书义两人，隐蔽在池家庄(原属阿子乡，今归关庄镇)何自成家里，并将所带枪支、黄金等物资委托其侄何振海、杨秀娥夫妇坚壁起来。

池家庄，地处淳耀县南端，是当时红、白区的交界地。居住在该村的何自成家是个革命的大家庭，汪锋、江平等老一辈革命者都曾以何家为据点从事革命活动。1943年后，陕甘边区挂子砭土产公司曾在池家庄设立推销站，何家就是推销站的办公处。

淳耀县党、政、军机关人员在师家道成功突围后，国民党主力部队日夜在附近的高山槐“清剿”，对我方人员进行搜索和追捕，其中百余名敌军就驻扎在距池家庄仅二里路的让义村。敌人每天都要到池家庄以清查户口为名，搜查追捕我革命同志，何家成为他们反复搜查的重点。为了确保冯彬、寇书义两位同志的安全，何家将他俩转移到池家庄西半里路的深沟小窑内隐蔽起来。何家女主人杨秀娥，每日早早做好饭，让伯公何自成老人借割草之机给两人送去。

斗争愈演愈烈，形势更趋紧张。在严峻的斗争面前，柳林土七产公司姚志德叛变。为了立功，姚志德带领西和乡特务赴池家庄何家“清剿”，并将何振海带到让义村审讯。敌人没有从何振海口里得到任何东西，便在其宅院挖地三尺寻找枪支、黄金和大烟土，并将其妻杨秀娥吊在院里树上打得遍体鳞伤，逼她交出土产公司干部、黄金和枪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杨秀娥几度昏厥，特务们一次次用冷水将她泼醒，穷凶极恶地叫嚣道：“杨秀娥，不想死就把人和东西交出来！”面对疯狂的敌人，杨秀娥这位农村妇女大义凛然地答道：“我不知道……”气急败坏的敌人于是把吊在树上的杨秀娥用绳索拉上放下反复折磨，美其名日“坐洋飞机”。豆大的汗珠从杨秀娥头上纷纷滚落下来，年迈的婆婆上前制止敌人的暴行却惨遭毒打，两个孩子吓得躲在奶奶身边嚎啕大哭。最终，怀有身孕的杨秀娥被敌人折磨得失去了尚未出生的孩子。敌人在何家整整搜查了三天，一无所获后骂骂咧咧地撤走了。

由于杨秀娥的舍身救护，冯彬、寇书义两位同志得以躲过敌人的搜捕，安全脱险。他们藏在何家的110两黄金以及枪支等物资，全都分毫不差地交回土产公司。

光阴荏苒，80年代中期，冯彬夫妇从四川成都回到阔别40年的池家庄探望何振海一家。踏进何家大门，望着满头白发、饱经沧桑的杨秀娥，冯彬充满感激地说：“秀娥大姐，当年你就是咱淳耀县的‘刘胡兰’啊，要不是你舍命相救，哪里还有我的今天呢！”

# 掩护战友 英勇献身的田维平

田维平，原名明儿，1908年生，宜君县西村乡北文兴村人。出身农民家庭，8岁入学，宜君县立高小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员。教书期间，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初步接受马列主义革命思想。

1936年7月，田维平加人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在石堡村召开的中共红宜县委成立大会。这年年末，抗日义勇军独立第三团组建，田维平加入这支队伍，任四连指导员。四连在洛川被敌人打散后，田维平辗转进入陕甘宁边区，来到边区独立团工作。1946年，组织派田维平、杨建舟到宜君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田维平担任雁门支队二大队三中队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和队长秦万智经常带领游击队到宜君五里镇、棋盘、寺天一带活动，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受到周围群众热情欢迎。

1947年3月10日，田维平和秦万智带领游击队到寺天一带活动，夜宿牛虎岭村。深夜，由于有内奸给敌人暗中报信，游击队驻地被国民党棋盘镇公所镇丁包围。敌人先打死游击队站岗的哨兵，然后将所有枪口对准游击队睡觉的窑洞射击。生死攸关之际，田维平和秦万智果断作出决定，游击队不能坐以待毙。拼死也要冲出敌人的包围。田维平手握盒子枪，第一个冲向门外，在窑门口不幸中弹倒地。当战友们急着营救他时，田维平却命令大家：“不要管我，我掩护大家往外冲！”田维平忍着伤痛频频向敌人射击，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游击队突围。最终，秦万智和战友们都冲了出去，而田维平却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年仅39岁。田维平牺牲后，残忍的敌人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宜君城门楼上示众。他的弟弟田明顺买通国民党卫兵，趁黑夜把头偷回去寄埋。战友们将田维平的尸体寄埋在良河村一个木炭窑内。

1948年宜君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把田维平的尸体运回北文兴村，将头和尸体合到一起埋葬，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983年，田维平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 奇袭耀县城

耀县北依铜川，南接三原，是咸铜铁路和咸榆公路的重要联结点，扼陕北、关中交通之要冲。1947年，耀县为国民党陕西第三行政专署所在地，驻有国民党军第十师八十五旅第二后勤部、野战医院和陕西省保安第七团，以及存放弹药、被服、粮食等军用物资的军火库两处，是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后方供给基地。

1947年春，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牵着胡宗南主力部队酣战于陕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之际，西北人民解放军之一部警一旅三团、警三旅五团，趁敌后方空虚，自陕北急行军挥戈南下，准备攻打耀县城。解放军进入耀县境内庙湾、柳林一带后，即严密封锁消息，宿营休整，原地待命。经常过往耀县的中共关中地委交通员孙光明，陪同化装成农民的部队作战科科长前往耀县，在城内找到地下党联络点的翟松山等同志，对县城地形、交通、重点建筑、敌军驻防及兵力分布情况——侦察了解。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柳林、照金等地干部带领民兵、群众，先期奔赴耀县以南敌占区富平县境，拔掉电杆，破坏铁路桥梁，提前截断耀县与西安之通讯联络，迫使耀县守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战前准备工作完成后，我军定于5月5日攻打耀县城。

5月4日傍晚，耀县东城门进来一队国民党士兵，队列中还夹杂着几副伤兵担架。士兵们说部队在陕北遭到共军袭击，他们这是往后方运送伤员。其实，这是由解放军先头部队伪装而成的“国民党军”。他们所抬的担架，是用棉被裹着的八二炮，担架上的“伤兵”，怀里抱着重机枪。由于进城的士兵大都是一幅垂头丧气的败军模样，耀县驻军对自己的“兄弟”并没有过多盘查，直接安排他们在城里歇息了。天黑下来后，耀县驻军邀请这支进城的“国军兄弟”去南街关帝庙剧场看戏。

南街关帝庙剧场，民声剧社正在上演秦腔《盗虎符》。为了保障进城先遣人员的战前安全隐蔽，同时给主攻部队以充裕时间做好战前部署，我党地下同志通过关系要求剧社演完本戏再加演一出精彩节目。耀县南街著名秦腔演员张鸿中被请到剧场里来。剧社社长要求张鸿中加演一出《起解》，张鸿中不解地问：“《盗虎符》前后两本演完都不早了，再加一出《起解》，哪要演到啥时候！？”剧社会计刘志新极力撺掇张鸿中加演，说：“今晚上重要人士要求加演，不怕时间晚。”《盗虎符》演完了，舞台上紧接着演起《起解》。戏散场后已是夜半时分，看戏的群众四散回家，城里到处响起敲门声、呼叫声、狗吠声……突然，夜空中枪声大作，突袭耀县城的战斗打响了。

解放军攻城作战指挥部设在耀县塔坡(原省立中山中学校址)西北隅的几孔窑洞里，西北人民解放军四纵(军)司令员王世泰亲临耀县前线指挥战斗。在夜色的掩护下，一队队左臂扎着白毛巾的解放军战士，自城北锦阳川一带迅速开往耀县城。

警三旅五团担任主攻。五团一营副营长王胜福带领二三两个连架设云梯，神速攀上耀县东北角城墙。团长郭应春随部队登上东门城墙指挥战斗。副排长李应般带一挺机枪掩护突击队，从东城门楼沿城墙向南，接连打掉敌人八个工事。黑漆漆的夜里突然枪炮隆隆，耀县守军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国民党陕西第三行署专员阎崇师(新任到职六天)，以为城内保安团同胡宗南军发生内讧，急忙带护兵出外巡视。阎专员疾步走到西城门附近，扯着嗓子大喊：“你们不要打枪，我是专员！”解放军战士在城墙上应声答到：“专员请上城来！”阎专员急匆匆来到城墙上，解放军战士迅速夺下专员护兵手里的驳壳枪。阎专员以为这些士兵仍是他派守城防的保安团队员，怒冲冲嚷到：“你们反了？我是专员兼保安司令，你们竟敢缴我的枪！”解放军连指导员傅子良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敢缴你的枪？”阎专员惊愕无语，战战兢兢地束手就擒。战斗进行到拂晓时，解放军已完全控制了耀县四面城墙，后续部队也风驰电掣般涌人城内，向敌人勇猛冲杀，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解放军的冲锋号伴随着黎明的曙光激越地吹响了。三营七连冲进敌保安七团团部，活捉了敌保安七团副团长。三营九连占领了城内邮电局、银行等地方。次日上午10时，解放军基本控制了整个耀县城，与主力部队陕北蟠龙大捷遥相呼应。

耀县一战，我军歼敌第十师八十五旅第二后勤部、辎重营、野战医院和省保安第七团团部等1400余人，生俘敌专员、少将保安司令阎崇师、敌八十五旅野战医院上校副院长欧阳斌、敌保安七团副团长等人，缴获迫击炮一门，轻重机枪70余梃，步枪1500余支，各种子弹25万发，军衣3000余套，骡马100余匹，电台四部，以及面粉、布匹、罐头等大量军用物资。

奇袭耀县，西北人民解放军自陕北飞兵南下，彻底摧毁了胡宗南进攻陕北军火物资的重要补给据点耀县城。这是陕甘宁边区军民反击国民党胡宗南军猖狂进犯由内线防御转向外线进攻取得的重大胜利，攻城部队受到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通电嘉奖，解放军的赫赫威名，八百里秦川为之震动。

# 卧底英雄王子文

王子文，又名王郁斌，1912年生，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人。解放前，王子文长期从事陈炉地区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7年，贺龙率红二方面军驻扎在陈炉镇。3月，时任县立二高事务员的王子文，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在贺龙的直接影响和关怀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被增补为中共同官工委组织委员。1 938年初，中共同官工委遵照上级指示，决定因时制宜，把活动方式转向打入敌人内部，以合法身份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明，王子文受命出任国民党同官县陈炉镇联保主任，改名王郁斌。走马上任后，王郁斌与国民党当局巧妙周旋，积极创造有利于党组织发展的各种条件，协助县工委向陕甘宁边区选送青年干部，设法保护红军家属和我党地下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了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发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中共同官工委决定派王郁斌打人国民党同官县政府内部工作，以便更好地掩护地下党组织和党的地下工作者。1940年春，王郁斌接任同官县田赋科科长一职，主管全县土地丈积定赋工作。1946年7月，王郁斌担任同官县保甲指导员，统管全县各联保的保甲工作。l0月，组织要求王郁斌利用合法身份和各种关系，多做国民党同官县长的工作，争取再回陈炉当镇长。1947年初，王郁斌接任同官县陈炉镇镇长一职。此后，他利用陈炉镇长的合法身份，积极为党工作。

**开辟暗边区**

王郁斌当上陈炉镇长后，兼任陈炉自卫队队长，并任用他的学生罗聚瑞为镇队副，对镇丁进行整顿，将一些不良分子清退，把贫苦人家子弟充实进来。陈炉自卫队共28人，人虽不多，但却成了我党掌握的一支地方武装力量。与此同时，王郁斌还对各保保长进行了调整，任用共产党员王宏俊为一保保长，负责东河川、雷家坡地区工作；把那些思想倾向共产党的人，分别委任为上店、立地坡、马村、安村、上街、咀头、水泉头等保的保长，基本形成以雷家坡、立地坡、上店为重点，上街、咀头、水泉头辅之的暗边区。

接着，又架设了从县城到陈炉镇、从陈炉通各保的电话线，并将段崇文安排到镇总机室，掌握机要联络工作。游击队经常活动在东河川、上店、立地坡一带，游击队一到，各保保长即用电话报告给王郁斌。游击队撤走以后，王郁斌才用电话。向金县长报告，搅得国民党县长惶恐不安，多次派县城的国民党军到陈炉“清剿”，皆一无所获。但是，也有发生意外的时候。一次，汝颜奎(金县长派驻陈炉的军事参谋)用电话向会县长报告，共产党游击队住在上店、育寨一带，要求县上派兵剿灭。当时，电话室是县上派来的一名机要员值班，这一消息的外传，王郁斌毫不知情。次日拂晓，国民党一个团由县城突然抵达陈炉镇，敌团长进了镇公所什么话也不讲，只要求镇公所马上派向导去上店、育寨抓游击队。王郁斌听到这一消息，又惊又急，无奈之下只好派人前去当向导。国民党军离开镇公所后，王郁斌随即以询问的口气用电话同上店、育寨保联系，将国民党前来“围剿”游击队的紧急情况给以暗示。由于消息传递及时，游击队闻讯后迅速撤离，敌人又一次扑了空。

陈炉电话线变成了党的情报线，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这其中凝聚着王郁斌的大量心血。

**佯攻前塬假成真**

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开始大举进攻延安。同官、宜君、耀县成为国民党军北上集结的要地，咸铜铁路和咸榆公路成为国民党运送物资的重要供给线，沿途十步一哨、十里一堡，警戒森严。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分区决定成立路东工委，以咸铜铁路为界，开辟铁路以东的同官、白水、蒲城、富平新的斗争区域。

3月，路东工委书记张凤岐率领同官、白水、蒲城、富平四县干部，连同警卫人员30多人，从马栏出发，越过咸榆公路封锁线，在耀县药王山集中，星夜兼程，于拂晓到达周家村前塬山峁上。其时，山道上已有到辗道沟驮炭的行人和骡马。为了不走漏风声，路东领导决定就地休息，在前塬宝贝梁郭喜文家住一天，待天黑后再东进。

不料，路东干部队的行踪，正巧被路过该村的镇公所炊事员贺印顶发现，前塬来了游击队的消息很快在镇公所传开。早饭时间，王郁斌正在吃饭，汝颜奎端着饭碗来找他，告诉他据可靠情报，共产党八路军30多人，正在郭喜文家睡觉，要求镇长派镇丁前去消灭。汝颜奎说得有根有据，王郁斌心中大惊，昨天晚上，自己才听说近日有路东首长过境，汝颜奎的消息怎么会这样准和快？情急之际，王郁斌定下心来，笑着问汝颜奎：“这个消息是真的吗？胡总司令正在大举进攻延安，每天都有国军经过铜川，难道共产党八路军能从天上飞到前塬，开什么玩笑？！”汝颜奎争辩说：“情报绝对可靠，这是贺印顶亲眼所见。”王郁斌叫汝颜奎把贺印顶传来一问，情况果然属实。汝颜奎出去后，王郁斌将贺印顶严厉地骂了一顿。贺印顶连连认错，保证以后有事，一定先向王镇长报告。

派镇丁去前塬打路东首长势在必行，思来想去，王郁斌决定在时间上尽量拖延，为同志们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休整和离开。他开始和汝颜奎斗智斗勇。

汝颜奎匆匆吃完早饭，立即催王郁斌派镇丁出发。王郁斌不慌不忙地说：“你去把罗队副找来，咱们马上开个会，先研究一个方案，然后再出兵。听说共产党八路军个个都很厉害，咱们不能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派兵好派，打败了咋办？”汝颜奎在镇公所各房子转了一圈，没有找到罗聚瑞。王郁斌告诉他：“罗队副这几天正在催壮丁，在镇上找不见，可能回东罗山去了。”汝颜奎带人赶到东罗山，仍然没有找到罗聚瑞。其实，罗聚瑞正在“忠信诚”字号喝酒、打麻将呢！王郁斌故意不告诉汝颜奎，和他兜圈子。时间到了下午两点多，王郁斌估摸路东首长们休息得差不多了，一夜行军的疲劳可能已得到缓解，汝颜奎像瘟神一样紧盯着自己，他怕拖得太久节外生枝，于是在心里盘算一番，罗聚瑞回来开会和镇丁赶路各需要一个多小时，设法在路上多绕个山梁，时间差不多就到下午五六点钟了，天一黑下来，路东的同志们就便于行动了。在心里谋划好，王郁斌对汝颜奎说：“汝参谋呀，听说罗队副从乡下回来了，不知在上街谁的家里，你去看一下。”汝颜奎从东罗山走雷家坡空跑一趟，虽然很累，但为了争头功，他没有休息，马上去上街找罗聚瑞。下午三点左右，罗聚瑞回到镇公所。王郁斌主持开会，研究作战方案。汝颜奎与罗聚瑞在开会中问起了争执，汝颜奎想走近路，从立地坡、枣村方向压下去，包抄共产党八路军；罗聚瑞呢，要走双碑方向，翻沟过来，从下往上包抄，他说：“镇丁无战斗力，不可硬打，八路军训练有素，打仗经验多，只要能把游击队赶走就不错了。”王郁斌同意罗聚瑞的方案，汝颜奎不同意罗聚瑞和王郁斌的方案，认为兵贵神速，力主打歼灭战。双方争来争去，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王郁斌感到时问差不多了，总结说：“走近路的方案可以，但有两条原则必须注意，一是同共产党八路军打仗，不可硬打。这些人都是穷光棍，没家没舍，打仗拼命，而我们镇丁都是当地人，都有家小，谁被打死都不好交待；二是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要把共产党八路军赶出陈炉地区就可以。”王郁斌反复强调：“不许伤一个自己人。”他这是一语双关，有意当着汝颜奎的面向罗聚瑞做交代。

会议结束后，罗聚瑞把镇丁集合起来，王郁斌作简短动员，要求大家互相关照，立即出发。把镇丁们送出镇公所时，王郁斌偷偷向罗聚瑞交代，要求他提前开枪向路东首长们发信号，以便他们提前撤离，并一再叮嘱，绝对不许把同志们堵在窑洞里。不料，镇丁们行至马科村时，罗聚瑞要走马科前梁，汝颜奎要走马科后凹，二人又起了争执。汝颜奎是军官，罗聚瑞执拗不过，只好改变王郁斌所确定的行进路线。当走到枣村至前塬崾岭时，罗聚瑞按照王郁斌提前开枪报信的指示，装作走路被石子滑倒，放了一枪。听到枪响，汝颜奎问：“怎么回事？”罗聚瑞说：“走火了。”汝颜奎见此情景，打了罗聚瑞一个耳光，骂他通共，命镇丁跑步包围郭喜文家。

罗聚瑞血气方刚，大骂汝颜奎血口喷人，大声命令镇丁们上地峻，离郭喜文家远一点，小心挨飞子儿(子弹)。镇丁里有个叫靳国栋的，年仅15岁，人小不懂事，没有听懂罗队副的活，跟着汝颜奎跑到了郭喜文家窑背上。由于鸣枪太晚，路东干部队被堵在郭喜文家院子里。汝颜奎居高临下，扬起手枪射击，打伤路东干部周敦的腿。路东的同志们集中火力从院子中朝窑背上射击，打得汝颜奎不敢靠近。穷凶极恶的汝颜奎见靳国栋身背手榴弹，令其将手榴弹快往下扔。靳国栋哪里见过这番阵势，看到院子中八路军人多火力猛，吓得呆住了，虽然在汝颜奎的命令下，把手榴弹拿在手中，但并不会使用。汝颜奎将手榴弹后盖打开，拉着引火线，令其快扔。靳国栋把手榴弹举在手中没有及时扔出去，结果手榴弹在手中爆炸，伤其右手四指。就在这一瞬间，路东干部队冲出院子，反击着撤退，抬着周敦经崖窑村下沟，走崔家岭到王家院，越军台岭北去。一匹小红马没有来得及带走，被汝颜奎牵回陈炉镇。

陈炉自卫队这次佯攻前塬，尽管王郁斌和罗聚瑞努力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汝颜奎紧盯不放，依然弄巧成拙，路东干部队和陈炉自卫队各伤一人。好在罗聚瑞控制着多数镇丁，加之靳国栋伤手，大家都忙着救人，汝颜奎不敢冒然追赶，才使路东的同志们得以安全转移。

陈炉自卫队在前塬攻打路东干部队回来后，汝颜奎对王郁斌报告罗聚瑞通共，未进前塬村时就开枪，故意向共产党八路军通风报信，要求处理罗聚瑞。王郁斌说：“前塬战斗多亏汝参谋效力，罗聚瑞是农民的儿子，没有受过训，也没有打过仗，他一回来就向我说你的好，还说把他吓得腿发软，被石子一滑，跌得坐在地上，枪走火还不知是啥原因。希望汝参谋多多海涵，都是自己人，不要疑神疑鬼。”为了化解汝颜奎和罗聚瑞之间的矛盾，王郁斌在饭馆宴请汝颜奎，安排罗聚瑞在席间向汝颜奎道歉，说了他不少好话，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大智大勇掩护党**

王郁斌刚回陈炉镇当镇长时，一天晚上，他的一位在镇公所当差的亲戚悄悄告诉他，罗聚瑞暗通共产党，多次夜间去上店和共产党游击队接头。王郁斌闻言，厉声呵斥这位亲戚：“你吃粮不多，管事不少，在镇公所吃饭，不要多管闲事，汶件事到我这里为止，再不许给别人讲。”事过之后，王郁斌对罗聚瑞说：“有人给我报告你‘通共’，说明咱们工作有疏漏之处，今后做事一定要严谨，以防不测。”

8月的一天，富平游击队在陈炉上店活动，同官县自卫团一个营从县城偷偷到达陈炉镇。县长金武平在县自卫团到达陈炉后才给王郁斌打电话，要求他做好配合工作。王郁斌感到情况突然，觉察到县长对自己不信任。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他一面沉着地秘密派镇丁高志伟抄近路速向驻上店游击队通风报信，一面派镇丁做向导走大路向上店进发。由于报信及时，敌人进村时，富平游击队闻讯刚刚撤出上店村，敌人扑了个空。

还有一次，许天洁带领同官游击队来到陈炉双碑村，在此临时休息吃饭。由于游击队驻此时间较长，加之又是白天，消息走漏，汝颜奎得知后，要求王郁斌立即派镇丁前去“清剿”。王郁斌吸取了前塬的教训，一边同汝颜奎、罗聚瑞开会研究作战方案，一边秘派人员火速赶往双碑，通知游击队紧急撤离。当汝颜奎和罗聚瑞带着陈炉自卫队行至咀头村时，许天洁带着游击队早已上了军台岭。

l948年春节期间，县长金武平派段向荣巡官到陈炉镇值班，监视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段巡官到陈炉后，对镇上的工作指手画脚，搅得镇丁们过年都不得安宁，王郁斌决定把这位段巡官让游击队教训一下。正月初七这天，罗聚瑞以过年请客为名，请段巡官去街道上的饭馆喝酒。罗聚瑞和段巡官刚走到“袁封升”门口，富平游击队的三名队员冲上来，用枪顶着段巡官的后背，迅速将他的手枪下掉，吓得段巡官跪在地上不知所措。事后，段巡官回到镇公所抱头大哭，没有了枪，他回去如何向金县长交待？！王郁斌闻知游击队下了段巡官的枪，内心非常高兴。作为同事，他装作很关心的样子赶紧去看段巡官，谈话当中告诫段巡官被游击队下枪之事，万万不可对外声张，以防县长得知，怀疑你暗中通共，并且答应设法帮他解决枪的问题。王郁斌对段巡官恩威并用，吓得段巡官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王郁斌给他作主。后来，经过王郁斌做工作，罗聚瑞归还了段巡官的枪，以便使他回去能够交差，段巡官感激不尽，不久便回了县城。

**痛打宜君县长韦孟若**

1948年3月10日，宜君县全境解放。国民党宜君县长韦孟若率国民党宜君县政府工作人员及县自卫团300余人，从宜君逃亡到铜川。韦孟若到铜川后，要求铜川县长金武平给其一席之地屯兵秣马，待机攻回宜君，金县长欣然应允。

晚上，金县长给陈炉镇打电话，先向王郁斌询问陈炉地区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情况，然后以关心的口气询问王郁斌：“你独居陈炉镇，常和共产党游击队搞摩擦，心里害怕不害怕？”王郁斌不知金县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问此话是何用意，缓缓说道：“效忠党国，害怕有何用呢？同共产党摩擦之事，也已经习惯了。”金县长说：“你是好样的，要小心恭职。”最后，金县长以私人关系向王郁斌透露了宜君县已被其产党占领，县长韦孟若率县政府工作人员和县自卫团逃到铜川的消息。说完，金县长要求王郁斌不要向外泄露这个消息，以防人心不稳。王郁斌嘴里向县长作着保证，内心却是无比的欢喜。

和金县长通完电话后，王郁斌感到组织调他回陈炉为党守据点、争地盘、掩护组织、迎接解放的重任就要实现了，宜君已经解放，铜川的解放指日可待。王郁斌想着想着，激动地坐不住，干脆在房子里踱起步来。突然，桌上的电话又响了，金县长再次打来电话。金县长在电话里说，韦县长带着政府工作人员和县自卫团到铜川后，原想安排他们驻在黄堡镇，后来考虑到黄堡距宜君太远，还是驻在陈炉比较好。陈炉北通宜君，便于韦县长派人回去工作。同时，陈炉一带共产党游击队活动频繁，韦县长带着人马驻扎在陈炉镇，更加强了陈炉防共反共的武装力量。金县长在电话里征求王郁斌的意见，王郁斌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以陈炉是工业区，出陶瓷，但不产粮，军需粮草无法解决为由婉言谢绝。金县长说：“粮草问题，由县自卫团负责往陈炉运送。”王郁斌知道无法再推辞，只好答应金县长。但他同时决定，马上寻找中共同官工委，请组织通知路东纵队来消灭宜君县长韦孟若及宜君自卫团。路东纵队下辖同官、白水、蒲城和富平4个支队，四县工委和路东工委皆随支队行动，队员时而分散以发动群众，时而集中以消灭敌人，平时分散居住在群众家里，隐蔽在陈炉东北部山区。当时，中共同官工委规定，不许王郁斌同组织直接联系，为了寻找县工委，他只好写信派段崇文送到上店张家骡马店，请求组织速派部队前来消灭敌人。段崇文送信走了后，王郁斌立即加了岗哨。派镇丁把汝颜奎参谋暗中监控起来，并派罗聚瑞去育寨找游击队，把回家的镇丁叫回来。王郁斌属文职官员，不会打枪，更不会指挥军事行动。敌人来了300多人，而镇公所当时仅有28名镇丁，且有几个回家未归。军情紧急，寻找工委领导雷炜成了王郁斌的头等大事。铜川县城距陈炉镇30多里路程，敌人说来抬脚就到，王郁斌心急如焚，坐卧不宁。

11日早晨，咀头保长电话告知王郁斌，宜君县长韦孟若已到咀头。王郁斌拿起话筒，向韦县长表示问候和欢迎，同时用电话将其稳在咀头，让他先就地吃饭、休息，待镇公所收拾好房子，他即派罗队副前去迎接韦县长。此时，外出联络的几路人都回来了，皆未同组织取得联系，咀头距镇公所约二里路，情况十万火急。王郁斌放下电话后，再次派人急去上店、育寨寻找党组织和游击队，自己则急得来回踱步，不知不觉转出北堡子，来到陈炉街道。街上熙熙攘攘，不少熟人向王郁斌打招呼，而他都像没听见似的。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段崇文上街来找王郁斌，告诉他：“游击队来了，罗队副也回来了。”王郁斌三步并作两步火速赶回镇公所。回来后，王郁斌吩咐罗队副赶快关上堡子城门，先叫游击队领导到镇公所谈情况。不料城门一关，游击队立即停止前进，怀疑其中有诈，遂开枪射击，准备硬攻镇公所。王郁斌见游击队开枪，即令镇丁们在堡子上朝天鸣枪，决不许打伤游击队一个人。双方枪声激烈，几分钟后，王郁斌命令镇丁们停止鸣枪，叫罗聚瑞打出白旗，向游击队喊话：“我们投降，欢迎八路军进城。”王郁斌故意对外造成一种假象，镇丁们抗不住共产党游击队，被打得投降了。同时，也让金县长的心腹汝颜奎知道，游击队攻势很猛，镇丁们根本不是其对手。自从在前塬打了共产党游击队之后，游击队多次写信通缉汝颜奎，加之段巡官被游击队当街下枪险中逃生，早已使这位一心与共产党为敌的人变得胆小起来，听到枪声，躲在房子里不敢出来。游击队看见白旗后迅速向北堡子开进。

宜君县长韦孟若在咀头听见枪声，从咀头保公所打电话询问王郁斌发生了什么事。王郁斌从容回答：“一股共产党游击队把堡子城门堵住啦。”韦县长问：“叫我们从什么方向来支援？”王郁斌说：“堡子西北角没有共军，你们从北沟方向前来，我派人在城墙上放绳梯接你们。”韦县长叫王郁斌坚持住，他马上率宜君自卫团前来增援。王郁斌放下电话，安排段崇文将电话线割断，停止同外界通话。说话间，王思亭已经带着游击队进了陈炉镇公所，来到王郁斌面前。沈建业介绍王郁斌和王思亭握过手后，王思亭即将王郁斌绑了起来。王思亭说：“听说老兄是一个好人，由于这是兵家之事，你还得受一点儿委屈。”王郁斌用眼睛向王思亭示意床下还有一位敌人，王思亭将其拉出，原来是曾经攻打前塬的汝颜奎。抓走汝颜奎后，王思亭问王郁斌还有什么话要说。王郁斌说：“敌人已经上钩，从北沟方向正往堡子下运动，你快指挥咱们的人消灭敌人，我将镇丁队全部交给你指挥。”王郁斌是同官地下党员，王思亭是富平支队副支队长，在党组织单线联系的岁月里，他们一直互不相识，所以王思亭才会把王郁斌绑起来。王郁斌亮明身份后，王思亭说：“好吧，咱俩一块儿指挥战斗。”赶快让游击队员给王郁斌把绳子松了，两人一块登上堡子城墙。

王郁斌领着王思亭来到城墙西北角，从高处向下看，只见自：君县长韦孟若骑着马正指挥着宜君自卫团抄小路而上，在城北山坡呈梯形推进。王思亭问王郁斌来的有多少人，王郁斌说约300人。敌强我弱，游击队和陈炉自卫队加在一起还不到100人，先发制人很重要。王思亭果断地说：“不能叫敌人靠近堡子！”拔出手枪大喊一声，“打——”，两名敌人随着他的枪声倒下了。敌人见堡子已被共产党控制，顿时乱了阵脚。堡子上，子弹、手榴弹、砖头雨点般地砸向敌群，打得敌人败退下去。王思亭留少数同志在堡子上继续射击，他带领游击队员出城追击敌人，最终打得敌人落荒而逃。此次战斗，打死敌人7名，缴获步枪60支，机枪6挺，打伤宜君县长韦孟若，俘其坐骑，将韦孟若及宜君自卫团拒于陈炉地区之外。

从此，王郁斌公开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决定率陈炉自卫队及镇公所人员进人路东边区。他将镇公所库存的枪弹连同镇自卫队人员全部交给王思亭带走，独自去军台岭亲戚家，等待党组织派人来联络。

**迎接解放回路东**

1948年3月13日，中共同官县委派罗浩文、段崇文将王郁斌从安科村接到芋园村王宏俊家。王郁斌向县工委领导雷炜汇报了工作。

15日，在雷炜的带领下，王郁斌等陈炉镇的地下共产党员及陈炉自卫队的镇丁们在雷家坡庙集中，进人红土镇冯家塬地区，回到路东工委。王郁斌将在前塬缴获的路东首长的战马亲自交回路东首长手中。

王郁斌到达红土镇冯家塬地区后，路东工委组织路东四县干部及各支队战士，对王郁斌及陈炉镇自卫队回归路东热烈欢迎。张凤岐书记对王郁斌从1937年以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特别对打击国民党宜君县流亡政府及宜君自卫团的果断举动，给予充分肯定。组织将王郁斌安排到路东工委宣传部工作，他又改用教书时的名字王子文。王子文在宣传部工作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种文件，很快熟悉和适应了新工作。

1948年5月4日，同官县人民政府成立。7日，路东工委领导找王子文谈话，决定任命王子文为同官县人民政府秘书，协助新任县长屈计君开展政府工作。在中共同官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王子文搜集敌情，准备粮草，组织担架队，为迎接同官县的解放做准备。11月17日，西北野战军抵达炭庄，准备攻打军台岭守敌。王子文代表同官县政府到炭庄向郭宝山首长汇报战前准备情况。23日，我军攻克铜川军台岭。

1949年4月28日，铜川县全境解放。5月1日起，县政府移驻县城内正式办公，王子文仍任县人民政府秘书。1953年3月，组织派王子文去铜川煤矿工作，先后任铜川矿务局办公室主任、铜川第一煤矿副矿长，负责组织工作。1961年，铜川矿务局派他去筹建铜川煤炭技术学校，任煤技校校长。1988年3月，王子文因病去世，享年77岁。

# 寺坡战斗

寺坡，位于耀县小丘乡(今耀州区小丘镇)北部，耀照公路穿村而过，是北上照金，南去小丘的交通要道。

1947年2月中旬，国民党胡宗南部重兵占领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后，敌主力部队和地方民团开始在淳耀县境内反复进行清乡扫荡，惨无人道地实行“三光”政策，强迫当地群众“移民并村”，建立保甲组织，寺坡沦为游击区。同年下半年，敌人在寺坡的高山上修筑碉堡，以此作为据点，敌保七团二大队八中队和耀县反共自卫队驻守于此。敌人白天到白瓜、照金一带清乡，晚上住在碉楼上。敌保七团中队长马化龙和反共自卫队队长张彦宁，常常带领手下在淳耀县一带为非作歹，边区军民提起这两个人，个个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淳耀县委决定拔掉这两个在边区烧杀抢掠、为害一方的“毒钉”。

淳耀县委书记郭进亭和县长封正宝等人认真谋划，提出三个歼敌方案，经过实地侦察，认为“夜间偷袭，打蛇出洞，途中围歼”的方案最可行。为了实施这个方案，淳耀县保安科副科长张德英联合县警卫队队长朱伯顺等同志，分头进入实地侦察，摸清了敌碉堡附近的地形，依据地理环境，选择独石村以北、寺坡以南的崾峻作为伏击地点。10月7日，张德英等人将侦察到的情况向县委书记郭进亭作了详细汇报。大家一致认为，要取得歼敌的全面胜利，关键在于成功偷袭敌碉堡；反之，“途中围歼”的计划就会落空。很快，淳耀县委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准备调动照金、占虎、柳林区民兵和庙湾游击队，联合淳耀县警卫队共同作战，力争全歼寺坡守敌。

敌人的碉堡建在寺坡最高的山峁上，悬崖丈余宽的壕沟边有梢柴作障，碉堡四周建有四五个小地堡，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做好战斗准备后，10月10日黎明前，我军向寺坡守敌发动进攻。作战命令下达后，县独立营突击队员在连长陈金满的率领下匍匐前进，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山峁上小地堡和碉堡前的哨兵后，以极快的速度接近敌碉堡，将一捆捆手榴弹飞快地扔了进去。“嗵，嗵，嗵……”碉堡里响起山崩地裂般的爆炸声，刹那间火光冲天，正在碉堡内沉睡的敌人被惊醒，顿时乱作一团。守候在碉堡外的我方迫击炮手，在封县长的亲自指挥下，朝着敌碉堡开炮！只听“轰隆”一声，敌碉堡一角被炸飞。民兵游击队仅有的一发炮弹吓得敌人胆颤心惊，马化龙、张彦宁知道民兵游击队没有大炮，分析围攻碉堡的可能是共产党，便下令队伍向小丘撤退。听到撤退的命令，敌兵争先恐后冲出碉堡，仓皇向南逃窜。

东方渐渐泛起鱼肚白。马化龙、张彦宁率众仓皇南逃，不久便进入我军伏击圈。淳耀县警卫队联合占虎、柳林、照金区400多名民兵，在张德英、王建清指挥下，共同开枪射击敌人。暴雨般的子弹嗖嗖射向敌群，惊魂未定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封县长一声令下，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我民兵战士个个奋勇当先，冲向敌人。当地群众听到号声，扛着镢头，拿着长矛，成群结队赶到战斗现场，勇敢地加入了歼敌队伍。被围困的敌人，后有追兵，南有阻击，东边是险崖，便不顾一切地向西奔逃，再次陷入我民兵游击队的包围圈。张彦宁见势不妙，慌乱中带人顺沟逃窜，被我警卫队战士朱耀龙当场击毙。至此，寺坡战斗取得全面胜利。

寺坡一战，张彦宁、马化龙双双被击毙，俘敌69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54支、驳壳枪一支，子弹l万多发，手榴弹200多枚、骡马3匹、面粉300多袋，并摧毁了国民党西爱乡乡公所。此次战斗，淳耀县军民无一伤亡，创造了无伤亡而战绩卓著的模范战例，受到关中军分区传令嘉奖。10月17日，《关中报》刊载了战例通讯，发表了《向淳耀县民兵游击队看齐》的社论，极大地鼓舞了淳耀县军民的斗争士气。

# 游击队长许天洁

许天洁，又名许玉奎，铜川地区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

1908年4月20日，许天洁出生在铜川市印台区刘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他幼年丧母，由父亲拉扯大，7岁时因家贫无钱上学，便给有钱人家当童工，放牛、割草、喂猪、拾柴禾，饱尝生活的酸辛。14岁时，因与东家发生口角，东家动手打他，性格倔强的天洁出手还击，被东家赶出家门，流落县城。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许天洁参加了靖国军。之后，相继参加渭华起义和西北民众讨逆军，两次参加国民革命军，两当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后，许天洁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来到中共关中地委所在地——马栏。

**受命回同打游击**

1946年，国民党胡宗南部开始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延安。为了牵制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关中地委和关中军分区于9月初派王方民率武工队，进人同官、富平交界的山区，开辟富同游击区。9月下旬的一天，省工委书记赵伯平和关中军分区司令员高锦纯找许天洁谈话，向他传达了省工委成立富同游击队第二支队的决定，任命许天洁为二支队队长，周有才任副队长，雷振东任政委，梁琪任副政委，从司令部一团一连调一个班，作为富同游击队二支队的骨干。同时，还从关中地委抽调习仲杰、芦立军等五名干部，以充实和加强富同游击队第二支队的领导队伍。许天洁积极地接受了组织分配的任务，经过几天紧张筹备，1946年9月底，他带领队伍从马栏出发，奔赴富同山区。

一天夜里，许天洁率领富同游击队二支队20多人，从耀县柏树塬出发，经石柱镇，顺利穿过敌人封锁线，来到咸榆公路边。只见此处敌人戒备森严，五步一哨，十步一岗，探照灯架在高山上。许天洁带领队伍隐蔽在路旁的树林里观察敌情，寻找突破口。很快，他们发现公路弯道处敌人数量较少，又不易被探照灯发现，于是利用黑夜掩护，摸掉弯道处敌人岗哨，越过咸榆公路，顺利到达同官县陈炉镇石庙梁。在石庙梁，许天洁找到地下党员温志谦，通过他迅速与富同游击队一支队王方民、惠璋杰取得联络。两支游击队以陈炉上店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建设暗边区，并利用我党地下党员在陈炉镇及陈炉各保的合法关系，发展“两面政权”。

10月，中共富同工作委员会成立。在富同工委的领导下，富同游击队一、二支队联合行动，先后歼灭陈炉东河川一带顺兴沟、祁家沟等四个煤矿的联合矿警队，消灭了欺压矿工的反动势力，摧毁了同官红土镇公所，在瓦渣岭收编了杨葆、宁章林所领导的农民自发武装，发展壮大了游击队。在陈炉地下党人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富同游击队相继在陈炉镇、陈炉一保、二保及富平县赵老峪等地建起“两面政权”，与陈炉10多名开明人士建立了统战关系，基本上控制了富同交界沿山一带地区。富同游击队二支队不断壮大，发展到60多人。11月中旬，富同游击队奉命回到边区整训。

**深入敌后牵制敌**

1947年2月，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边区军民全力以赴投人保卫边区的战斗中。2月19日，马栏失守，许天洁和王方民率富同游击支队突围出来，穿过咸榆公路封锁线，返回同官红土肖家堡，在陈炉上店、金锁关一带开展游击战。根据陕工委2月1 8日《关于富同游击队活动方针》的指示精神，许天洁带领34名游击队员，分头发动群众，积极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同时开展以农民为基础的武装斗争，进行统战工作，破坏敌人后方物资供应，牵制敌人向延安进攻。

3月，陕工委根据咸榆公路和咸铜铁路敌人重兵把守的实际情况，为了使咸榆公路以东的富平、同官、蒲城、白水等地的游击队能够有组织地独立开展工作，决定成立中共路东工委，主要负责富平、同官、蒲城、白水四县工作。许天洁领导的富同游击队二支队被改编为同官支队。不久，路东纵队成立，许天洁任路东纵队第二支队队长。敌人经常清乡，许天洁和雷炜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先后建立了以王郁斌、罗聚瑞两名地下党员为首的陈炉镇公所；以地下党员王宏俊为首的陈炉一保；以刘天升为首的陈炉二保；以地下党员韦树善为首的黄堡镇公所；以左新荣为首的红土镇公所等“两面政权”。在这些“两面政权”的掩护下，同官支队“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住我扰”，将游击斗争搞得有声有色。其中，著名战斗有二：

**二十里铺截车** 1947年6月30日，时值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各种军用物资经咸榆公路源源北运。为了打击敌人，许天洁提出“向党的生日献礼”的口号，组织路东纵队同官支队和富平支队40多人，夜行军40多里，于拂晓前埋伏在铜川二十里铺山沟，十多名游击队员化装成国民党军在公路上盘查行人，将一辆马车借来横挡在公路中间。早晨七八点钟左右，敌人的一辆军用汽车由南向北开来，许天洁和化装的游击队员们装作挪车让路的样子，只挪车不让道。敌人看马车无马，而且是重车，几个士兵用人力挪车一时难以挪开，便减速将汽车停在靠近马车的地方。看到时机已到，许天洁一声令下，游击队员突然将枪口对准押车的敌军，埋伏在山沟的队员们飞快地冲了出来，迫使敌人乖乖地缴了枪。此次战斗，游击队俘虏敌人一名排长和一个班，缴获手枪和卡宾枪各一支，步枪8支，面粉7袋。

**杏花村送饭**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警备营长带领二三百名士兵，住在红土附近杏花村外山上的娘娘庙中，要求杏花村的群众为其送饭。许天洁闻讯后，感到歼敌的机会来了，便同富平游击队领导商量，决定富同游击队联合行动，趁送早饭的机会歼灭这股敌人，他担任行动总指挥。第二天拂晓，许天洁命令同官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神速包围娘娘庙，自己则和部分游击队员化装成老百姓，将枪和手榴弹装在送饭的挑子中，同群众一块儿担着饭送往山上。国民党士兵看到早饭来了，各自忙着抢饭吃。见此情形，许天洁一声命令，游击队员和群众立即行动，将敌人的枪械全部缴获。敌营长黄楚山见势不妙，拔腿逃脱。

**支前建政迎解放**

1948年5月，同官县成立，建立了两个游击区，共有游击队员54人，共产党员136人。许天洁率同官支队一边保护县委、县政府和区、乡政府的安全，一边扩大游击区范围。同时，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动出击，组织支前，担任向导。著名战斗有“西刘村收枪”和“庞家河伏击”。

**西刘村收枪**  1948年秋，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军节节败退。宜君县解放后，国民党铜川县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派流落到铜川的宜君县保警队一个中队驻在西刘村。班长刘金满想弃暗投明，找到地下党员田玉祥，要求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将这个中队收拾掉。当时，同官县委、县人民政府及同官县支队驻在冯家塬，得到情报后，许天洁同县委书记雷炜、县长屈计君及吴守清、刘涛等主要领导研究决定，派许天洁率县支队前往西刘村收枪。许天洁率70多名队员夜间出发，半夜抵达西刘村，派一个班扼守通往西刘村的道路，其余人员包围了保警队。刘金满刚一撤哨，许天洁即鸣枪喊话，将敌人全部缴械，生俘78人，缴获一部西门子电话，敌中队长杨某逃至土桥后被抓获。

**庞家河伏击** 1948年秋，敌人一个营驻扎在红土镇，设碉筑堡，封锁边区。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同官支队的频频出击，敌人缩回据点不敢出外。一天晚上，许天洁带领同官支队埋伏在庞家河玉米地中，派出几名队员在敌人据点周围佯攻，枪声密集，喊声不断。敌军以为被解放军包围，忙打电话要求增援。敌人上级用电话命令这个营突围回县城。敌营长立即率部从红士突围。出了红土镇，敌营长只顾骑马在前边奔命，与其部队拉开很远距离，同官支队在庞家河将其活捉。因其耍赖不走，想等后边来的大部队解救，被同官支队队员宁章林就地处决。

11月，同官支队(亦称路东纵队第二支队)改为同官县大队，许天洁任副大队长。1 1月20日，许天洁带同官县大队协助西北野战军一、四纵队3个团，参加了围歼同官军台岭守敌的战斗。在他的精心组织下，经过周密安排，在战前战中共派出23名队员担任向导，协助县委、县政府组织担架62副，运输骡马96匹，准备粮食9.36万斤，并负责红土北神村伤员临时接待站的警卫护送、接转伤员工作。

1949年2月19日，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同官县国民党军撤至临潼。许天洁率同官县大队护送县委、县人民政府进城办公。同日，任同官县城防警备司令，率县大队在雷家沟口接收同官县国民党自卫团投诚起义人员114人。接着，开始肃匪反霸工作，巩固人民政权。3月15日，敌人由南北上，攻克县城。许天洁护送县委、县政府转移到红土地区。4月27日，人民解放军重新收复同官县城。5月1日，许天洁率县大队护送县委、县政府由红土镇南村堡人城。至此，同官全境解放。在同官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许天沽率县大队开始进行全面肃反，为巩固人民政权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3月，铜川县大队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团，许天洁任团长，随部队到三原军分区工作。1952年，转业到河南省洛阳市轴承厂工作，任房产园林科科长。1958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民政府任副秘书长。1962年，调回陕西，任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1963年9月，任临潼县政协副主席。1965年，任蒲城县政协副主席。“文革”结束后，1980年继任蒲城县政协副主席。1985年12月离职休养。1992年1月19日，许天洁病故，享年84岁。

# 献身革命 英年遇难的强自刚

强自刚，1914年生，宜君县偏桥乡西云阳村人。

强自刚是宜君县马列主义最早传播者强自修的胞弟。30年代初，强自修在宜君县立高小任教时，把小弟自刚接来县城，与自己同吃同住，一边教他学文化，一边给他传授进步思想，使他从小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立志要做一个革命者。

1937年，强自刚在家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 938年底，与同村青年共产党员刘树林相约，沿着哥哥当年走过的路，一起奔赴向往已久的陕北边区，进人边区党校学习。强自刚文化程度不高，但学习刻苦认真，提高很快，深受老师和学员的赞赏。学习期满毕业时，组织征求强自刚的意见，问他愿意留在边区工作还是愿意去白区(敌占区)工作，强自刚毅然选择了到危险的白区工作。

1947年，中共黄龙特委派干部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当时，雁门支队同富大队第八中队指导员一时没有合适人选。黄龙特委书记强自修想到弟弟强自刚，提出让他来担任八中队指导员。强自修的想法一提出来，即遭到黄龙特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强烈反对。大家都知道，强白刚患有严重的脱肛病，敌后工作环境艰苦，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一向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强自修坚持个人意见，一定要让弟弟带病去工作。会后，强自修把弟弟叫到办公室，先仔细询问过他的病情，然后才严肃地对他说：“自刚，现在形势很紧，党需要你，我代表党组织派你去雁门支队同富大队八中队工作，明天就带队出发，你有什么意见？”强自刚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当即表态说：“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决不给大哥丢脸。”

第二天，强自刚准备妥当后，向大嫂和爱人辞行，带领部队开往敌后。从此，他带领游击队经常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水、宜君、黄陵和同官等县。在困难的环境中，强自刚从不考虑个人安危，总是身先士卒，勇敢地与敌人做斗争，想方设法消灭敌人。这一时期，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游击队经常在敌人的包围中跳跃。有一次，在旬邑窑依山上，游击队突遭敌人包围。危急时刻，强自刚带领战士们英勇杀敌，冲出一条血路，成功突围。强自刚临危不惧、勇敢杀敌的战斗精神令同志们佩服不已。由于敌保安队和胡宗南正规军经常进行“清剿”，战士们要不停打仗并随时转移，夜间多在野外露宿，生活异常艰苦，常常一天吃不上饭，频繁的战事和艰苦的生活，使强自刚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和有效的治疗，病情越来越重。尽管如此，他仍强忍身体的病痛，努力装出一副健康的样子，坚持带病工作。

1948年元月，宜君、黄陵、同官等县的敌人倾巢出动，“进剿”雁门支队，游击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29日，强自刚带领八中队转移到新正县马栏区的史家窑子村时，一些刚起义过来的人发生动摇，于当夜1 l点左右持枪叛变，将强自刚和队长惠忠义等5人杀害。强自刚牺牲时年仅34岁。

1983年，强自刚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 出生入死 慷慨就义的杨植

杨植，又名文昆，1915年生，宜君县西村乡石堡村人。

少年时代的杨植奋发上进，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宜君县立高小。1936年春，杨植赴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中共关中地委宣传部工作，后任关中地委组织部人事科长、赤水县委宣传部长、淳化县委组织部长、淳耀县委书记、关中分区民政科长等职。

1936年8月，中共陕甘工委派杨植回到宜君，协助中共红宜县委做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县委研究决定，王清廉书记和组织部长冯茂清做中宜游击大队第十分队队长赵世杰的工作，杨植做县保安队队长郭有让的工作。在争取、说服赵、郭两人期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赵、郭两人看到国内时局变化，思想转变，表示立即组织起义，参加抗日。赵、郭两人领导部队起义成功后，杨植、王清廉和杨西林三人立即前往甘泉县高家哨向陕甘工委汇报起义情况。在路过洛川交口河时，杨植三人被杨虎城十七路军属部抓住，后经驻防洛川的红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交涉，才得以释放。临走前，十七路军挽留杨植三人，说：“接杨主任(虎城)命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你们如果愿意就在这里干吧！被杨植三人一口回绝。脱离险境后，杨植三人来到甘泉县高家哨，将宜君情况详细汇报给陕甘工委。不久，陕甘工委派王占彪来宜君，对赵、郭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将其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独立第三团。

1938年，杨植与王心箴结婚后调到淳耀县委工作，任县委副书记，负责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封锁线，到白区开展工作，极少和妻子在一起。1940年，王心箴难产病故，杨植因为工作原因没能陪在她身边。为纪念死去的妻子，杨植给孩子起名杨鲁民(鲁为山东省简称，王心箴是山东人)。

为了革命，杨植没能照料好妻子，也顾不上照管孩子。胡宗南率部进犯边区时，经常进行扫荡，杨植忙着打仗，小鲁民只好跟着乡亲们东躲西藏。有一次，小鲁民进村找水喝，不幸被敌人抓到村头一个院子里。小鲁民看到院子里有好多抓来的老乡，便哭着抱住熟识的王奶奶要水喝。王奶奶赶忙捂住小鲁民的嘴，悄悄告诉他不要出声。敌

人的刺刀对准了小鲁民，吓唬他：“你是不是杨专员的娃？”王奶奶抢着回答：“这是我孙子，他叫哑巴。”敌人转身又用枪逼问旁边一个被打伤的老乡，威吓他：“杨植在哪里？快说！”这个老乡不开口，被凶狠的敌人一枪打死。最终，不管敌人怎样威胁恐吓，乡亲们都没有出卖杨植和小鲁民。

1947年春，杨植支前路过马栏石底子村，正在群众家吃饭时，不幸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后送往西安，关押在劳动营。在狱中，杨植受尽了种种酷刑的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秘密。不仅如此，杨植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策动和组织监狱政治犯准备暴动越狱。哥哥杨文俊和同乡杨智源来监狱探望杨植，他本可以乘机逃跑，但考虑到狱中战友的生命安危，考虑到正在酝酿的越狱计划的实施，送走兄长后，杨植毅然返回监狱，继续带领战友开展狱中斗争。

1948年，在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最后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由于叛徒告密，杨植被敌人活埋于西安市城郊甘家寨，年仅33岁。

1983年，杨植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 药王山惨案

1948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十三日)凌晨2时许，寒风阵阵，月光惨淡，影影绰绰中，男男女女的一长串人被绳索捆绑串连着，他们嘴里塞着烂毛巾、破棉絮，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押解着，向一个大坑走去。

在坑边不远处，一群手持十字镐、铁锹、棍棒的人凶神恶煞地盯着这群遍体鳞伤捆绑串连着的人。待这些人全部走到了坑边，只听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压抑然而狠毒地喊了一声：“行刑！”手持十字镐、铁锹、棍棒的那群人恶狼般地扑过来，猛击站在坑边的人的头部。刹时，这些人头部热血喷涌、脑浆溢流，纷纷倒卧在大坑之中。在倒下的瞬间，有人还奋力吐出口中填塞的烂毛巾、破棉絮，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混乱之后，一切归于宁静。还是那个军官模样的人，又喊了声：“埋！”一片铁锹碰撞声过后，埋人的大坑归于平整，惨淡的月光映照着新鲜的黄土……

——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1944年，我西北社会部(即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陕甘宁边区南线建立了由边区保安处情报科直辖的两个情报站，即富县茶坊情报站(于桑负责)和关中分区辖区内的耀县柳林情报站(杨锋负责)，其主要任务是向国统区派遣情报干部。发展情报人员，开展情报工作。1945年5月，刘伍受边区保安处指派来到关中，先后在西安、临潼、华县等地进行秘密活动并和同学鲁宗周、张蓬(又名张智仁，后叛变，被处决)、朱鉴等人秘密联络，宣传革命思想，以唤醒民众开展对敌斗争。10月底，刘伍又联络其他几位地下工作者以教书为掩护，扩女活动范围，秘密组织地下武装。12月下旬，刘伍先后联络了关中地区临潼、长安、户县、泾阳、富平、宝鸡、渭南、华县、咸阳以及商县等十几个县的地下党员、革命群众和进步人士。于1946年上半年在西安建立了秘密地下武装组织——西北人民自救军，发展成员近百名。这个武装组织在杨锋的领导下，经常与边区保安处柳林情报站取得联系，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

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l947年1月，西北人民自救军设在西安韩森寨一带的秘密据点遭敌破坏。一批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被捕，这对西安、临潼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其他同志造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相机而动”的角度出发，将刘伍等同志调回陕北。经过一段休养调整后，刘伍等同志又被派回关中，在白家河一带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1947年5月初，更为不幸的事发生了。西北人民自救军主要领导成员张蓬贪生怕死，从华县跑到国民党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张文发家中叛变投敌，并向敌人供出了我党地下武装西北人民自救军的全部情况，提供了西北人民自救军的人员名单，绘制了自救军部分人员的住址分布图。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保安司令祝绍周即刻指令由警察总局局长萧熘文和机要秘书赵成义、特高组组长刘剑英三人组成专门法庭，下令特高组便衣队等在各地警察局配合下，对刘伍及关中地区中共地下党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武装逮捕。

张蓬叛变的第二天，敌特杜友三、王西宾等十余人带着地图和名单，伙同华县警察局，兵分两路，包围了华县白家河一带的几个村庄和工厂，在此刘伍被捕。随后，杨锋(田振英)、赛坚(女)、田振玺(杨丰)、尤生福、刘文彬等人相继在西安被捕，陈克勤在商县被捕，朱鉴、胡文选、吉忠义在兴平被捕，王喜堂、高子时等人在西安技艺师范学校被捕，还有许多我地下党人和地下工作者先后在各地被捕人狱。

1947年7月16日，敌人依据叛徒15供，将临潼县内所属西北人民自救军全部成员汇集成册，令国民党临潼县政府进行搜捕。10月15日，国民党临潼县侦缉组组长杨彦杰带匪徒在灰复道村将姚名德逮捕。至此，西北人民自救军整个组织遭到破坏，所有成员几乎全部被逮捕关押。

1947年夏，国民党西安市党部主委陈建中，政学系陕西代表刘治州等，联络于右仁先生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极力控告祝绍周。祝绍周气急败坏，便以对共产党人及革命人士的严酷迫害来向其主子邀功请赏。加之，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失利，陈赓、孔从周两将军由豫西渡河，有叩陕西大门之势。南京政府狗急跳墙，于1947年10月6日电令祝绍周速将杜斌丞一案数人处死。祝绍周接到电令后，遂将刘伍、杨锋等也列入处死之列。在祝绍周的授意下，为避免外人非议，乃以“陕西省绥靖总司令部”的名义，将杜斌丞、刘伍、杨锋等12人诬加以“勾结共匪贩卖毒品，谋图暴动”的罪名公开枪杀于西安玉祥门外。

1948年4月，祝绍周、戴桂茂、萧熠文之流，预感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加快了对在押政治犯的处理。决定将赛坚、武梦名、胡文选、梁文耀、吉忠义、高子时、党娃(又名党刚娃)、刘文彬、李志民、张印玺、宋佩荣、吴利岑、米忠全、刘文馨、任秉章、任秉公、陈范珍、孟宪庭、冯智礼、李世成、姚名德、陈克勤、王喜堂、王志成、张炳南、程晓光、张同连、张克、尤生福、朱子祥，还有长安县韩××和王××共32名地下党员、地下工作者和进步青年秘密处死。

4月13日，耀县国民党保安三团团长朱辅元被电召西安，参与密谋策划残杀革命志士的罪恶部署。14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戴桂茂、警察局局长萧炤文、朱辅元等人经过精心策划，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4月19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将32名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以扩充兵员之名，由保四旅沈峰仙排押解到西安火车西站军事站台，登上北去铜川的列车，当日下午6时许到达耀县。晚间，耀县保三团团长朱辅元、副团长董传书，一营营长张席珍、二营营长杨殿猷等召开紧急会议，朱辅元传达了祝绍周的指令，确定了残杀革命者的具体地点、时间及方法，并确定由副团长董传书监视执行，二营长杨殿猷主办。接着，又召集各连连长开会，布置任务，明确了分工。

4月20日，黑云笼罩着耀县城，耀县国民党保安三团真枪实弹，岗哨密布，一片白色恐怖。匪徒们在药王山下以挖修机枪掩体为名，挖下了活埋我32名革命志士的罪恶深坑。

接下来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惨无人寰的一幕……

4月22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兵隐蔽了现场。尔后，朱辅元按照祝绍周旨意，编造了一套部队在耀县和共军发生遭遇战，战斗中被打死一批、跑了一批的假情况，以蒙骗人民群众，逃避社会舆论，掩盖他们残害革命志士的罪行。

烈士们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满腔热血和宝贵生命，有的却连自己的姓名都未留下。1954年5月1日，中共耀县县委、耀县人民政府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遗志，为32烈士修建陵园，立碑建亭。198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为陵园题词。纪念碑上刻着当时仅考证的19人名单。1981年清明节前，耀县人民政府又重建了陵园。从此，每年清明前后，铜川地区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以及青少年学生都要前来祭扫烈士陵墓，缅怀先烈，接受传统教育。

全国解放后，药王山惨案首犯戴桂茂于1951年在西安被我司法机关处以死刑。主犯朱辅元，解放初曾在兰州军管会集训审查，由于他隐瞒了自己的罪恶历史，骗得释放，曾用化名朱文玉、朱玉田等先后流窜于西宁、长春、抚顺等地。1958年5月13日，在抚顺市望花区古城街66号被我当地公安机关拘捕。1960年5月22日，经铜川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祭奠了烈士的英灵。

# 军台岭之战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了，蒋介石预感不妙，急电西北胡宗南部抽兵驰援中原。为配合淮海战役，牵制国民党胡宗南部增援中原战场，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总司令的指挥下，从11月15日起，向集中在渭北的胡宗南主力发起猛烈进攻，继荔北战役后，又发动了蒲、富、铜、耀战役。

西北野战军四纵十二旅和一纵独一旅(二师)奉命攻打铜川军台岭。军台岭海拔1339．9米，四面低凹，三面临沟，东面陡壁，居四周群山之顶峰，为铜川东南之屏障，也是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控制陇海铁路咸铜支线的重要据点。军台岭守军为国民党暂二旅(二五四师)七六二团一营、二营和迫击炮排，约500人，由一名副团长指挥。七六二团团部和三营驻守店子坡以备增援。国民党守军利用岭上突出的山头拼成三个碉堡群，共有大小碉堡39个。其主峰一号阵地周围修成丈余高的峭壁，凡易接近之处都挖有丈余宽的深壕。阵地与阵地、地堡与地堡之间，均以网状交通壕贯通。其防御前沿设有铁丝网，并埋有800余颗地雷。

11月18日晚，西北野战军先头部队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冒雨向军台岭进发。部队走到军台岭东边一个山峁上时，营长李志义询问老乡：“这里离军台岭还有多少路？”老乡回答：“不远了，从这里上去不到半里路。”李营长和老乡的交谈声惊动了敌哨兵。只听“叭！叭！”两声枪响，一位老乡应声倒地。李营长情急中扑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倒地的老乡，哪知另外一位老乡也被击中。见此情形，我军立即向敌人还击，迅速冲过军台岭山口，在岭西的山坡上隐蔽起来。雨越下越大。战士们的衣服全淋湿了，但他们毅然趴在冰冷的山坡上，密切监视着军台岭守敌的一举一动，直到19日傍晚，兄弟部队赶来，他们才转移到军台岭附近的高俭村吃饭休息。

11月19日，四纵十二旅开始围困军台岭守敌。在围困敌人的三天三夜里，白天，战士们隐蔽在灌木丛中，饿了，啃几口冰冷的干粮；渴了，吞一口地上的积雪。夜里，战士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守在阵地上，腿脚冻麻了、冻肿了，但大家谁也不叫苦，个个严阵以待。23日凌晨，一纵独一旅冒雨向军台岭开进。是日17时，独一旅一团、三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不顾敌人三面火力的严密封锁，迅速排除地雷，开辟进攻道路，仅10分钟就突破敌前沿阵地。17时15分，两个团向二号阵地发起进攻，担任主攻的是三团一营三连。敌人居高临下，猛烈的火力压得我军难以抬头。战士们一边回击着山上的敌人，一边勇敢地向上冲锋。山坡上的雪很厚，积雪掩埋了标识地雷的记号，我军冲在前面的战士不小心踩到敌人埋下的地雷上，不幸倒在血泊中。幸亏，炮兵及时赶到，向敌人前沿阵地集中发射炮弹，引爆一连串敌人埋下的地雷，为部队进攻扫清了障碍。由于第一次爆破铁丝网没有成功，班长李五经抱起十几颗手榴弹再次冲向铁丝网，突破后，部队很快消灭了二号阵地之敌。在攻打三号阵地时，一团二营从正面攻击，一营则绕至侧后，前后夹击，在纵横交错的地堡群中穿插歼敌。当二、三号阵地均被攻克后，两团会合，即向一号阵地发起总攻，以山炮猛烈轰击敌碉堡群，激战于11月23日18时结束。

军台岭一战，我军全歼守敌两个营，一个迫击炮排，毙敌150人，俘敌副团长以下官兵316人，缴获迫击炮8门，轻重机枪30挺，冲锋枪、步枪l 84支，子弹6万余发，电台一部。不仅对配合整个西北冬季战役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为解放铜川奠定了基础。

# 宜君人民支前故事

1948年3月，宜君县全境解放。宜君解放的时候，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广大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是先一步解放了的宜君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边才敲罢欢庆解放的锣鼓，那边宜君人民一转身又投入到拥军支前的新战斗中。在拥军支前的许多个激动人心的故事里，宜君担架队的事迹广为流传。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西北野战军(1949年2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关中，展开大规模战略反攻。为了支援解放军作战，宜君县迅速组建了一支三百余人的担架队，在城关区委书记刘儒珍的带领下，随一野六军转战关中大地，前后九个月，参加了解放东府、西安、扶眉等战役的救援工作，从前线向后方转运伤病员480名。

刘儒珍在担架队显示了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他处处带头，关心同志，乐于助人。行军途中，常常替炊事员挑炊具，把自己的马让给体弱有病的队员骑。在他的影响下，担架队员们团结互助，争做好事，每到一个地方，总是给老百姓干这干那，忙个不停。1948年冬，担架队在黄龙山休整，队员们给当地群众担土、出圈、编筐、铡草，做了许多好事，受到群众一致好评。担架队离开时，老乡们设酒招待队员，燃放鞭炮为他们送行，许多群众眼含热泪，拉住队员的手舍不得让他们走。担架队转运伤员，路程近则一二十公里，远则七八十公里。转运途中，担架队员对解放军伤病员无微不至地照顾，情同手足。有的重伤员病情严重，行动不便，担架队员便主动承担起照顾他们生活的责任，一口一口地给其喂饭喂水，帮助解大小便，还千方百计满足他们的一些特殊需要，很多担架队员用自己攒下的钱给伤员买鸡蛋、白糖补身子，使伤员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担架队十分重视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常常利用战斗间隙和休整机会，对队员们进行政治教育、时事教育和担架救护常识教育。通过学习，担架队员人人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城守则》，组织纪律观念特别强，随军转战的蚧月里，队员无一人请假回家，更无人掉队脱逃，躲避火线。

支前也是战斗，解放军冲到哪里，担架队跟着冲到哪里，随时从火线上抬伤员，争分夺秒地把伤员送往后方医院抢救。在炮火硝烟和枪林弹雨中抬担架，难免不伤亡。在大荔战斗和扶眉战役中，两名担架队员为抢救伤员而光荣牺牲。刘儒珍含着泪水对大家说：“同志们，革命总会有牺牲，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以烈士为榜样，不怕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抢救出每一个解放军伤员，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就这样，担架队员们擦去眼泪，冒着战场上密集的炮火，一次又一次地冲上火线抢救伤员。担架队员们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赢得野战部队的高度赞扬。

担架队同时又是战斗队。1949年8月中旬，担架队光荣完成支前任务载誉而归的途中，行至武功火车站北边，接到群众报信，前方西沟塔村有一伙敌兵在抢劫百姓的东西。刘儒珍问明情况，判断这可能是一小股被解放军打散的敌人逃兵在胡作非为，当机立断，指挥担架队冲了上去。刘儒珍和通讯员郝照才持枪抢先奔到村口，将正要出村的敌军官刘空义缴械擒获。其他队员拿着刀棍和枪械，随后冲进村子，一片喊杀声中，敌人四处逃命，没跑掉的人全部缴枪投降。这一仗，担架队俘敌9名，缴获驳壳枪、马登式枪和手枪共11支，受到武功车站驻军留守处和地方党组织的表扬。

刘儒珍率领宜君一期担架队在前方屡建功绩时，由宜君西区区长东云(张耀斌)同志率领的宜君二期担架队352人，又于1949年6月11日奔赴前线。二期担架队跟随一野三军，历时五个多月，先后参加了解放淳化、扶风，兰州、固观和关山五场战斗，圆满完成随军支前任务。

宜君担架队在拥军支前中成绩卓著，受到人民解放军的向度赞扬。一野六军奖励刘儒珍担架队“支前模范”、“铁肩支前，锦旗两面，并赠步枪32支，子弹340发；一野三军奖励东云担架队“支前称英雄”、“生产做模范”锦旗两面，步枪60支，机枪两挺，子弹6l 5发，以及骡子、药品等物资。一野六军政治部给中共宜君县委书记杨西林、县长孟树林来信中说：“贵县这次动员服务本军之常备担架大队光荣地完成了任务，真为模范。特别是刘大队长领导积极负责，全体队员吃苦，服从指挥，克服困难，全心全意为人民解放军伤员服务，真值得本军学习。因此，除奖励担架队外，特发函贵县，望转全体人民学习为盼。

拥军支前，是宜君人民的一段光荣历史，仅一期担架队中，就有102人被评为模范队员，8人光荣入党。白儒坤、郝照君等青年经过担架队的锻炼，回县后挑起了区乡领导重担；有的担架队员直接在前线参了军，如部队作家王德明。

# 墓坳阻击战

每当人们从铜川新区北上柳林，路经墓坳原畔，看到一座座隆起的坟墓，便不由追忆起从先辈那里听来的墓坳阻击战的故事。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的领导下，向盘踞在关中的胡宗南军队发起强大的春季攻势。3月初，胡宗南纠集11个师的兵力，在青海马步芳八十二军的配合下向渭北反扑。马步芳八十二军二四八师在师长马德胜的指挥下进入陕西，在连占淳化县城、铁王镇(属淳化)、凤凰山等地之后，又向第一野战军主力集结地耀县柳林南原疯狂扑来。3月11日，一野四军十师奉命在耀县墓坳一带，阻击敌军：二十九团集结于墓坳以南的项牛、吕村一带；二十八团集结于南村，向淳化方向警戒；三十团隐蔽于高山槐一带；师部驻墓坳西村。

3月11日零时，马部骑兵二四八师共4个团从淳化出发，拂晓到达后，企图抢占战略要地高山槐。高山槐战斗首先打响了。马德胜二四八师是马步芳的先头部队，善用骑兵远程奔袭，集团冲锋，战斗力极强。两军交火后，马德胜便命令骑兵以快制胜，企图抢占高山槐。野战军三十团先放过敌骑兵前锋，随即向敌骑兵尾部猛烈射击，敌人被冲散，首尾不能兼顾。三营战士迅速占领山头，以猛烈火力压制敌骑兵的进攻，只见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向敌群，嗵嗵的爆炸声里敌兵人仰马翻。敌人的几次冲锋，都被我军打退。

紧接着，马部骑兵又向南村野战军二十八团一营阵地发起冲锋。敌人利用南村一带的平坦地势，以骑兵进行整营整团的轮番冲锋。一营战士早就做好防御准备，在阵地前及其两翼布置了严密的火力网，只等敌人前来。当敌人骑兵冲入我军阵地后，一营战士的排子枪、排子炮一齐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惊慌逃窜。之后，敌人遂转向项牛村，向野战军二十九团三营阵地发起攻击。双方激战四个小时，三营战士浴血奋战，连续打退马部骑兵五次冲锋，伤亡惨重。战至午后2时，二十九团开始向有利地势撤退，马部乘机集中大批骑兵，突破阵地防线，直扑墓坳西村我军指挥部，被我军击退。此间，二十九团炮兵连长强兴发发现墓坳村边的土围子里，几个敌军官拿着望远镜不停地东张西望，便命令炮兵朝土围子方向开炮。土围子里驻着国民党二四八师指挥部，师长马德胜被我方炮弹击中，当场毙命，师参谋长被炸成重伤。敌军群龙元首，顿时乱作一团，攻势锐减。我军趁机全线反击，将马部压到中底、吕村一带。是日夜，我军集中兵力分割

包围，全歼马部3个连，敌军残部向耀县方向溃逃。

墓坳阻击战共毙、伤敌军千余人，获战马500多匹。因敌军有骑兵优势，凶悍善战，敌我交锋，战况激烈，我军不少战士壮烈牺牲。后来，人们在道东、中吕两村之间建立墓碑一座，上刻“烈士之墓”，以缅怀在墓坳阻击战中牺牲的先烈。

# 解放铜川

铜川市现辖区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分设为宜君县、同官县和耀县3个县。铜川的解放时间比全国解放日1949年10月1日早一些，这是由于铜川地处陕甘宁边区之缘故。铜川的解放由北向南推进，实际上是宜君、同官、耀县3个县城及其主要乡镇的解放(其它区域已是解放区或半解放区)。除宜君外，同官、耀县的解放先后经历了两次。

1948年2月下旬至3月初，西北野战军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后，根据彭德怀总司令的战略意图，又不失时机地组织了黄龙山麓战役，并决定夺取宜君县城，控制咸榆公路。

3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率领第一、四纵队进驻宜君县五里镇和雷塬一带，待机攻打县城。雁门游击支队第一大队副政委刘斌汉带领部分战士到南区一带侦察敌情，配合部队行动。3月9日，第一纵队从城北面进攻，四纵队从榆五川、孟埔塬一带经牛家庄绕到县城东南面进攻，并派部分兵力绕到城南咸榆公路上，堵死敌人的南逃之路。3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吓坏了国民党宜君县当局，3月10日凌晨3时许，国民党宜君县长韦孟若带县政府工作人员和部分地方武装人员从西北方向弃城而逃。拂晓，警三旅五团控制了城南制高点，第一纵队炸开北门攻人县城，宜君全境解放。

1949年1月，西北战场的国民党胡宗南部被迫转入战略退却，原分守同官、蒲城、大荔地区的第十二、二十、二十八、三十师和陕西保安第四旅等主力集结于耀县、富平、三原等地准备逃跑。为打乱敌军的退却部署，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春季战役，命令第四军向同官、耀县之敌进攻，以扩大渭北新解放区。

2月18日，一野四军取道宜君、哭泉，分路向同官、耀县讲军。

19日上午，第十一师进至同官外围，兵临城下。20日凌晨，国民党同官驻军和县政府官员仓皇向耀县方向逃窜，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同官县城，首次解放了同官。铜川县民众自卫团副团长郭清廉率两个中队，携武器向陕甘宁边区同官县政府投诚。一野四军十师在配合十一师攻占同官后，继续南下追击逃敌，共击毙、伤、俘国民党军第二十师531人，于20日当天又解放了耀县城。

铜川的解放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国民党《建国日报》连发三次社论，认为“铜(川)耀(县)为关中北面之屏障，又为西安用煤主要产源……铜耀失守，不仅关中感受威胁，人心震惊，而西安煤源顿告断绝。”陕西省参议会电请胡宗南出重兵收复铜耀。

1949年3月，为了挽救在西北战场的败局，胡宗南纠集国民党军第一、三十八、六十五、六十九、九十军共11个师的兵力，勾结青海马步芳部向渭北猖狂反扑，第一野战军主动后撤。3月12日，国民党军侵占耀县城。16日，侵占同官县城。陕甘宁边区同官县政府和县大队暂撤至红土一带。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一野战军发起了解放关中的陕中战役，从北向南挺进。陕中战役前夕，胡宗南把驻守铜川的九十军等主力部队南撤到三原、咸阳一带，妄图保住西安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第一野战军四军趁机追歼敌人，4月27日，一野四军在同官县游击大队的配合下向同官开进，28日再次解放同官县，并于同日再次解放耀县城。至此，铜川全境解放。

在解放铜川的过程中，铜川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选派地下党员深入敌人内部，以合法身份为掩护，争取更多的人站到革命队列中来；建立“两面政权”，为党组织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开展地下交通工作，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进出边区的人员，促进了铜川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地下党组织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领导雁门游击队、同官县大队、耀县游击队，在人民解放军解放铜川的过程中，广泛开展游击战，搜集情报，侦察敌情，担任向导，运送物资，救助伤员，积极支援、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多次战斗。在铜川大地上，较大的军事战斗有奇袭耀县城、攻打同官军台岭和墓坳阻击战等，有力地打击了铜川地区的国民党军和反动政权，为最后解放铜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铜川解放后，铜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铜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跨人了新的历史时期。

# 智取华山战斗英雄路德才

电影《智取华山》中，我军7人组成的侦察班，由侦察参谋刘吉尧和侦察班长路德亮带队，在当地农民王银生的引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从人迹罕至的华山北峰东南悬崖峭壁上，另辟蹊径，攀登上山，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盘踞在华山北峰顶上的国民党残军鼻子底下，出其不意地占领了北峰，为我军大部队上山开通了道路，华山歼敌战斗取得胜利。电影中路德亮的原型就是1949年6月智取华山中的侦察班战斗英雄——今铜川市印台区广阳镇西固村人路德才。

1917年，路德才出生在印台区广阳镇西固村一户贫苦农民家中。父亲早年离世，大妹天亡，小妹被送人，母亲带着12岁的路德才和弟弟四处给人扛长工。1936年，路德才母子3人回到家乡，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打了两孔土窑洞，安下家来。1945年秋，游击队来到西固村，给群众宣讲革命道理，使路德才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推翻黑暗的旧社会，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随后，路德才参加了游击队，英勇杀敌，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游击队员。

1947年正月，游击队在淳化小池村被敌军包围。突围中，路德才不顾个人安危，将机枪架在自己肩上，由班长掌枪射击，向前冲杀一里多路，打退了敌人的围攻，为部队杀开一条血路。战斗胜利了，路德才的耳朵却被枪声震聋了。10月，游击队奉命攻打蒲城县高阳镇。战斗打响后，敌强我弱，一时难以取胜。眼看敌人又扑了上来，情急之下，路德才背起腿部受伤行走不便的中队长，手端机枪边退边战，打退追敌直达安全地带。1948年春，游击队在马栏被包围，情况万分紧急。路德才接到突围命令后，端起机枪，向已进入镇外巷道的敌人轮番扫射，打退逼近的敌人，很快与全班战士占领有利地形，火力掩护部队突围，直到部队安全撤出后，路德才才最后一个撤退。战斗结束后，路德才荣立一等功。8月，游击队第二次攻打高阳镇时，路德才又一次立功受奖。同年，路德才随游击队参加了解放澄城、合阳、朝邑、平民等地的战斗，南下追歼逃敌至商洛一带。1949年，商洛作战结束后，游击队驻华阴县整编，路德才升为路东总队侦察班班长，并被授予“模范机枪手”和“战斗标兵”称号，光荣加人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韩子佩率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六旅残部仓皇逃上华山，妄图凭借华山天险长期固守，伺机反扑。路德才所在部队奉命包围华山，彻底消灭这股顽敌。部队领导反复研究作战方案，通往华山顶峰的唯一道路被敌军重兵把守，许多地段“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硬攻不行，只有派小股侦察部队先行，为我军大部队登上华山开辟道路。作战方案定下后，由路东总队侦察参谋刘吉尧和侦察班长路德才带队，精心挑选了5名战士，担任侦察员。

刘吉尧、路德才领命后带领侦察班直奔华山口的皇甫峪。这里的群众，由于累遭国民党军队和土匪的祸害，畏兵如虎，一见军人便吓得躲了起来。刘吉尧设法告诉老乡：“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专门为老百姓打天下，大家不要怕。”他还把寻路上华山、攻打韩子佩的事讲给乡亲们听。在乡亲们的指点下，侦察班找到当地一位名叫王银生的樵夫。王银生祖辈以采药为生，他自幼上山打柴、攀崖寻药，练就一身惊人的攀山本领，人称“爬山虎”。在王银生家住下后，刘吉尧把上华山探路的事情说给王银生听，并提出希望他能为侦察班带路。王银生痛快地答应了，详细地向侦察班战士介绍了从悬崖峭壁攀登华山的情况。战士们听后一致表示：“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一定要上山摸清敌情，完成侦察任务。”侦察队员们为攀登华山紧张地准备着。王银生找来竹竿、铁钩、绳索等登山工具，他的母亲和妻子则忙着给战士们烙饼，并一再叮嘱王银生记牢上山挖药走过的险路。

一切准备妥当后，6月13日清早，刘吉尧、路德才率领侦察班连同向导王银生共8人，携带武器和攀山工具，从两岔口出发了。侦察班进入猩猩沟，穿过两公里长的柏树林，来到华山东峰脚下，开始了破五关的惊险攀登。侦察班在向导王银生的带领下，登悬崖，攀绝壁，穿荆棘，越沟涧，先后闯过天井、飞云峡、吊石板、青龙背、老虎口等险关，来到量掌山。这里距北峰不远了，可以看到北峰上来回走动的敌军哨兵。侦察班继续隐蔽前进，再越过数条山涧和峡谷，赶天黑来到华山北峰脚下。

大家坐下来休息，实际上是开“诸葛亮会”。王银生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山上地形及各险要隘口的位置，刘吉尧仔细观察着北峰敌军的布防情况：大门口有个岗哨，峰顶的品萧台有个嘹望哨，庙内不时传来阵阵吆喝声。根据走过的险路和北峰的敌情，侦察班讨论后决定智取北峰。刘吉尧将班里的八个人分成四个战斗小组，一至三组由他亲自指挥，负责袭击北峰庙守敌；第四组由孟俊甫指挥，负责掩护和阻击增援之敌，封锁路口。

6月14日凌晨1时左右，侦察班迅速向北峰移动，爬到一道石坎下面，蹲下来屏息观察。路德才抬头向上看，只见敌哨兵在头顶走动，趁其转身之际，迅速将其制服。侦察班继续前行，来到北峰庙门口，乘敌哨兵换岗之机，冲进庙内。刘吉尧厉声高喊：“解放军到了，缴枪不杀！一排向上冲！二排向岭上冲！三排跟我来！”庙内20多名敌兵

从梦中惊醒，慌作一团。敌排长妄图顽抗，被眼明手快的路德才一枪击毙。

“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路德才向敌军喊话。

敌人惊呆了，纷纷举手投降。侦察班迅速收缴了敌人的武器。“举起手来，到院子集合！”刘吉尧厉声喝道。敌人举手投降，挨个从门里走出去。住在另一房间的敌营长关士珍听到枪声，慌忙带领两名亲信越窗而逃，第二天被路东总队二营四连在皇甫峪擒获。侦察班仅用二三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占领北峰庙。道士叶兴文主动协助侦察班看守俘虏。

14日黎明，侦察班迅速占领齐天洞，架起机枪，向瘟神洞守敌扫射。瘟神洞是北峰西侧老君犁沟半坡上的一座独立小庙，庙内有守敌20余名。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晕头转向，在侦察班上下夹攻下，不知虚实，全部缴械投降。侦察班又乘胜出击百尺峡、千尺幢，切断了西峰、南峰之敌的退路。驻守在西峰的韩子佩命令苍龙岭、群仙观守敌组织反攻，企图夺回各登山要冲。侦察班奋力出击苍龙岭、群仙观守敌，激战一小时，占领苍龙岭，控制金锁关，群仙观守敌全部投降。青柯坪、三皇洞的三四十名守军先逃到北大上房，后又逃到两岔口，次日全部被俘。

智取北峰成功，从北峰到玉泉院的“华山一条路”开通了。刘吉尧派王银生下山向总部报信。路东总队接到侦察班智取北峰成功的消息后，一面命令部队加强山下各峪口的警戒和搜索，一面组织部队迅速上山支援侦察班，扩大战果。

6月15日上午，何信德营长率一个班首批增援到北峰。16日上午，路东总队政治部主任邓远、总队长马华亭先后率部队急行军到达北峰。此时，华山上的国民党军队已不足50人，全都集中在西峰。西峰是陕保六旅旅部驻地，存有一批武器弹药。为了保护华山的古迹名胜，减少强攻带来的损失，中共大荔地委和路东总队再次向韩子佩发出劝降书，并派代表到西峰同他进行谈判。华山五峰，四峰已经解放，韩子佩在与逃往汉中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及胡宗南部的电台联络业已中断，孤军无援的形势下率残部投降，华山歼敌战斗胜利结束。

华山一战，我军歼敌109名，缴获轻机枪6挺、步马枪59支、卡宾枪12支、短枪1 3支、子弹3900发、手榴弹100枚、电台一部、收音机一部。路东总队仅轻伤一名，消耗步枪子弹100发、小炮弹5发，创造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模范战例。

智取北峰成功，华山残敌顺利被歼，侦察班立了大功。1949年6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通报表彰路东总队侦察分队。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在大荔军分区于华阴县城召开的庆功大会上，代表一野司令部、政治部，授予刘吉尧“特等战斗英雄”称号，路德才、孟俊甫等人“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分别记特等功、一等功一次。王维舟称赞路东总队侦察班依靠群众、智取华山的战斗“是一个奇迹”，号召全军向他们学习。

全国解放后，路德才1950年转业回乡务农，先后担任本村村长、党支部书记，1964年开始做公路养护工作，一直干了20年。和平建设年代里，党和人民给予了路德才应有的荣誉。他先后被选为蒲城县第一至七届人民代表，广阳人民公社、乡、镇第一至十届人民代表，铜川市郊区第一、二届人民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铜川市第九届人民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几十年来，路德才一直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待遇，他的高尚品德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1998年，路德才因病去世，享年81岁。

# 后 记

为了记载、缅怀中国共产党人和铜川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弘扬中国共产党人和铜川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前赴后继、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2011年初，我室决定在纪念建党90周年、全市开展党史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中，征集出版《铜川革命史话》一书，与已出版的《红色印迹》一书共同作为党史学习宣传教育的辅助读本。经过全体工作人员两年来的辛勤努力，《铜川革命史话》于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付印成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原设想以故事的表现形式反映铜川大地上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片断，但由于表现党史内容要求翔实、准确，与故事化的表现形式不易统一之因，本书除部分篇目外，总体看故事性、趣味性略显不强，但它使读者了解铜川革命历史并从中受到教育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成书过程中，市委书记冯新柱，市委副书记、原市长王莉霞，市委副书记张应龙等领导给予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先后两次召集会议，帮助解决人员、经费、交通和办公设备等问题，从而保证了本书编辑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编办、市财政局、市文化广电局等有关部门在保障工作条件方面给予了有力配合。各区县委史志办领导及党史工作者为本书搜集资料、核对史实、提供初稿，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一些离退休的党史工作者和善于写作的老同志都给予了鼎力相助，还有其他外围工作者为本书的完成做了有益服务。耀州区政协原副主席、耀州区委史志办原副主任雷天启对本书初稿进行了编辑修订，铜川市群众艺术馆研究员张文顺为本书创作了全部插图。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熊美杰对本书作了最后修订。在这里一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辑水平和资料有限，本书难免有疏漏和不尽人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3年5月